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闽都文化研究会会长)
 执行理事长 黄如论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
 副 理 事 长 林 峰 (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董事、
 世纪金源 (福建) 集团董事长)
 高 翔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理 事 张苏飞 (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王华南 (闽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黄文山 (《闽都文化》杂志执行主编)
 苏 忠 (世纪金源集团监事会监事)
 邹自振 (闽都文化研究会学术部负责人、
 《闽都文化》杂志副主编)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练知轩
 编 委 高 翔 王聪深 赵麟斌
 汪征鲁 林 山 张苏飞
 陈章汉 王华南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0 期 2015 年第 5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邹自振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章进取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装帧设计 杨 雪
 封面摄影 应 宁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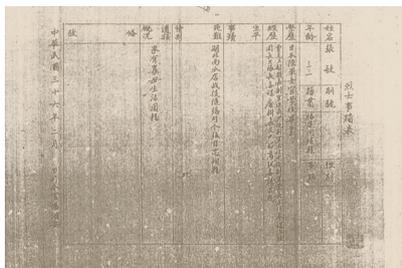
閩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
 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魂兮归来，国之忠烈
——档案里的抗日英烈

闽都记忆：华夏之殇

- 4 林 怡 魂兮归来，国之忠烈
——档案里的抗日英烈
- 9 景 艳 勿忘烽火炼吴钩

闽都记忆：血火悲歌

- 14 余斯伟 北岭如磐
- 18 林世恩 悲壮的归宿
- 24 薛宗耀 炽“火”袭“日”
- 31 张小菁 此生魂系中山舰

P31



此生魂系中山舰

闽都记忆：赤子之情

- 37 康延平 独善其身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 43 杨静南 大道至简
——池步洲和他的人生密码
- 49 刘 琳 她的名字与勇敢联在一起
——记抗日女杰舒诚

P37

独善其身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Contents

P58



往西南岁月去
——远征军翻译官郑国贤的
抗战记忆

P68



一个家族的 1941

P80

蜚水英华
——抗战期间福州英华中学
内迁纪实



- 53 陈美者 一代风华
——何柏华小记
- 58 林文政 往西南岁月去
——远征军翻译官郑国贤的
抗战记忆

闽都记忆：波荡岁月

- 64 钟兆云 闽中风雅赖扶持
——郁达夫在“抗日救亡”中
- 68 刘冬 一个家族的 1941
- 76 潘亮 沦陷记忆：发生在塔亭医院的故事
- 80 施昌寿 蜚水英华
——抗战期间福州英华中学内
迁纪实

闽都记忆：城劫之痛

- 87 吴鼎芬 陷城日记

- 封二 康会永 秋艳
- 封三 陈行 牡丹富贵图

魂兮归来，国之忠烈

——档案里的抗日英烈

林 怡

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70 年，铜驼荆棘成往事。

70 年，从来天地一稊米。

然而，在杜鹃花绽放的春日里，我似乎隐隐听到杜鹃啼血的声音：魂兮归来，国之忠烈！魂兮归来，国之忠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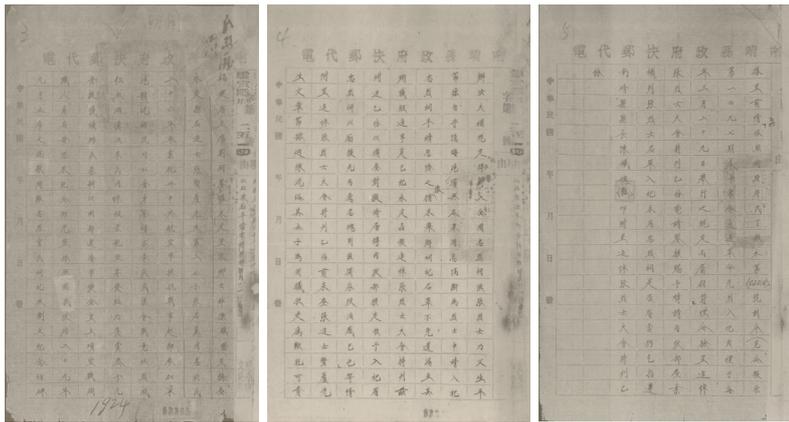
70 年前的人和事，真的随风而逝了吗？

不，翻阅着福建省档案馆精心保存的一册册发黄的档案卷宗，披览着中国政府对福建籍抗日英烈的一道道嘉奖令、抚恤令，细读着档案里记载的忠烈们英勇殉国的悲壮事迹，情不自禁血脉贲张、热泪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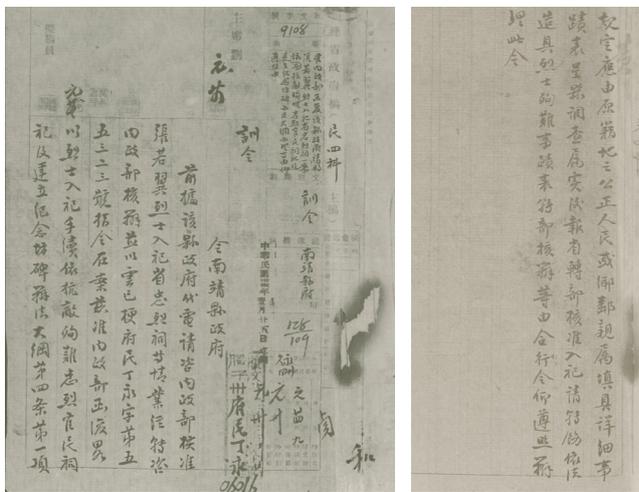
请看永定县政府电请福建省政府呈咨内政部将张若翼烈士迎入福建省忠烈祠的档案文字：“查永定县名进士张蟹芦先生第二公子张若翼同志于

民国二十六年毕业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抗战事起，即参加宁沪赣皖诸役，均以奋勇著绩，不幸在武汉会战竟壮烈成仁，血洒汉江，军民同悼。”

烈士张若翼（1918-1938），殉国时年仅 20 周岁！这个生于北京进士家庭的福建籍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决然地别离安逸的家，17 岁高中毕业就报考了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入



永定县政府档案文字



获准入列忠烈祠之批文

学后他刻苦训练，身怀绝技，轻财重义，坦荡为人，深为老师同学所爱重。193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立即被授予空军少尉军衔，编入第二十四队为驱逐机驾驶员。他曾写信给弟弟说：“誓必以死报国，即所以报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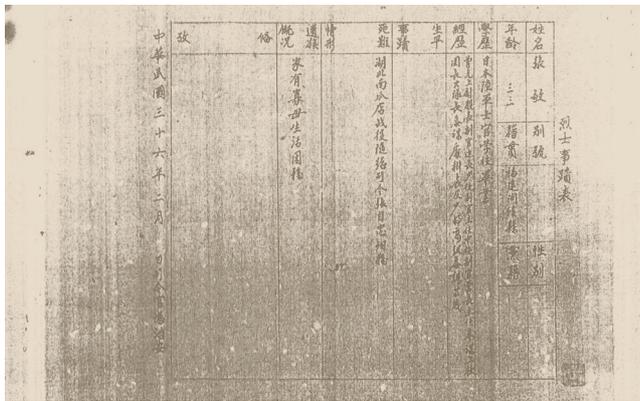
1938年1月4日，惨烈的武汉会战正在展开中，敌机32架空袭汉口，我方只有8架落后的战机。张若翼和战友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驾机冲入敌阵，接连击落敌机数架。在队友都已负伤后，他依然独自奋勇冲击敌机，鏖战至机翼被伤，身中数弹，最后机毁人亡于汉阳小军山侧。张若翼牺牲后，战友检其遗物，得其遗书。遗书写道：“母亲在北（京），兄在湘，嘱来收我尸骨。”读至此，我不禁想起林徽因怀念同样在空战中牺牲的其弟林恒的诗歌《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以平实沉郁之笔写道：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
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
老年的智慧……

无论张若翼，还是林恒，以及许许多多，在八年抗战中慷慨赴国难的义勇们，他们用青春的鲜血灌铸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二

在福建省档案馆，一份“烈士事迹表”令我难以忘怀。张敬烈士，少将，籍贯福建闽侯县，是举国共悼的抗日名将张自忠的高级参谋，1940年5月16日随张自忠将军在湖北壮烈殉国，年仅33岁。张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烈士事迹表”述其经历：“曾充上尉股长、副官、连长；少校副官、主任、中校副官、营长、主任、参谋；上校团长、大队长、参谋处科长及少将高



烈士事迹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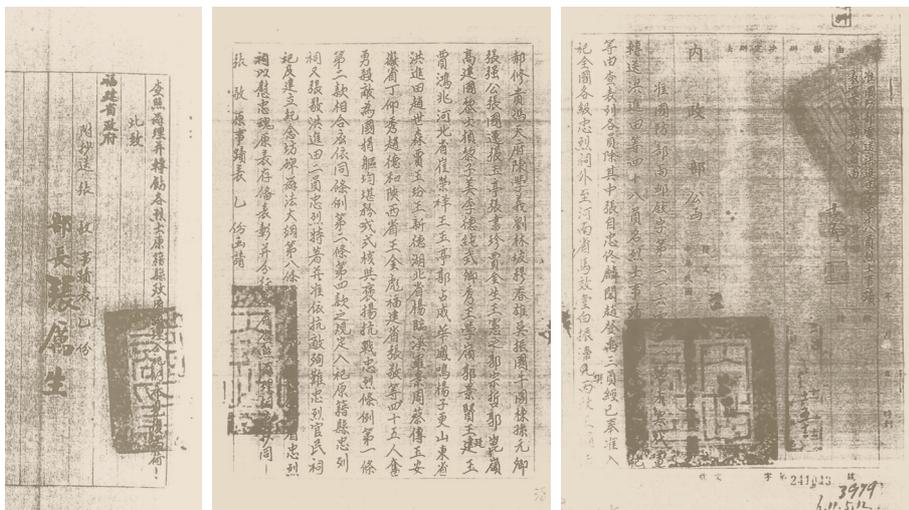
级参谋等职。”“烈士事迹表”中“死难情形”一栏填写道：“湖北南瓜店战役随总司令张自忠殉难。”“遗族概况”栏内写道：“家有寡母，生活困难。”这张“烈士事迹表”填写于1947年2月，附在内政部公函之后。当时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签发此份公函，内容为：“准国防部雨恤叙字……转送洪进田等四十八员名烈士事迹表嘱查照核定入祀等由。表列各员，除其中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员经已奉准入祀全国各级忠烈祠外，至河南省马效堂……福建省张敬等四十五人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均堪矜式。式核与褒扬抗战忠烈条例第一条第二款相合，应依同条例第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入祀原籍县忠烈祠。又张敬、洪进田二员忠烈特著，并准依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第八条附款之规定入祀原籍省忠烈祠以尉忠魂。原表存备表彰并分行各省查照办理，相应抄同。张敬，原事迹表乙份函请。”

上述档案文字令我震惊和惭愧。震惊的是：

举世皆知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但鲜有人知随张自忠牺牲的还有像张敬这样年仅33岁的少将高级参谋！作为福州人，我为家乡的先烈张敬将军自豪，也为自己年近半百才获悉张敬烈士的英勇事迹而惭愧汗颜。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7日拂晓，张自忠率部东渡襄河北进。14日，敌我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5月16日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张自忠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有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效堂等8人。下午4时，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张自忠、张敬、马效堂等全部战死。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使藤冈止步不前，惊愕



张厉生签发的文件

革命烈士”，并将其遗照入祀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烈士馆，为此，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女士专程从北京寄来挽联：“铁马金戈誓与先军同报国，疾风劲吹留为后学式丰碑。”

近年有媒体报道，张敬烈士老家在福州闽侯县南通镇泽苗村，该村张氏宗祠珍藏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纪念

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拼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张自忠及其所部壮烈殉国的英雄气概令敌军也为之肃然起敬。当天，敌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就发出报道，称张自忠为“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当日夜半，国军派出敢死队抢回张自忠将军的遗体。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在陪都重庆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周恩来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海内外各界对张自忠将军的褒扬也正是对其所部如张敬等许许多多忠烈之士的褒扬！7年后，1947年，内政部发函通令有关省县褒扬祭祀随张自忠将军阵亡的张敬等烈士。40年后，1986年6月，张敬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和中央民政部先后追认为“抗日

张敬烈士的题词。张敬烈士幼时随父母迁住福州城内，居所就在福州乌山东麓天皇岭。张敬烈士的母亲陈香闰女士于1975年去世，烈士胞妹张淑楨如果健在已年逾90高龄。天皇岭，如今已属福州著名的乌石山风景区，那里桃林成片，每到春日，桃花盛开，游人如织。我非常期待地方政府在天皇岭桃林中树碑纪念张敬烈士，让后人永志不忘为国牺牲的英烈们！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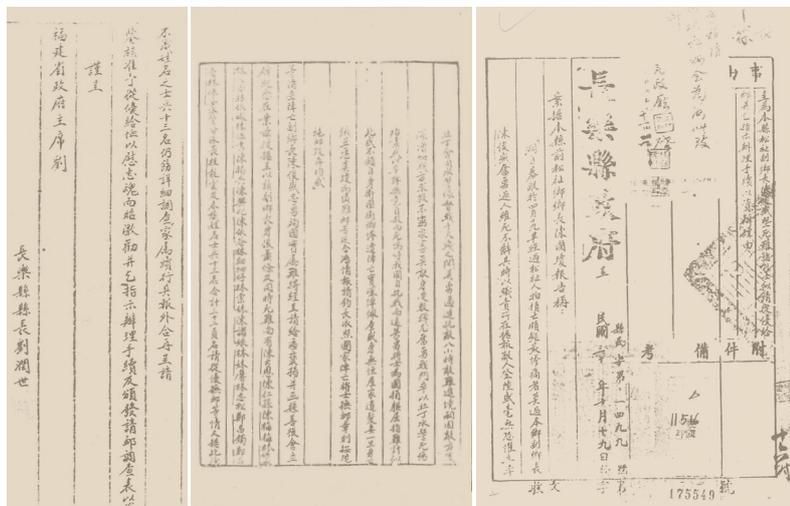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八年抗战，不仅有张敬、张若翼等为国捐躯的军中将士，也有为保家卫土而奋不顾身杀敌御寇的普

通民众和乡勇。1941年4月福州沦陷，据长乐县呈报福建省政府的档案记载，长乐松祉乡副乡长陈俊盛等乡民乡勇33人顽强抵抗日寇进乡而壮烈殉国。档案详细记载松祉乡原乡长的报告如下：

“溯自暴敌于四月十九早经过松祉，人物损亡颇巨。最惨痛者莫过本乡副乡长陈俊盛奋勇过人，虽死不辞。其时以职责所在，据报敌人登陆，盛毫无恐惧，立率壮丁会同水警队督战于火线之间，英勇迈进，抗敌八小时，敌难进境。嗣因敌方后队增加，我方求救不口（原文缺失），众寡莫敌，身受数弹，尤奋勇战斗，卒以壮丁水警死伤殆尽，盛以卒弹无，竟自杀而死。呜呼！我国自抗战而还，英勇将士为国捐躯屈指难计，似此盛不顾自身，卫国卫乡，惨遭阵亡，实深悼佩。查盛身无恒产，家遗发妻，一旦身亡，饿殍堪虞。为怜难恤苦，迫合沥情，报请钧长依照国家阵亡将士抚恤章则，按规施恤，殁存均感。”

长乐县政府接此报告后向福建省政府详细禀报了这场乡土保卫战中英勇殉国的英烈姓名，档案详情如下：

“查阵亡副乡长陈俊盛忠勇殉国，实属难得。经呈请，给匾褒扬，并函县善后会立碑纪念在案，兹复。据呈以该副乡长身后萧条，及同时死难尚有陈大恩、陈仁孙、陈梅梅、林保永、林火弟、林依嫩、林保书、陈扬兵、陈兴华、陈依谷、林细细仔、林棠妹、陈诸娘、林妹磨、林忠松、郑昌镛、郑昌善、林保安、水警分队长程龙云及未识姓名士兵十三名，合计三十二员名，请



长乐松祉乡村民抗日事迹报告

从优抚恤等情。又据此，除不识姓名之士兵十三名仍饬详细调查家属、续行具报外，合再呈请鉴核，准予从优给恤，以慰忠魂，而昭激劝，并乞指示办理手续及颁发请恤调查表以资办理。”

上述福建省档案馆珍藏的文件，足证家乡人民从不曾忘却保家卫国牺牲的先烈们。八年抗战，福州这块土地走出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的平民元首林森，走出了因坚决主战而被日寇残杀于香港九龙街头的国民党元老、南社成员、一代诗豪林庚白，走出了浴血奋战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等，更涌现了张若翼、张敬、陈俊盛等知名不知名的无数英雄豪杰。正是这些烈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让我华族五千年的历史在世上永存！

70年！魂兮归来，国之忠烈！

勿忘烽火炼吴钩

景 艳

那一天，文山老师突然给我打了通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福州一中采访撰写一篇关于一张照片的文章。我很惊讶，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他的回答非常简单，简单到让我怀疑自己可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然而，当我真的走近、揣摩、倾听，数十年前的雪泥鸿爪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

这是一张翻拍的黑白老照片，略显斑驳的影像中，19张年轻俊朗的面容清晰可感，挺拔的军姿、昂扬的青春、炯炯的目光、坚毅的表情，至今仍然扣动人们的心弦。照片的抬头上写着“中



中央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十一总队闽福中同学毕业合影



苏毓刚



陈盛馨

央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十一总队闽福中同学毕业合影纪念民三十一元旦于武冈”。闽福中即“福建省立福州中学”的简称，就是现在的福州一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1942年1月1日，来自福州一中的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武冈分校的学员们在他们毕业分配到各战区前照的一张临别合影。这张照片至今仍收存于福州一中的校史馆里。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怎么样了？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或有关他们的一丁点信息。对于这张照片的来历，也是一无所知。一中的李迅校长告诉我，经过多方查找，包括查档案、史志，发动台湾校友的力量，都没有更多具体的消息——他们大约全部牺牲在了战场上。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消息似的，我在为撰写这篇文章而翻查史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张毕业于黄埔第十七期武冈分校的苏毓刚烈士的遗照。他那熟悉的眉眼、习惯性的表情，恰恰表明他就是那张合影中前排右起第二位。资料显示，苏毓刚于1944年7月12日在衡

阳战役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3岁。这也是另一位在淞沪战场上牺牲的校友郭中通生命定格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如果只是想了解那样一个时代，他们的姓名似乎已经没有个体差异了，因为那是一个几乎把所有人的命运都席卷而去的时代。1933届校友、著名空军飞行员陈盛馨在考入空军学校之前，与班友互赠照片，赋诗留念。其中一首诗云：“书生报国恨无方，今幸获偿自觉光；我期杀敌吞三岛，深仇累世永难忘。”在战场上，他英勇顽强，血战长空，1942年因机械故障折戟双流，他的英名被镌刻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李迅校长介绍说，那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个被镌刻在烈士纪念碑上的一中校友的名字。但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何尝不是功勋卓著者？

在那样一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这些年轻的生命总是以那样义无反顾的姿态逝去，就像一朵朵被狂风吹散的蒲公英，散落在饱经沧桑的大地

上，等待另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成为发芽的种子。

李迅校长告诉我，那些，不过是福州一中的校友们在抗日战争艰难时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一部分。除了那些奔赴前线浴血杀敌的壮士之外，还有投身于制造、维修、建筑、法律、新闻等其他行业，为抗战贡献心力的有志青年。比如：桥梁专家陈体诚、大法官叶在增、新闻工作者邓拓……他们或闪亮或不为人知的名字给年轻一代留下的不仅仅是榜样的力量，还有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代，这是闽都学子共有的担当。一中，是那个时代一隅小小的缩影。

二

铸就这样一种精神的除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还有教育。在三牧坊的一中校史馆中，我看到了一张拍摄于1935年5月8日的老照片，这正是抗战全面爆发前两年校庆时的学生合影。照片上初中的男生都是清一色的童子军装扮：短袖短裤中长袜、扎腰带束红巾；高中生则是立领制服戴帽子；女生则是短袖半长裙平底鞋，典型的“五四式”装扮。每一队边上都站立着身着军服的教官。除了校长张湛、教务等身着长衫居中站立之外，旁边竟有专门一队扎腰带系绑腿之人，大约就是和童子军一起新增的军训团了。负责校史馆管理的贺少青老师介绍说，那时候的福中每年都

要举办运动会，校庆要举行音乐、戏剧演出。她指着窗外那一排榕树告诉我：这就是照片背景上的那排榕树了。数十年的光阴，历经炮火风雨的洗礼，它们葱茏繁茂，一如往昔。

校史记载，1932年，学生所学之公民科已增加了抗战救国的内容，各中学内部加强了军训和战时后方服务训练。1934年，学校开始实行军事化管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学校依据“三育并重”“文武全一”的原则，逐步转入战时教育体系，高中学生全部住校。在1938年10月到1939年7月，全体学生参加集中训练和战时民众教育。而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日寇的进袭，福中迁到了沙县。

那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学校建起了林场、农场，学生们自己开辟了操场和篮球场……在偏僻、安静的洞天岩自有一片火红出现。

当时，日寇的飞机常来袭扰。学校改变了



位于三牧坊巷内的福中校门

作息时间，每天提早起床，上完两节课之后就让师生疏散到山林里，自带炊具粮菜，下午两点回学校再上两节课，晚上再补当天所缺的课程。尽管环境是如此危险，条件是如此艰苦，但师生们却是同甘共苦、精神振奋。教者诲人不倦，学者勤俭忘食。那时候的教师多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牌大学高才生，恨不能将自己所学统统传授给学生。每周一升旗行礼之后，必有一位作精彩演讲，或时事或科学或修养。而学生们除了上课之外，还常常在晚自修以后自备蜡烛潜伏在幽僻处“开夜车”。为了不被老师发现，一夜几移的事情常有发生。

在当时，学校连正常的教学都不能保证，还收容了一些来自浙赣等地的失学青年，但对于教学质量的标准要求始终没有降低。据说，当时福高的入学考试要经过两次发榜，第一次为笔试，合格者须再经过6个学科、6位考试委员的面试、口试，通过后才被正式录取。学校里的各项评定都有严格且细致的标准，以操行为例，包括勤学、整洁、礼仪、俭朴、劳作、纪律、康乐等诸多方面，而“平时颜面表情是否和蔼”以及“有靠左走的习惯否、能节省无益费用多购参考书籍否”竟然都被列入了考核细则。看到那样一张表格清单时，我被深深震撼了。在那样一个狼烟遍地、万物失序的年代，这一方已不清净的校园依然以那样的执着坚守着文明薪火的传承。

那时的福中学子有担当。他们除了学习之外，还经常走出校门参加各种活动。抗战军和高

中学生经常奉派深入各县区，担负战时民教、民训的工作；话剧组从走村串寨发展到在闽北南平、沙县等地公演，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片爱国心》《这不过是春天》等等剧目，宣传抗日，其中包括后来的北影导演陈怀恺，他就是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父亲。“救国须有高深学问”，返校后的学子，更加珍惜学习机会，“风动草偃，勤学之习尚以成”，追求进步蔚然成风。

按校史记载，1940年到1944年期间，福中共招收学生612人，毕业497人，成绩优秀免试保送上大学的223人，四届会考成绩合格率是99%，升学率公认全省第一。1939年到1940年，有47位同学投笔从戎，1944年有168位同学加入了抗战队伍，1945年6月1日，又有75名男女学生志愿从军……要知道，那时候的从军，是随时牺牲的代名词。

三

踟蹰在那并不久远却似尘封的校史之中，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年代，和那些壮怀激烈的闽都学子们在一起，看着他们在我的身边，看得到他们的来来往往，感受得到他们青春的气息，他们精神的羽翼轻轻掠过历史的沟壑，在那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为了祖国为了理想，他们把那一生只能盛开一次青春慨然无悔地奉献出来，而今世的我们，却在那么长时间里惘然不知。

李迅校长出生于军人家庭，他对军人、部队的崇敬其来有自。他说，如今最令他遗憾惋惜的是，经历过那个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校友的记录没能保存下来，而它们中的点点滴滴，其实都是一个民族生存的记录，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无比重要。

采访中，李迅校长告诉我，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过湖南衡山脚下，无意中走进一座看似荒芜窑洞的未知地方，竟然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抗日将士的名录，门外的荒草萋萋显示着这里已经好久没有人过来了。之后，他踏足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发现用汉白玉石刻的“二战”牺牲将士名录，就在学校大厅里的正对门。

“教育传承，要把什么告诉给现在的年轻人？这些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仍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他说。

李迅校长介绍说，目前，福州一中的历史价值观教育主要包含四大类：一是按照国家课程的统一安排，以军训、社会实践等方式进行；二是针对每年清明节等特殊日子，组织读书、凭悼等纪念活动；三是从本校特色出发，在高中校本课程中增加航海课程等；四是利用参加交流、会议、比赛活动的时机，组织师生到当地具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地参观祭拜。他希望今天的教师和学生更多地去了解这段历史，更多地去体悟先辈们的精神，更多地继承和实践他们的理想。

作为一名从事教职工作三十多年的教育工

作者，李迅忧心地指出：现在的教育多了点歌舞升平，少了点阳刚血气；多了点物化，少了点精神。“假如有一天，国家面临危难，是不是仍然会像当年那样，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自觉自愿地为国家牺牲奉献？”虽说，这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时代，但李迅认为，和平时期同样需要那股努力拼搏上进的精神，“意志与品质并不仅仅只是在枪林弹雨的危急时刻才能展现。”

在国防科技大学“共育强军人才论坛”上，李迅校长在题为《男儿何不带吴钩》的演讲中指出，国土的安全、百姓的安宁从来不是靠发誓和赌咒来维护的，只有靠强大的国防，才有人民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2002年莅临我校，提出‘一所这么好的学校，在我们共产党人手中应发扬光大’。我想，‘这么好’不是指我校每年高考985高校录取率50%和98%以上的‘一本’上线率，而是指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具备国家责任，有勇气、有担当。”李迅说，他非常欣喜地看到每年都有一中的学生考入军校，“和平年代也要有一批很棒的青年投身到国防事业，把他们的智慧贡献给国防科技，唯此，才能保证国家高枕无忧。”

告别那一方小小的校史馆，感佩、沉重、反思……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那些朴素简单的记录，那些残存破碎的影像在我的心头组合成章，就像一面旗帜猎猎飘扬。那火一样的鲜红燃烧着昂扬的青春，映射着坚定的信念，照亮着我们未曾踏及的道路，召唤着又一代年轻的闽都儿女前行、前行，勿忘烽火炼吴钩。

北岭如磐

余斯伟

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旧属小北岭，俗称北峰小北。这里是福州通往闽东、闽西、闽北的通衢要道。小北山中修有古代驿道，站在寿山乡岭头村、叶洋村高处下望，福州城尽收眼底，所以岭头、叶洋、前洋一带自古为关口要隘、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中，这里曾成为福州军民抗击日军的主战场。

一、红军播下抗日火种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震惊。11

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带领下，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开始全力围剿中央苏区。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不断失利。1934年7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先派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分散和吸引一部分国民党围剿部队，打乱蒋介石“围剿”部署。先遣队由红七军团组成。7月6日，在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带领下，从



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20日攻下大田，挺进闽中。6月29日，攻下樟湖坂，渡过闽江，占领水口，相机威胁、袭取福州。8月7日，先遣队主力攻取福州城隘口要塞小北岭地区的岭头、前洋、叶洋一带。此时，蒋介石急令国民党八十七师在福州新店浮村、义井一带设防，红军先遣队于23日夜从里洋、笔架山一带向福州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队强硬抵抗。先遣队另一路攻击王庄机场，也未得手。先遣队只得放弃攻城，撤回小北岭。9月9日，先遣队护送一二百伤员，由岭头经江南竹村向连江桃源、潘渡转移。红军所过之处，军纪严明、无扰百姓，为北峰桂湖地区以后的“二三”土地革命撒下了革命种子。在撤退途中，先遣队在北峰降虎寨遭埋伏，展开过殊死战斗，红军战士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给北峰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岭百姓在战斗结束后，偷偷地掩埋红军牺牲战士，以后每年都主动上山祭扫，一直坚持到福州解放。2001年，这处埋葬数十位红军烈士的降虎村坪岗顶红军墓被晋安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红军抗日北上先遣队虽然在寿山乡岭头、前洋、江南竹、石牌一带滞留的时间不长，但红军战士一路宣传抗日，不畏强敌的革命精神，在寿山乡的人民心中点燃了抗日的烽火，为寿山乡日后成为福州地区抗战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铁蹄蹂躏，山乡涂炭

1940年和1941年，抗战进入困难时期。这时，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猖狂，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时期，日本军事情报机关侦知，中国的国际公路交通线桂越、滇越、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只留下中国海上补给线。所以，日军统帅部于1941年2月下达命令，让华南方面日军对福建以南的中国沿海，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行动。1941年3月15日起，日本大本营把驻在台湾的第四飞行团调归华南方面集结。4月中旬，日军舰艇将闽江口沿海岛屿附近的民船全部收拢扣押，断绝海上岛屿与福州的联系。18日，日军出动2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福州等地，用重炮轰击闽江口长门炮台等国民党守军工事。19日凌晨，日军出动1.2万兵力攻击中国守军。中国守卫部队抵挡不住日军进攻，匆忙撤退。21日晨，日军兵分数路，一路由长乐营前，过马尾，沿福州马尾公路突入福州市区，一路由营前渡过乌龙江到达湾边、南台岛和洪山桥。而在南边，则由连江越过潘渡、汤岭，入大小北岭，控制福州北门。福州第一次沦陷。

福州沦陷后，日军鼓动一批汉奸拼凑“福州治安维持会”，帮助日军捕杀爱国志士，为日军征用民工、粮款，抢修机场，掠夺战争物资，帮助日军推行奴化教育，鼓吹“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等谬论。他们一面散布“大东亚共荣”，一

面利用武力四处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企图使中国人屈服。占领小北岭的岭头、前洋、叶洋等地后，日军立刻设关卡，布岗站哨，还四处抓丁修筑碉堡和战壕。对不服管制的村民施行鞭打、罚跪、关栅子、用刺刀捅等残酷刑罚。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沦陷期间，小北岭仅在岭头、前洋、叶洋一带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捅伤的中国人多达数十人。

1944年9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为防止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维护沿海交通，挽救败局，再度攻陷福州城。

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日军对退守小北岭的守军不断袭击，曾占领过优山、叶洋、吾洋等村，还到过贵洋、大坂、上仑、长基等村。在优山，日军不问青红皂白，见了山民就开枪射杀。日军还四处放火焚屋，抢夺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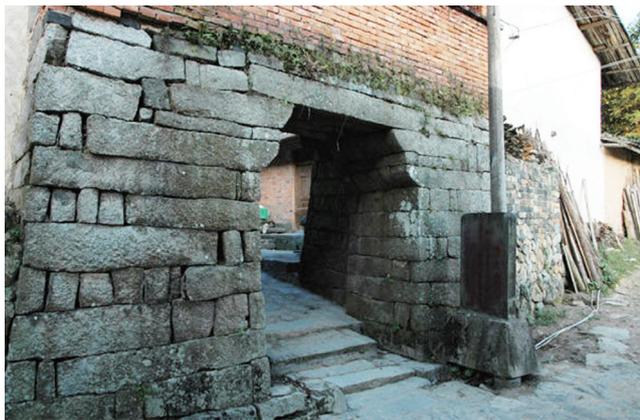
三、血洒疆场，北岭如磐

在福州两次沦陷时期，巍巍北岭，枪声不断。福州军民用身躯热血在城北的大小北岭筑起了一道抵挡侵华日军前进的铜墙铁壁。

当时，国民政府驻连江的第八十师二四零团先在连江设防，利用有利地形抵抗，后退至福州北岭，想吸引日军主力。同时，驻守福州的二三八团佯作坚守福州，后退出，诱敌进攻小北岭。而原驻守于北岭的二三九团，则修筑工事准备与日军主力决战。

国民政府守军二三九团第一营和二三八团第二营，在大北岭与日军血战后撤退至小北岭。其前线指挥部设在小北岭头猪蹄亭，下寮为后方基地。当时指挥部派出连级干部汪福祥驻下寮乡政府，发动群众为抗战部队送粮食、子弹，护送伤员。下寮乡长王建仁带领回乡学生王证明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二人均参加地下党）。9月23日，二三九团一营由小北岭至降虎寨时，日军已先期占领有利地形。该营先头连（第一连）遭袭击，全连阵亡。但日军也遭到重创。后二三八团第二营、二三九团第一营在莲花峰上与日军再战，两营合力阻击，日军黑夜攻击莲花峰未得逞。10月1日凌晨，日军又发起进攻，突入二三九团一营阵地，双方血刃拼杀，营长张稚生等官兵牺牲。接着日军又向二三八团二营左翼四连阵地进攻，四连官兵跃出战壕与日军肉搏，伤亡惨重，前沿大部被占。

此时，莲花峰主峰还在守军二营营部和六



降虎寨



莲花峰上抗战时期的碉堡

连、营部机枪连、迫击炮排官兵手中，他们严阵以待，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拂晓天明，日军再度炮轰莲花峰，随后步兵从正面和侧面发起冲锋，均被一次次击退。而同时，从琯头进犯的日军也被海军陆战队第四团阻击于岭头一带。

10月2日国民政府守军拟集中兵力反击日军。3日，七十军军长陈孔达传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令李良荣师长将部队撤出战场退守小北岭、大湖一线。4日，日军从大北岭一带南下，沿福马路西进，再度占领了福州市区。

国民政府军队在1944年10月4日退守小北岭。他们以小北岭为基地，不时派小部队袭击日军。一次攻占五凤山，全歼守敌，并乘胜攻到北

门外。一次绕山路袭击闽安镇，毙敌一中级指挥官。还数次袭击出城之敌。日军疯狂反扑，曾派一个大队从马坑、叶洋自右侧攻击小北岭，企图拔除我连前哨阵地。我军先借地形熟悉，杀伤敌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偷袭叶洋村。日军杀死两位中国军队的哨兵后，进入叶洋村抓走7位中国军队士兵和25位村民。据当时被抓的叶洋村民詹永福、陈贞汉、陈亨沙等回忆，当时日军将他们33人押下小北岭，关在柴井医院之内，每天只给一餐饭吃，并禁止给水喝，逼村民家人用金钱物资（柴、米）来赎人。日军对于被俘的中国士兵十分残暴，侮辱打骂用尽刑法。当其中一位士兵乘夜挖墙逃脱后，剩余6名士兵均被用刺刀刺死。在小北岭的战斗中，日军均失利，先后损失一百余人。日军大队长羞怒交加，在小北岭下自杀。此后双方互有袭击，一直对峙到日军撤出福州为止。

1945年4月中旬，抗战进入新阶段，日本大本营开始撤退湘桂、粤汉铁路和福建沿海部队。为确保撤退平安，4月12日又派兵进犯小北岭，企图击破福州外围，以迷惑守军的判断。但守军识破意图，不断发起攻击，取得五凤山战斗胜利。日军夺路而逃，放弃福州，仓皇退往连江。他们怕盟军飞机空袭，不敢由海上外逃，而逆循闽东陆路向浙江永嘉方向逃窜。5月18日，福州光复。9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福州军民抗战胜利结束。小北岭军民抗战的史实也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悲壮的归宿

林世恩

亚洲两个重量级的邻国，一个作为侵略者，一个作为被侵略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发生过一次激烈的碰撞，它就是淞沪会战——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生死存亡之际，当时仍为弱国的中国被迫“亮剑”。始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的这场会战，是两国战争意志和军事力量的一次空前的大较量，双方共投入近百万的兵力。中国军队方面，从最精锐的中央军到装备低劣的地方部队共 70 万人参战，这其中有一支来自福建的地方部队——国军第五十二师卢兴荣部。

这是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其实，这支队伍的前身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头领叫卢兴邦。民国时期的福建，民军林立，土匪多如牛毛。和全国许多省份一样，在多年的兵



卢兴邦

荒马乱中崛起了一批军阀，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卢兴邦。卢兴邦出生在尤溪县的一个小山村，少时家里贫寒，靠贩土纸为生，后被地主所迫去当了土匪，成了山寨王。这人头脑精明，尤其是有政治眼光，他不满足于做一介草寇，主动派人赴

广州与广东护法军政府联系，队伍被军政府收编为粤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卢兴邦为团长兼三民主义福建省宣传员。卢部实现了身份的重大转变——由匪而军，成为广东护法军政府倚重的一支军事力量。后北伐军入闽，卢部协同作战，连克沙县、南平、建瓯等闽北重镇，受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师（后改为国军第五十二师），卢兴邦为师长。北伐军离闽北上，卢兴邦受命管辖尤溪、沙县等 22 个县，成为名噪一时的“闽北王”。

卢部烧杀抢掠的事情干过，自印纸币搜刮钱财的事情也干过，种种劣迹招人憎恨，但在发展乡村中小学教育、道路建设、古迹文物保护等方面也做过一些好事。都说权力是诱人的，然而年届五十之际，尽管部下仍忠于他，卢兴邦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归隐乡野。他将自己亲手打下的一

隅江山托付给了族弟卢兴荣。卢兴荣从土匪时期起就追随他，当过团长、旅长、副师长，有胆有识，屡立战功，让他统率这支队伍，卢兴邦很放心。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日救亡的氛围逐渐形成。卢兴邦创办的尤溪公立师范中学校师生数百人举着旗帜喊着口号到卢部兵营请愿，要求卢部官兵在民族存亡面前明是非，赴国难，抗日寇。卢部官兵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们的血也是热的。

卢兴荣带了几个骨干来到尤溪双鲤村，看望寓居在那儿的卢兴邦。卢兴邦很高兴地接待了这些老部下，言谈之间提到了当前的形势。虽身处僻壤，但他对时局仍旧了如指掌，他预感到国民政府不久就会有一场大的部署，民族危亡之际，只有举全国之力才能与日寇拼一死活。卢部官兵要随时准备开赴对日战场，尽点军人的本分。他



卢兴邦创建的尤溪一中

不希望自己带出的队伍是孬种。卢兴邦情绪激动，握着拳头捶击桌面。卢兴荣他们心底踏实了，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来了解老长官的态度，毕竟，队伍是在他手上拉出来的。

1937年初，国民政府开始对全军重新部署，第五十二师被认为是一支杂牌军，战斗力弱，武器装备差，没有能力与日对抗，只能留置闽浙边区维持治安。国民政府这一轻视卢部的计划尚未正式公布，卢兴荣获知了消息，心下郁闷，他认为本部虽为杂牌军，武器装备差，但久经战役，敢打能拼，且官兵患难与共，意志坚定，不属弱旅。他与部下紧急商议，决定主动请求，共赴国难。

卢部主动请缨，蒋委员长自然是勉励有加，他觉得士气可用，遂指示国民政府，令卢兴荣率全师开往浙江，统归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指挥

调配。

要离开经营多年的闽北老窝了，卢部上上下下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情绪。为激励士气，第五十二师举行了誓师大会，卢兴荣以充满感染力的语气，传达了蒋委员长的训示，强调了军人肩负的保家卫国的责任，提到了同仇敌忾、万难不屈的民族精神。最后，他转达了老长官卢兴邦捎来的话：替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肃立的士兵们情绪被点燃了，振臂吼道：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是年夏，卢部离闽赴浙，士兵们打绑腿穿草鞋，有的肩上扛的甚至是鸟铳。当时福州出版的一家报纸称，这是一支未见过大世面的有些寒碇的军队。然而，这支队伍向未知的残酷的战场挺进时没有犹豫，没有畏缩。队伍到达浙江龙泉驻扎下来进行整训，汰弱留强，将原有的六个团和两个直属营编整为四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瘦身后



卢兴荣少将任命状



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卢兴邦发给卢兴荣的任命状

的第五十二师军容整齐，士气旺盛。

这年秋，“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在此情形下，卢部奉令与其他部队一起进驻杭州，接受国民政府总检阅。经检阅，卢部被认定符合抗日整编师的规格，编入上海战区总预备队的序列。

卢部是在淞沪会战最为激烈的时刻投入前线战场的。

淞沪会战规模急剧扩大，对阵双方都形成了“添油战术”，不断增兵，鏖战日趋激烈。8月下旬，日军援兵抵达上海战区，在沿江宽广的江面上登陆，中国军队对登陆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抗击，因损失过大，被迫转入防御。9月14日起，敌军在飞机、战车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重点指向宝罗公路东南方。我军与敌激战，损失惨重，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

公庙一线，终于制止住了敌人的攻势。

面对敌人调兵遣将，国民政府迅速增派各地军队赶至淞沪参战。卢兴荣的第五十二师奉令连夜开拔，奔赴战场，进至大场一带防御阵地。

日军见从侧翼突入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于是决定改分割包围为中央突破。10月1日开始，日海军、航空兵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4个师团的日军向蕴藻浜地区发动猛攻。中日双方激战四昼夜，蕴藻浜地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硬碰硬的正面交锋让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损失，当然中国军队的损失要大得多。这是一场敌我实力悬殊的仗，日军有海、空军助战，实施的是陆、海、空联合立体进攻，其火力之凶猛，连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中央军也从未见过。

蕴藻浜终告失守，大场便成了第一线阵地。

中国军队沿庙行、大场一带形成一个半圆



公馆峡民居，卢兴邦旧居、兵营

形防御阵地。卢部负责守卫大场西北角的一个阵地，这里地处平原地带，无险可凭，只能借助村庄的房屋、低矮的山丘、小树林等作为屏障，战壕掘出的土还是新鲜的，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硝烟味。敌人进攻时先是飞机狂轰滥炸，接着是炮火覆盖，然后是步坦协同攻击。习惯了山区作战的卢部此前还未经历过这种毁灭性的场面，震惊、恐惧是难免的，但很短暂，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拼死一搏的勇气。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战士们死守不退。最让人发怵的是敌方打头阵的坦克，轻重武器对它都奈何不得，卢部官兵想出了用集束手榴弹炸敌坦克履带的办法，炸瘫了两辆坦克，使其他坦克龟缩不前。卢部英勇拒敌，守住了阵地，但伤亡很大，正面迎敌的三〇七团损失过半，团长卢子安也身负重伤。



留闽二师留守人员卢氏兄弟和家属纪念照

这是白天的战况。入夜，卢兴荣根据上峰寻找战机主动出击的要求，组织起一支 500 多人的敢死队，身背大刀手持枪支，一部分人还携带了破除电网用的钳子。他们的任务是摸进敌方驻地，伺机杀伤敌有生力量。夜袭，是卢部的看家本领，这时候派上用场了。率领这支敢死队的是特务营营长吴德钧，卢兴荣送别这支敢死队时与他对视了片刻，两人都没有说话，黑暗中两人的眼睛都很亮，似乎要蹿出火苗子来。

他们有着共同的心愿：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敢死队潜进了日军驻扎的一个村庄，破除了敌人设置的四重电网，对敌发动突然袭击。喊杀声和枪声顿时响起，手榴弹爆炸发出的火光映红了夜空。敌人措手不及，

乱作一团，除一部分仓皇逃出村庄外，其余 300 多人被击毙。当东方天际被一缕晨曦染红时，日军占领的这个村庄已经完全被我掌控。

然而，凶残的日军迅速反扑，天刚放亮就派出多架飞机对这个村庄进行了灭绝性的轰炸，整个村庄被火海吞噬，来不及撤出的敢死队员英勇献身，只有吴德钧带着 20 多个人安全回到我军阵地。从未在人前流泪的这条汉子见到卢师长时不禁放声痛

哭，他恨自己没有及时带弟兄们撤回来。

面对日军的强大火力，卢部官兵苦战多日，虽消灭了大量敌军，但自身伤亡巨大，除留作预备队的杨作源三一二团外，其他几个团均已残破。卢兴荣奉令带着残部退守苏州河南岸阵地。与卢部协同作战同样受损严重的几支部队也转移了阵地。大场防线失守。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虽处于被动地位，一再后撤，但仍控制上海，这无疑是与日本当初的判断和盘算背道而驰。日本统帅部遂决定组建第十军，于11月5日拂晓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包抄中国军队防线的背后。后路被抄，中国军队全线震动，数十万大军顿陷危险境地。没有预防日本人这一招，让杭州湾防线形同虚设，这无疑是在蒋介石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

眼见形势不妙，蒋介石于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这个命令下得有点晚了，此时，苏州河



赴淞沪前夕卢部团长陈荣禄与杨作源等合影

北岸已有日本人身影出现，滞留在苏州河南岸地区的中国军队还有相当数量，其撤退之路有被封堵的危险，形势万分危急，离苏州河最近的卢兴荣部受命作为前锋抢渡苏州河，在北岸建立桥头堡，掩护其他部队过河。

卢兴荣派三一二团团长江作源带领本部官兵作为先锋队冲向苏州河，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北岸已被日军的一个先头部队占领。杨作源使命在身，唯有舍命向前，他组织火力掩护，自己带队强渡苏州河。河水不深，卢部官兵边蹚水边举枪向对岸的日军还击，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猛烈，卢部官兵纷纷中弹落水，大团大团的鲜血染红了苏州河的河水。杨作源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中国军队与日寇相持3个月，上海终沦于敌手。淞沪会战在战役上失败了，但是在战略上却有收获，成功地将日军原先定好的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这有利于中国的长期抗战。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了中国，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和不屈精神。

卢部官兵共4700人参战，牺牲了4300多人，只剩下伤员在内的400多人，因损失过重，战后番号被撤销了。但历史不会忘记这支具有传奇色彩的部队，卢部官兵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壮举，其归宿是悲壮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年的9月17日，卢兴邦病逝于双鲤家中，他临终前看到了日本人的下场，想来会含笑九泉的。

炽“火”袭“日”

薛宗耀

1944年10月1日中秋节，福州“市中歌舞升平”，鞭炮声此起彼伏。可叹这“十分好月，不照人圆”。在市外几十里的北峰和马尾地区，枪声“劈劈啪啪”昼夜不停，中国军队正在抵抗日本侵略军。

进入1944年下半年，日本法西斯为扭转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以“温州及福州附近沿海要域为目标”，企图通过派兵夺取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9月下旬，日寇对浙东用兵之后，侵犯福州的风声日紧。守军第八十师师长兼福州警备司令李良荣命令：驻扎在连江县的第二四〇团刘化之部，届时利用山地逐次抵抗，而后向福州收缩；驻扎在小北岭的第二三九团肖兆庚部，以副团长陈维金为前哨指挥部指挥官率部向东推进；驻扎在福州市区的第二三八团罗达时部，适时将主力转移到北岭，配合友军与日军决战。同时，驻扎在马尾地区的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李世甲部奉命沿闽江警戒，并防守鼓岭一带，伺机参加决战。

9月27日，日寇华中派遣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三军西原独立旅团山本联队所部和伪军等，由长岭熹一少将指挥，从连江县敖江口地区的浦口、东岱、晓澳等地强行登陆。28日，敌军占领连江县城和琯头岭，除了一部取丹阳向罗源方向推进外，其主力分兵经潘渡、汤岭、大北岭和经亭江、闽安、马尾，由北、东两个方向合击福州。中国军队从闽江沿岸至北岭全线抗击，激战数日，接连失利，伤亡惨重。

中秋节的第二天凌晨，战略高地北岭头失陷，形势急转直下。当晚10时，李良荣召集副师长谢懋权、参谋长杨绍任、参谋主任黄达平和3个团长等传达上峰命令，弃守福州市区，紧急西撤。3日起，第八十师陆续撤往闽侯县（国民政府于10月10日将其更名“林森县”）徐家村、江洋、大湖等地，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二旅撤往闽侯县桐口、白沙、大目埕一线。

当国民党守城军队开赴北岭前方作战时，当

局以福州市政筹备处警察局和福州救火联合会维护市区治安。

旧福州因“柴埕厝”（即木屋）比比皆是且连亘成片，最惧怕火灾。早先，救火以无专业组织的自救或互救为主，收效甚微。自南台“木帮”于清代道光年间组建救火会，各商帮或各街区纷纷仿照组建救火会，1919年成立“福州救火联合会”（简称“火联合会”）。他们以救火为主，也参与服务桑梓、保境安民等社会公益事业，类似于慈善团体，是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



福州救火联合会徽章

此时，“火联合会”理事长由双杭救火会会长徐建禧担任，办公地点设在隆平路双杭救火会。当局按战时需要，将他们编成战地消防大队，所属救火会均编成分队，拨付“光绪二十九年式”步枪310杆、子弹31000发，并略加训练，使之成为半军事化队伍。

当国民党军队突然后撤时，市政主要机关及其长官接到秘密通知，迅速撤往乌龙江南岸的闽侯县江口、上街和永泰县塘前、葛岭等地。市区警察在局长谢桂成的带领下，也悄悄地向西郊洪

山桥等地撤退，剩下战地消防大队独肩全市治安之责。

“桑梓耻重沦，知不可为犹奋起”

10月4日晨，日寇骑兵首先进入市区，福州第二次沦陷。事隔三年，市民们再次惊恐地看到，街上又出现不少张着血盆大口的“膏药旗”和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

消防大队各分队由城内撤往南台，虽然在水部、中选、上下杭、三保等地与日军连续发生接触，但毕竟不是敌野战部队的对手，不得不且战且退。当敌军夺船强渡帮洲封锁闽江时，徐建禧带领一部分临警援丁由桥北撤往桥南，取道凤岗里、白鹭岭、湾边渡过乌龙江，撤到闽侯县江口一带。

消防大队经过清点，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临警援丁因退路被封堵，仍处在敌人的魔掌之中。顿时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杀回市区搭救战友。徐建禧控制不了局面，即向撤退到江口的福建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何震报告。

自日军从连江登陆到进占福州的一周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报喜不报忧，给大家一个错觉，来犯的敌人只是强弩之末，很快就要被赶走。再加上，中国军队迅速后撤，并强调“各官兵应遵守机密，不准泄露风声”；而“当局对民众之撤退，事前尚缺乏缜密之计划，民众及物质于失陷前撤退甚少”。这样，当日军突然窜到家门口



中平路《南方日报》社旧址

时，不少单位、民众和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外籍人士，都没来得及撤离福州市区。

何震兼任青年团福建支团部干事、《南方日报》福州分社社长，该报社的一些员工因工作需要迟走一步，结果被困在中平路报社内。他立即与时任财政部福建省货运管理处处长、又是青年团系统的福州分团部干事江秀清商量，要借助“火联会”武装以及江口一带现有的青年团等其他民众武装，突袭市区营救被困的人员。另外，曾在国民党宪兵部队或特务机关供职的何震、江秀清，还接受一项秘密任务，设法就近解救被困在仓前山等地的外籍人士。

仓前山古称藤山或天宁山，自明代起在面向闽江的山麓修筑不少仓库屯盐，又称仓前山。仓前山的核心区域烟台山，修筑用以报警的烽烟台，故名。整个仓前山地区位于横跨闽江的万寿桥以南，亦称“桥南”，与“桥北”的商业区台江汛一带隔江相望。“五口通商”后，桥南逐步被洋人所占据。到了清末民初，这里不仅设有包括

日本在内的17个国家的驻闽领事馆，而且洋教堂、洋学校、洋医院、洋报馆、洋银行、洋酒楼星罗棋布，洋人、洋房、洋行、洋货、洋文触目可及，还有不少国民党军政官员、海内外巨商居住的别墅，几平方公里的地域一度成了洋人、“贵人”的乐园。

此次日寇窜犯福州，有一批伤病员随行。敌军强占仓前山的塔亭医院等教会医院作为医疗场所，英美籍院长、医师、护士等“为敌人所囚禁，不得出入”。另外，“英美两盟国在榕公私房屋财物，包括领事馆、仓前山英美人民住屋……均遭洗劫破坏”。“教堂遭洗劫后，多改为兵营或慰安所”，外国教士“为敌拘捕，加以监禁”，已有多人被屠杀。

4日晚，江口“镜江宋氏宗祠”内灯火通



仓前山塔亭医院旧址

明。何震、江秀清、徐建禧等有关人士商议，以福州救火联合会（即消防大队）、青年团福州战地青年服务队、福州青年国术社、闽侯县民众抗敌自卫队为中坚力量，一部突袭桥北的吉祥山、太平山、大庙山等地，营救被困的消防大队战友和《南方日报》社同人，一部突袭仓前山、上渡等桥南一带，名义上是牵制敌人、避免突袭桥北地区的队伍孤军作战，实际上还要给外籍人士趁乱逃脱创造机会。

商议时，虽然有个别人担心，这样的突袭行动太冒险，但大多数人认为，歼灭敌寇、营救战友，义不容辞且刻不容缓。他们分析：一则日军主力正在北岭与中国军队作战，进城的兵力仅三百人左右，分散在城台各处，便于突袭；二则敌人疲惫不堪、阵脚未稳、人地生疏，而我们有广大市民的支持，若再争取到军队的支援，突袭成功率极高；三则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等不如敌人，但我们为民族和国家存亡而战，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这是不可战胜的；四则通过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还可以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抗日斗志，其影响与效应难以估量，成败利弊在所不惜，即使不可为也要为之。

意见很快取得一致，议决成立指挥部，公推何震为指挥、江秀清和徐建禧为副指挥统一领导这次突袭行动。5日，指挥部派出几组人马，一组潜入市区侦察敌情，一组控制乌龙江北岸的湾边渡口接应，一组前往闽侯县大湖第八十师师部请援，决定6日实施突袭行动。

“雄心驱暴日，拼将热血洒三山”

6日黎明前，“四五蟾兔缺”，“长河没晓天”，波光明灭的乌龙江江面上，十余艘大小船只运载着三百余名“壮士”，鱼贯泊靠湾边码头。

突袭队伍集结、分组时，侦察人员赶回报告，敌寇已向市区“增兵三百余，其实力已增加一倍以上”。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打乱了既定的计划；如果这是我方有人泄露消息所致，那再贸然入，无异于飞蛾扑火。指挥部果断决定，留一小队防守湾边，其余返回南港待命。

指挥部在江口正筹划对策，又有侦察人员来报告，市区日军的人数和驻地并没有变化，所谓敌增兵的情报不实。为了探准敌情和做好充分准备，指挥部决定，增派人员潜入市区监视日方动态并联络我方营救对象的代表，突袭行动延至8日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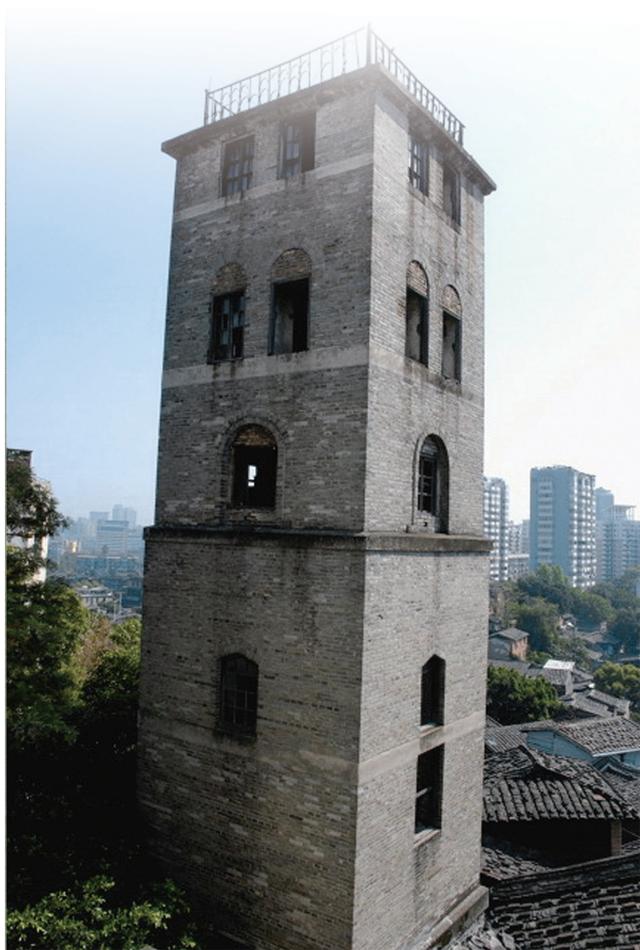
8日，适逢寒露节气。凌晨，阴云密布，星月无光。突袭队员们臂缠白布条为记，携带枪支弹药和《告市民书》等，再次北渡乌龙江。“气冷疑秋晚，声微觉夜阑”，在黯黑的江面上，只见用作各船照明或联络的灯光星星点点、时隐时现，如同夏夜飞舞的萤火虫。

东方甫白，突袭队伍在湾边聆听何震的简短动员后，立即向市区进发。每一个队员都胸怀“誓为桑邦流碧血”，“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与生而死、宁死而生”的壮志，奋臂前驱。

一部分队伍由青年团福州分团部书记陈维

光率领渡过闽江，从三保、义洲、帮洲登陆，突袭桥北之敌。指挥部带领其余队伍，突袭桥南之敌，其中，陈尘根、黄丙刚率第一队由鹅头凤岭攻入，翁西民、陈搏九率第二队由程埔头攻入，江秀瑜、谢永霖率第三队由对湖攻入，高恒、唐萱率第四队由岭后攻入，另有特务队随同指挥部行动。由于缺乏先进的通讯设备，大家相约，以大庙山火警钟楼的钟声为号，同时出击。

大庙山位于桥北上下杭地区，“火联会”在山上筑有报警的钟楼，平时向市民报时，每隔半小



大庙山火警瞭望台

时敲打一次，其打法仿照仓前山洋人报时的先例。

是日上午10时，大庙山火警钟楼的钟声打破惯例，连鸣不止，响彻闽江两岸。我方突袭队伍闻讯，同时向日寇发起攻击。在桥北，我方队伍冲至大庙山、上下杭、太平山、吉祥山等地。沿途市民欢呼雀跃，竞相手持刀枪、棍棒、扁担和消防器械助战，并将鞭炮放在洋油桶内燃放，以迷惑敌人且壮大声威。在桥南，我方各队先后占据仓前街、观音井、麦园路、对湖路、北台路、龙潭角、大岭顶、望北台等处，包围烟台山并乘胜争夺乐群楼（即万国俱乐部）等制高点 and 法、英、美领事馆等建筑物。军行所至，民众若狂，箪食壶浆，唯恐后至，临时自动参战者更不乏人。

霎时杀声四起，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是何方神兵天降，慌忙中分别龟缩青年会、文山学校、天一参行、交通银行、中南旅运社、崇圣庙等建筑物或烟台山等高地，凭险顽抗。我方突袭之初进展顺利，就不顾“完成任务立即撤退”的原计划，仍穷追猛打日军，以图扩大战果。然而，见过世面的日军从我方的枪声和攻势中，判断出遭遇的只是武器低劣、战术业余的非正规武装队伍，遂在援兵未到之前就开始反击，战局随之逆转。

在桥南，日寇在轻机关枪及榴弹筒火力的掩护下出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我方且战且退，由苍霞洲等地渡过闽江撤到南台岛，而后再渡过乌龙江返回南港。

在桥北，我方在关键时刻，轻机关枪一挺又

发生障碍，“器械窳败为敌所知，遂召集大队向我包围。我仍争冒敌火进迫，前仆后继图夺高地，或攻入屋内与敌肉搏”。鉴于局势越来越不利，有陷入重围之虞，指挥部下令后撤，大家“拼力冲杀，突围而出，退据白鹭岭高地。一部分由首山退集高盖妙峰寺，绕道至白鹭岭集中”。天黑后，敌军不敢深入郊外。我方固守待援，直至次晨10时，第八十师援军仍未至，只得退出阵地，经高宅、湾边返回南港。

此次突袭行动基本达到预期目的，营救出被困的相当一部分消防大队的临警援丁和《南方日报》的工作人员。同时，在外籍人士中，除了英美籍院长和一些医师因敌人监视较严不易逃出外，其他的包括协和高级护士学校学生们陆续逃出者甚多，均由闽清乘船，安全抵达南平。

“壮气贯长虹，留得大名光左海”

据《南方日报》报道：“火联会”等民众武装与日军“肉搏五小时，毙敌四十余名，获枪二枝、军用品一批”。《闽南新报》报道：“毙寇数十名，夺获战利品一批。”《中央日报》报道：“是役毙敌十数人。”《藤山志》记载：“计杀敌酋一名，敌兵七名，徒手毙敌一人，伤敌十余名，卤获三八式快枪二挺。”总之，此次行动有所斩获，并给敌寇当头一棒。此后，日军“不敢单人出行，出则武装结队”，“入夜即告戒严，盖敌惧怕我突袭之故”。

当然，此次突袭行动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由于我方参战人员奋勇冲杀，场面极为惨烈，救火会临警援丁牺牲13人（其中担任突袭桥南第一队队长、冯泛高救火会临警部主任陈尘根因身负重伤被俘，10月11日被敌杀害），指挥部工作人员或青年团员牺牲4人。市内民众闻风，亦多自动助战，殉难者达12人，有用竹扁担杀敌的刘太平，有手执木棍作战的16岁少年郑乌鼻，有高擎国旗冲入敌阵搏斗年仅14岁的小学生柯云炳。后来，大部分烈士遗体合葬在西门外原救火人员死难墓群。

1945年5月18日，福州第二次光复。6月24日上午7时，福州市各界三千多人在文艺剧场举行“三十三年（即1944年）十月八日福州民众抗敌殉难烈士追悼大会”。



1945年6月25日《中央日报（福州版）》

台上陈设祭堂，中置烈士灵位，两旁悬挂遗像。上下横列长桌，均罩以白色缎布，上排青花、鲜果、蜡烛和各种古玩。会堂四壁满结素彩青叶，楼上楼下摆放花圈千余面，周围遍挂各方挽联。其中有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挽联：“歼彼凶顽，义无反顾；嘉兹壮烈，魂兮归来。”闽浙监察使杨亮功挽联：“以铁血争生存，即今歼敌扫氛，伫看国威扬八表；为乡闾谋捍卫，不惜洞胸绝脰，长留浩气壮三山。”福州市政筹备处主任黄曾樾挽联：“为乡邦死难，与民族争光，裹革群钦当日烈；看俎豆荐馨，听铙歌奏凯，洗兵倘慰在天灵。”

福州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史家麟主祭，宋孝颖、林舫、何震、江秀清、陈维光、徐建禧、蔡友兰等陪祭，军委会、省政府、省青年团、执监委会、保安厅等机关代表先后向灵台致祭，全体与会者向死难家属行一鞠躬礼。

史家麟在致辞中概括此次突袭行动及烈士献身的意义：“我们福建历代民族英雄不知多少，近代民族英雄有两次史实，第一次是民前一年（即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第二次便是三十三年十月八日的抗敌之役，皆含有民族意义。”“我们烈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愿以血与汗来换取……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接着，黄素符、李世甲、林舫、何震、张翰仪、林超然等相继演说，“语均激昂悲壮、紧张凄切，全座为之动容”。

大会于10时结束，在乐队伴奏之下，“火联

会”全体临警援丁护送烈士灵位进入大庙山祠内安奉，“沿途观者如堵，皆肃然起敬”。

苍霞救火会救援服务地域内，从三捷透至平理桥有一条由小河改成的道路，该会即倡议改名“正义路”，以纪念此次突袭日寇的正义行动，缅怀在突袭行动中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包括该会临警部主任唐德务和援丁陈逸民、潘碧文在内诸志士，获得当局批准。

10月8日是突袭行动一周年纪念日，又逢寒露节气，正如一首描述“寒露”的古词所云：“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

上午8时，福州救火联合会在大庙山火警钟楼纪念堂举行“救火界反攻福州一周年纪念会”，徐建禧主持，何震、史家麟先后演讲。公祭毕，“发给殉难烈士遗族抚恤金每人三万元，受伤壮士抚助金每人一万元，该款系救火界全体同志所捐助”。当局许诺，“凡殉难烈士遗族，愿为介绍免费入学”。

下午2时，全体与会者前往烟台山，在军乐声和鞭炮声中举行纪念碑揭幕典礼。碑曰：“火联队”等民众武装“于八日拂晓……分四路并进市区，突击敌垒，所过闻风响应，执挺举刃，云涌相从，喊声震天，各以血肉之躯，持窳械与敌犀器，反复搏战，前仆后继，略有斩获”，“敌大为震惊，而我伤亡已累累矣”，“近之有黄花岗诸烈士，今则十月八日之役……怆怀诸烈，勒石纪绩，以垂永久”。

此生魂系中山舰

谨以此文献给爷爷张嵩龄

张小菁

武汉，金口，龙床矶旁江岸。冬雪已经消融，人们不顾寒冷的江风涌向这里。江水沉静，岸上却已人心澎湃。在长鸣的汽笛与震天的锣鼓声中，距离江岸百米的江面上，一艘长眠江底半个多世纪的名舰，带着斑斑锈迹和累累弹痕，缓缓露出水面，舰尾两侧铜鑲的“中山”二字清晰可辨——中山舰，在沉没江中59年后，第一次接受阳光的抚慰与人群的欢呼。此刻，不远处的观礼船上，一位耄耋老者，一只手紧紧扶着栏杆伫

立，目光悲欣交集，口中喃喃：“这是我们的舰，这是我们的舰……”

这位老者，便是中山舰幸存者、时任中山舰副电讯官张嵩龄。那一天，是1997年1月28日，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之日。

“一艘中山舰，半部中国近代海军史”。作为那场战斗的幸存者，中山舰在张嵩龄一生中打下深刻的烙印。重温一代名舰的百年沉浮史，也翻开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结缘中山舰

1913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依然风雨飘摇。是年，作为曾经的晚清“遗腹”舰——永丰舰（中山舰前身），开抵吴淞口，被正式编入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就在这一年，3月26日，张嵩龄出生于东南沿海一座与中国海军有着不解之缘的村庄——长乐琴江村。

琴江，因流经村前的江形似一把古琴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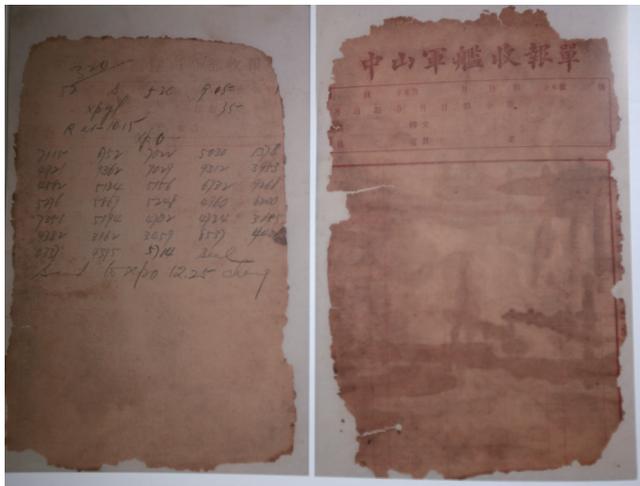
张嵩龄先生，摄于1934年中山舰服役期间

名。这座“去海不远、密迩省城”的村庄，曾是清朝三江口水师旗营的驻防地，小小的村子拥有众多的海军世家，他们多就读于中国海军的摇篮——马尾船政学堂及后来的福州海军学校。村里几代人几乎经历过近代东南海疆所有重大海战，包括1884年的那场惨烈的马江海战……从琴江走出的张嵩龄，他的生命航程也不可避免地与“海”结缘，并承载着沉重的家国情怀。

琴江人素有文武并重之传统。张嵩龄就出身书香世家，其曾祖父张长春是清代军机大臣荣禄的塾师；祖父张朝禄也是清代举人，曾任福建海沧县令；父亲张吉侯在辛亥革命后，在福州一家由法国人创办的阳光学校任学监，并兼马尾海军飞潜学校教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自小显露了聪颖之质的张嵩龄却经历了5岁丧母、7岁丧父、15岁续母去世之痛，童年颠沛流离，尝尽苦难，也正因如此，年少的他更加坚忍和勤奋。

15岁时，张嵩龄考入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当时“艺术”的概念与今日不同，但凡工艺、技术之类，均称“艺术”。学校以英文和法文教学，这为张嵩龄日后大量研读外文技术书籍奠定了基础。入校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第二学期便因成绩特别优秀学费全免，第三、四学期连膳食费都免了。

1930年，张嵩龄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海军水鱼雷营附设的无线电班。1932年，从无线电班毕业后，他先是被派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见习，一年后被派往厦



从中山舰上打捞出的张嵩龄的电报稿

门海军海岸无线电台工作。1934年，21岁的他调任中山舰副电讯官。从此，他的命运与中山舰一生相系。

此时的中山舰，便是当年的永丰舰。在经历了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等震惊中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为纪念逝世的孙中山先生，永丰舰于1925年更名为“中山舰”。孙中山广州蒙难时，曾登上该舰指挥平叛，与舰上官兵一起度过“同生死共患难”的55天。能到中山舰上服役，张嵩龄引以为荣，随他上舰的行李除了极少的衣物用品，便是满满几箱的无线电书籍，他渴望施展才华，报效国家。而此时，战争的阴霾正渐渐逼近……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拉开八年抗战的序幕。在上海失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退守“陪都”重庆，武汉一线成为必须死守的防线，武汉大会战打响了。

金口之殇

金口，是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古镇。它距离武汉上游26公里，雄踞长江中游要冲，易守难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便发生于金口赤矶山下。对于张嵩龄来说，金口，则是铭刻心底的创痛。

时间，定格在1938年10月24日。

这天一早，武汉拉响了防空警报。不久，张嵩龄在舰上接收到海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中山舰赴金口待命。他赶紧报告舰长萨师俊。

萨师俊，中山舰第14任舰长，福州人。年轻英武的他是中国近代海军元老萨镇冰的侄孙。26年前，正是萨镇冰为强壮海军，与晚清海军大臣载洵一起从日本将中山舰定购回国。26年后，中国海军却已在抗日战场中付出惨重的代价。江阴之战，为形成长江封锁线，48艘中国战舰以决绝的姿态自沉江阴，中山舰也成为此战后长江上所剩无几的主力战舰之一。

上午9时许，当中山舰奉命抵达金口水域



1923年，孙中山先生再度登上中山舰慰问官兵并合影

时，远方天空忽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只见一架日军侦察机由远而近飞临中山舰上空。萨师俊一声令下，枪炮齐鸣，敌机一个转身，仓皇逃离。

望着远去的日军侦察机，张嵩龄明白，一场恶战即将开始，战友们严阵以待。此时，中山舰的主炮已被拆卸支援岸上要塞，现有的武器只剩下：舰首瑞士制欧立肯20厘米机关炮；舰尾德制苏罗通20厘米高射炮；前驾驶室的2尊机关炮只能打60度以下的仰角，舰尾还有改装的2架捷克式机关枪。尽管这些武器均年代久远，杀伤力十分有限，但全舰官兵同仇敌忾，抱定决一死战之心。

果然，下午3时左右，6架敌机呈轰炸队形呼啸而来。3时06分，张嵩龄向海军司令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中山舰与敌遭遇。

敌机的第一轮轰炸呈一字鱼贯阵，轮番平行投弹。萨师俊指挥着中山舰一面在巨大的水柱间蜿蜒穿行，躲避炸弹，一面将所有枪炮朝向敌机齐射，织就严密的火网。敌机见无法得逞，第二轮轰炸即改变阵势，以轮流急俯冲方式低空投弹。就在这紧要关头，舰首老旧的高射炮突发故障变哑，强大的火网立刻出现空档，敌机趁虚而入，发起第三轮攻击。炸弹如雨点般落在舰上，先是左舷机舱被炸裂漏水，舵机操纵失控，紧接着锅炉舱被炸、船头机关炮被毁，几名炮手当场牺牲；舰上多处起火，舰身开始倾斜……正在电报房紧张工作的张嵩龄此刻也冲出来，忙着和战友一起搬运弹药。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指挥台附



1997年1月28日，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仪式在武汉金口举行



1997年1月27日，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仪式前一天，张嵩龄和董树仁两位幸存者时隔59年后重逢

近，舰长萨师俊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他左腿被炸断，右腿受重伤，血肉模糊。强忍剧痛的他，竟紧抓住指挥台边的护栏坐起，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指挥杀敌。

此时，遭受重创的中山舰已经严重倾斜45度以上，江水不断涌入，副舰长吕叔奋见状，果断命令放下舰上两艘舢板，准备把受伤的官兵和舰长萨师俊背上舢板。不想，萨师俊断然拒绝：“诸人尽可离舰，唯我身任舰长，职责所在，万难离此一步！此舰乃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座舰，我誓与舰共存亡！”闻此言见此状，官兵们莫不动容。时间紧迫，19岁的勤务兵黄珠官不由分说，硬是把萨师俊背上了舢板。

没想到的是，此时日机竟然违反国际公约，疯狂地俯冲追杀离舰伤员。萨师俊军服上那醒目的高级将领标志的金袖边，让他成为敌机集中扫射的目标。顷刻间，两只舢板上20多名将士全部牺牲，鲜血染红了江面。

在舰上目睹此景，张嵩龄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由于舰体迅速下沉，他和舰上其他官兵不得不纵身跃入江中，刚游出30米远，只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望见一片浓烟与火光中的中山舰，高高地昂起舰首，之后，轰然沉没。那一声巨响，犹如最后的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舰，从此含恨于滔滔江水之下。

那天傍晚，金口乡亲一共救起包括张嵩龄在内的18名中山舰幸存者。夜里，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也赶到金口，布置打捞埋葬阵亡将士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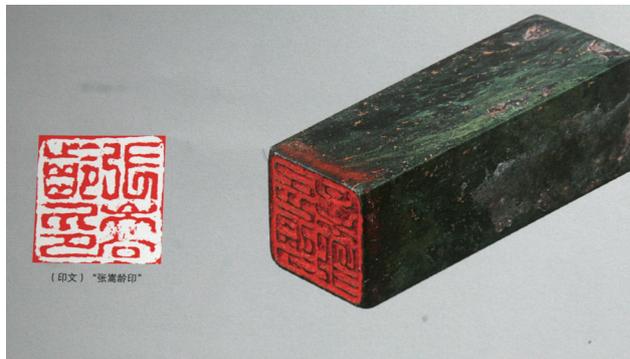
长江无辜吞忠魂。此役，共有25名将士阵亡，其中16人来自福州，最小的黄珠官只有19岁。另一名叫林逸资的一等兵是刚告别新婚的妻子，赶到前线来杀敌的。而舰长萨师俊，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海军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将领。

当时暂居香港的宋庆龄女士，惊闻中山舰沉没，于悲恸之中写下挽联：

广州护领袖，武汉杀寇仇，成功成仁，旧名



从中山舰上打捞出的张嵩龄用过的铭文瓷碟



从中山舰上打捞出的张嵩龄的印章



中山舰标牌



经修复后陈列于博物馆的中山舰

新名，芬芳留百世；
 黄海捐世昌，长江失师俊，可歌可泣，前浪
 后浪，澎湃搏千秋。

永不沉没

百年沉浮烟云间。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晚年的张嵩龄早已宠辱不惊。然而，当他在长江边看到中山舰出水的那一刻，内心还是波涛翻滚。

中山舰沉没后，张嵩龄被派往前线第六战区的一个要塞——石碑炮台（今湖北宜昌附近），

任第一总台部通讯员。他在这里一待就是3年，其间又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2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来到云南为“飞虎队”修建巫家坝机场和陆良机场，直至1949年参加著名的“两航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开创云南航空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等功两次。而最让他自豪的是1964年，他以精湛的业务技术成功开辟了以昆明为基地的导航通道，历时51天，为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顺利导航。为此他受到中央军委的全军通报嘉奖，及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辈子把“海陆空”工作都干了一遍的他，

直到70岁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没想到，一场浩大的中山舰打捞工程，又把他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

199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山舰打捞工程正式启动。

消息传来，张嵩龄兴奋不已。而此时，在海峡彼岸的台湾，陈鸣铮等3位中山舰幸存者也在热切的期待中。几十年来，他们每年10月24日都会聚在一起，朝向大陆的方向祭拜当年牺牲的战友。张嵩龄当时已经陆续找到5位幸存的战友：台湾的陈鸣铮（见习轮机官），福州的魏振基（枪炮长），叶炳中（书记官），广州的吕叔奋（副舰长），上海的董树仁（轮机兵）。老兵们相约：中山舰出水之日再相聚。

1997年1月28日，中外瞩目的中山舰打捞整体出水仪式在金口举行，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魏振基等3位幸存者相继辞世，同来参加仪式的董树仁由于身体状况不好，一到武汉就住进了医院。于是，从昆明赶来的张嵩龄作为唯一参加出水仪式的幸存者，被几百名记者团团围住。当说到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地朝舢板上的萨师俊开枪扫射时，他悲愤得声音颤抖，“百年奇耻，雪于今朝啊！”在老人看来，中山舰由沉而浮，正是祖国由弱而强的象征。那一年，恰恰是“七七”抗战60周年，他寄往福州的家信也特别多，字里行间，抚今追昔，无限感慨。

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年代最久远的、唯一的历史见证物，中山舰随舰出水的文物数量之多

也是罕见的。在3400余件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就达51件（套）。原中山舰纪念馆馆长叶俊之回忆，在中山舰的打捞和文物鉴定过程中，作为幸存者的张嵩龄成为最权威的顾问，并且打捞出的文物中数他的最多，包括印章、钢笔、瓷盘等。特别是在他船舱内发现的1000多张电报稿，经过文物部门脱水处理，字迹清晰可辨。这些1935年至1937年间的电报稿的破译，对研究当时的海军史与海战史具有重要军事价值。

2011年，中山舰博物馆终于在金口建成并正式开放。但遗憾的是，张嵩龄没有等到。2001年4月4日夜，他平静地走了，享年88岁。去世第二天，新华社专门发了消息，称他是“一位特殊的世纪老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2003年10月24日，在中山舰在大陆的最后一位幸存者邱奕殿的奔走呼吁下，中山舰福州籍将士纪念碑落成。两个月后，老人安然辞世，享年86岁。

2013年10月，远在台湾的幸存者陈鸣铮也走完了他99年的传奇春秋。他是福州人，生前曾多次带着鲜花和福州老酒，到武汉凭吊牺牲的战友。

目前，中山舰幸存者只剩下在美国的近百岁的张奇骏。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今天，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苦难与坎坷、见证了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与坚强信念的中山舰，已经重新屹立在长江之滨。

独善其身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康延平

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标志着拥有4亿5千万人口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里重要的一支力量。

一、天生的职业革命家

林森，1868年生，福建闽侯人，字子超，号青芝老人。1931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遭各派反对被迫下野时，留了个心眼，将“主席”一职改为虚职，于是63岁的国父级元老林森被推上主席之位后，只能虚着，一直虚到1943年逝世为止。

林公其实是个血性十足的人，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除了东奔西走生活没保障外，还数次遭受政府通缉连性命都没有保障，可他硬是认准



林森

了革命，不准备回头。他甚至参加过策划暗杀亲日派人物的活动，可见他从来就是一个有胆有识有行动的革命者。

可他被推上主席虚位后，为什么没了革命脾气？

因为那时的他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多年

的革命实践告诉他，积弱的中国，前途渺茫，其中有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因此需要弱化内斗，团结各方力量，去改变现状。所以林公只能静化自己，委曲求全。

他奉行的从政理念——不争权夺权、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这“三不”原则，成就了一个在政界上让后人高山仰止的林森。

这，正是林公从政的智慧。比如迁都洛阳时，洛阳警备司令来拜访，他拒绝接见，并路标似的指点所有官员——武官直接去见蒋介石，文官去见汪精卫，不必到他这里来。老蒋不但不疑，还对林森添了三分敬重。

但林公不是无所作为。

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搞的“伪满洲国”；他在“西安事变”后，两次以主席的名义，下发了对张学良的赦免令复权令；他手书“抗战必胜”的条幅，通过新闻媒体激励全国军民团结抗战；他力主开除汉奸汪精卫的党籍并明令通缉之；他以国家主席名义，向德日意三国宣战；他在废除美英在华不平等条约上不停地努力；他对大权独揽的蒋介石配合而不迎合、礼貌而不恭敬……凡此种种，说明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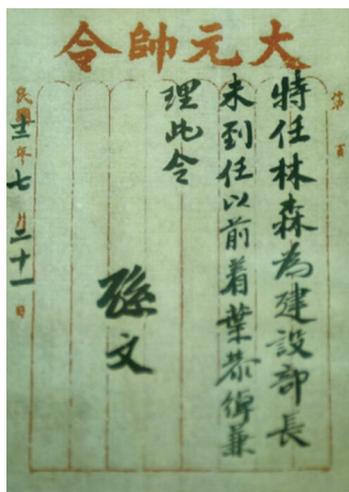
说明林公一直是个血性男儿！

1943年5月，一场车祸导致林公去世。国民政府为他举行隆重国葬，中共中央也致唁电称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

二、革命者不需家小

读书，谋一个好差事，娶妻生子，林森原本是可以顺着父母指引的路，安安稳稳地过上属于自己的好日子。会英文，在当时起点不低；台北虽离老家远了点，可电信局的工作，又体面又是铁饭碗；结发的妻子虽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娶回的，可人家相貌端庄贤惠淑良……只是林森天生忧国忧民，看到朝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愤怒不已，他怀揣一腔热血，参加了台湾的抗日组织。自然，这些小组在日寇接管后强化了当地政府面前，只能螳臂挡车，林森们只能以屡屡失败告终。台湾弹丸之地，日本人到处搜捕这些个胆大妄为者，林森待不下去了，只好扔了铁饭碗，潜回老家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

也许林森过于热心国事，与妻子聚少离多，冷落了妻子。婚后3年，发妻便病逝了。妻子病



林森的任状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排中)接受美国大使高思(前排左二)递交国书后一起合影

后,他又开始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

孙中山一直是林森的指路明灯,孙中山的主张深得林森认同:不但要推翻帝制,还要创建一个共和的国家。多少个夜晚,林森激情地设想着共和之国在自己的祖国诞生。

这就需要反清加抗日。自然,这是断头的差事,只能惹祸上身。1899年因日本

当局再度逮捕林森,他只好再度潜回老家闽侯。

1902年,林森考入上海海关任职。那时的中国,处处可以有革命组织,林森便着手组建沪福建学生会。为了唤醒民众,林森他们创办了福州阅报社,宣传西式民主,宣传革命理想。看看林森著述的《闽警》一书,从“人心死、失土地、失矿产、失航利、学界之腐败、兵备之废弛”到“日本想谋取福建”,其中罗列着林林总总的事实、清清楚楚的数字,就知道他爱国爱得有多深沉、爱闽爱得有多具体。

1909年,他由上海调往江西省九江海关工作,在九江设立了当阳书报社,继续宣传革命。这时的他还通过工作上的人脉关系,创办了商团组织;还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联络新军,为武装反清作准备。

到了1911年,43岁的林森已让革命岁月煅

逝他痛心,然而也得出“一个脑袋”与“一家脑袋”哪个多的从政算术题,于是面对从小暗恋并决意与他私奔的表妹,他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放弃。他这是爱护表妹啊!哪料表妹以为表哥不中意自己,再加上父母订的婚事马上就要举行,痴情加性烈的她用挂首东南枝表示了对家人对婚姻的抗议。

这个晴天霹雳让林森心疼肝裂。两个女人都用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离他而去,使林森更坚定了终生不娶的念头。有人讲林森一辈子箱藏疑是表妹的头骨,还有枕边那放了一辈子最后成了随葬品的不知是亡妻还是亡妹的绣花鞋,这都是林森对所爱之人有情有义的表现。

1898年林森为了加入兴中会,再度赴台。由于他的英语很好,考取了台南地区法院嘉义支部,当了一名通译员。有了谋生手段可以立足

造成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推翻封建王朝的序幕。23日，九江响应起义，之后，林森担当起九江军政府民政长的要职，正式在从政的舞台上亮相。

次年1月，林森被委以重任，担任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3年4月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里，林森和国家一起经历了起起落落，但他革命意志不但没有衰退，而且越战越强。

三、清廉一生的极品

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国家公务员之首，林森给各级公务员做出了表率。做什么表率？林森选择了清廉。

胡适1934年有篇文章谈到林森对国民党官员普遍纳妾的反感，他写道，在去庐山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凳，上面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许坐”八个大字。有人看了觉得好笑，说：我若有姨太太，偏要坐坐看，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但胡适认为这正是林主席的过人之处，他说：你有姨太太，你尽管去坐，绝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

为了清廉能持之以恒，林森一直用平民生活，时刻警醒自己。

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

帽或黑色礼帽。饮食也很简单，粗茶淡饭、素食居多且烟酒不沾。在国难时期，更是简朴，每天规定厨师只能买两角钱的肉。外出时轻车简从，除司机外，大多不带侍卫。闲暇之时，还经常深入民间了解疾苦，路遇农夫乡民，便闲话桑麻。很多和他谈过话的人，只知对方是“长须老者”，不知对方是“国府主席”。

林森没有孩子，按中国传统，得过继一个，于是侄儿林京便成为他的嗣子。林森对林京严格要求，防止他变成纨绔子弟。可偏偏林京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时，隐瞒婚史与一美国妞又谈了一场恋爱。林森得知此事极为震怒，即电嘱驻美大使强令林京回国。林京归来后上了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当英文秘书，战斗中不幸殉难。

林森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极其严格。一次，他的秘书想到一个政府的重要宴会上开开



林森手植雪松照

眼界，向他请假时，平时不怎么动怒的林森却呵斥了秘书。要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林森正是看到当时的政坛像个大染缸，秘书出去社交，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污染。

抗战开始后，国府迁至重庆，林森看见蒋介石的别墅花草众多，不由赞叹了一句，想不到蒋介石心软了一下，将别墅赠给林森，改名“林园”。林森这才有了一个像样的住处。林森有闲时，就玩玩花草、古董字画什么的。他喜欢古玩，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三五元上下最多了。林森逝世后，国民政府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上千件藏品拿去拍卖，这才知道这些古董字画并不值钱，有许多还是赝品。不过由于是林森遗物，盖有“青芝老人鉴赏”的朱印，字画身价得到提升，三天之内全都拍完，得银圆近万元。之后，连同林公存款 50 万元，按遗嘱全部捐给福建闽侯林森故乡的中学，作为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公祭林森典礼

四、抗战第一元首

面对日寇入侵东北三省，自忖武力有限的蒋介石并不准备马上应战。

1932 年“淞沪抗战”期间，见蒋介石、汪精卫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林森急了。2 月 24 日，他在洛阳通过记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坚定地表示：“外交问题，政府不屈服，国人亦自身奋斗，始有出路。”

3 月 3 日，在国联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开始谈判。林森深知这是与虎谋食。4 月 15 日，中日谈判还在进行中，林森又在上海发表谈话：“当此强邻压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我国军火财政，虽两俱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绝无委屈妥协之可能。本人忝主中枢，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去做，各党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



林森墓

心，否则同归于尽。”

多么铿锵有力！也显示了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极为不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导演了“卢沟桥事变”，导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日，林森在分析当前时局中指出：“我们的领土主权若是受到侵害，甚至危害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独立生存时，那么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生存起见，便只有起来抗战……不抵抗，便只有灭亡，还说得到和平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森关于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论述——8月16日，林森在国府纪念周演讲时就以《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为题，强调指出：“全国国民也应该深深认识目前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难，把保卫国土看做每个人自己应尽的天职，协助政府，奋斗到底，以达到我们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在1938年的元旦讲话中，林森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力，明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观点。林森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政治、经济、道义、国土资源、国际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国力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必然失败，中国在军事上虽然一时失利，但只要坚持长期抗战，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七七事变”后不到5个月，日寇占领了上海，威胁南京。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此时正值林森的古稀之年，他向蒋介石

等人辞行时说：“我已是古稀之人，将来是否能回到南京，已不敢作想，但你们一定要坚决抗日，肯定会取得胜利！”

1938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投敌叛国。1939年1月1日，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慑于林森的威望，汪精卫致电林森，恳请他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这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会遭到林森的严拒。但汪精卫仍旧在表演，不然怎么叫“政治舞台”呢？他“谦逊”地宣布自己任的是“代理主席”，准备随时“位还”林森。林森立即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昭告全天下：“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

林森逝世了。国民政府发布褒崇令曰：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以高龄钜德，任职十有二年，恭己临民，睿谟默运，育成民德，邦本用宁。故能临大事，决大疑，处变而不惊，慎谋而能断。

这就是对林公政治品质最好的总结。

大道至简

——池步洲和他的人生密码

杨静南

—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和往日一样，在重庆南岸黄桷桠刘家花园内破译从对面南山驰马送来的密电报。此时，中日之间虽然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但自卢沟桥事变起，两个国家已经苦斗了四年有余。几年以来，日军不断对重庆进行战略性轰炸，陪都上空时不时就响起防空警报的声音。空袭过后，被炸毁的房屋熊熊燃烧，歪斜的屋宇被弹片打得零零落落，树杈上挂着褴褛的布片，甚至是血淋淋的断肢，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悲痛的哭声和绝望的惨叫。即使没有空袭，重庆暗黑色的夜空也并不平静，在池步洲看来，这样的夜色里极有可能流淌着惊人的秘密。

这天晚上，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美



青年池步洲

国使馆的密电报引起了池步洲的注意。这封密电报通知日本野村大使，帝国政府决定将按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

断然措施！这意味着日本将要某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攻击。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会是哪



池步洲故居

里？池步洲想起几个月以来日本外务省与驻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密电报往来的异常。过去，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总领馆之间的电报往来通常只涉及侨民、商权和贸易方面的情况，这是一个总领馆的正常职能，但近半年来，外务省与檀香山总领馆之间密电报不仅数量猛增，内容也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舰艇数量、名称、停泊位置、出港时间，官兵上岸下海规律，乃至夏威夷天气状况的军事间谍情报。

1941年10月份，日本外务省突然电令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越南）、暹罗（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日本使领馆，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码本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烧毁，同时颁布了一些隐语代号，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

家”表示“撤侨”，“东风，雨”表示“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外务省电令中明白规定这些隐语代号在必要时都将由无线电广播电台播放，要求各使领馆随时注意收听。

根据以前译出的密电报，池步洲判断，断然措施意味着“东风，雨”了，日军攻击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马上把译出的密电报送交给了组长霍实子。很快，情报被送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将密电报的内容通知了罗斯福。

5天以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关于罗斯福接到中方情报后的反应，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罗斯福不相信中国研译密码的能力，麻痹大意，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罗斯福不得不用珍珠港事件来刺激国会，以此让他们通过战争法案。

不管怎么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英国同

时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序幕的揭开，让蒋介石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蒋介石明白，他已经胜券在握，打败日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二

池步洲籍贯福建闽清县三溪乡。新中国成立以前，闽清是一个农业县，城关距离福州大约50公里。2003年，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之际，闽清县政府在台山公园为池步洲立了块碑。至于池步洲家里的老房子，据说已经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了。

池步洲的家族原本世代务农。北伐之时，池步洲的五哥池步云在街头听了演讲，热血沸腾，给家里留了口信，就跟着部队北上了。池步洲的这个哥哥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福州督军公署见习，池步洲这才有机会从闽清出来读书。在光华书院，池步洲用9年时间修完了别人需要12年才能读完的课程，之后，他五哥又倾其所有，甚至让妻子卖掉陪嫁的金银首饰，凑了3000块大洋，让这个聪慧的小弟到日本留学。

池步洲在日本东京大学机电工程系学习，毕业后在中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找了份工作，之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济知识。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正离职家居从事写作。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池步洲觉得再也无法安心在日本待下去，他想立即回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37年7月25日，池步洲携妻子和3个孩子自东京赴神户，

在那里搭乘轮船“上海丸”回国。

回国之际，国内已是一片兵荒马乱。池步洲抵达南京后，发现国民党政府的各个机关已经撤退得差不多了，他认识的一些留日同学也早已他去，一个也没找到。他们一家人只好暂时在华侨招待所里住下。华侨招待所是国民党政府设的，对归国抗日的留学生免费提供食宿。池步洲晚年回忆当时情形，日本飞机过来空袭的时候，因为华侨招待所附近没有防空洞可躲，他们一家人只得蒙着棉被，钻到床铺底下躲避。池步洲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门窗玻璃多被震坏，只是当时年轻，没有战争经验，对此并不太感可怕，以为大不了为国捐躯，一死而已。”

9月中旬，淞沪前线炮火纷飞，池步洲在南京华侨招待所内却不知何去何从。这一天，他在招待所走廊上遇到留日同学陈固亭，陈固亭早池步洲半年回国，当时是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来南京办事，恰好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内。同学见面，倍感亲切。池步洲讲了自己回国抗日却找不



陈固亭

到合适岗位的情况，请陈固亭帮他看看是否有合适工作。

几天以后，陈固亭来找池步洲，说国民党中央正在物色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问池步洲是否有兴趣。池步洲觉得密电码不是自己专业，而且也无处可学，感觉难以从命。陈固亭却认为日语好就是有利条件，他搬出蒋介石的话来，说“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池步洲被“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一语所打动，就答应了下来。

在陈固亭推荐下，池步洲进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总务组机密二股，等待侦收日本密电码。自此，池步洲先后在中统第一处国际密电室、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等机构待过，就像一只壁虎，他渐渐隐匿于一个时代最为幽深的阴影之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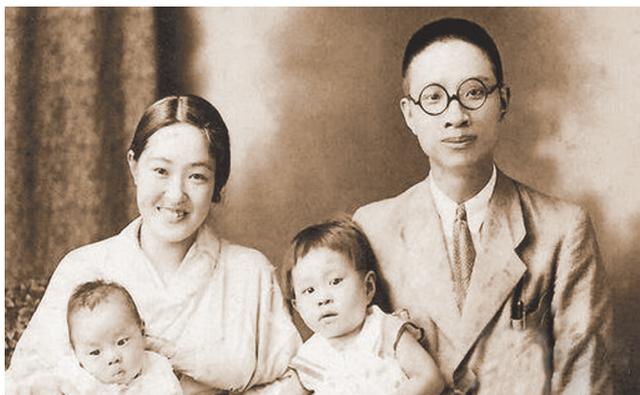
在日本求学时，池步洲邂逅了一生挚爱的女人白滨英子。

白滨英子读过一些翻译的中国文字，对古老的中国特别感兴趣。认识池步洲那一年，白滨英子刚从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她的一个女同学因为要去会中国男朋友，就拉她一起去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白滨英子不懂中文，也没有熟人，只能在会场上干坐着。那天晚上，池步洲正好坐在白滨英子旁边，见她枯坐无聊，就用日本话跟她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这次见面，完全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池步洲发现白滨英子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白滨英子对池步洲也是一见倾心，以至于池步洲大学尚未毕业，就在东京迎娶了她。除此之外，关于白滨英子，有限的史料上并没有更多记载，就连池步洲本人所撰的回忆录里面，也没有提到白滨英子的更多信息。

池步洲留学之际，日本早已经脱亚入欧，不仅追随美国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转型，还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重创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在这次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从此有了和白人强国一决高下的信心。于是，帝国主义思想膨胀，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一套套殖民理论在日本国内逐步完善。在这样的国度里留学，不用说，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心中肯定会有或隐或显的耻辱感，但与此同时，在日本前前后后待了8年，日本文明的另一些优秀之处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池步洲，这是青



池步洲与妻儿



1985年池步洲在日本大阪市

春期最为重要的经历，更何况他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生下了3个中日混血的孩子。当日本阴谋策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池步洲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他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人生异常重要的一个路口。

在一张池步洲夫妇的合影上，可以看到白滨英子的形象：贤惠、端庄、眼睛明亮，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子。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们夫妇间交谈过一些什么，在作出回中国的决定时有没有分歧与龃龉。可以确认的只是事实：国难当头的时候，白滨英子跟着她的中国丈夫，不远万里回到了正在遭受侵略，弥漫着血腥与焦土气息的故国。在神户码头，他们一家人受到了阻拦，还是得到白滨英子弟弟的帮助才得以登船。关于中日战争，日本政府在国内肯定做足了宣传，一个温婉的女子又是如何看透这冠冕堂皇的重重迷雾？还是她仅仅执着于最单纯同时也最深切的愿望，要始终和那个看似柔弱，实则

坚强的中国男人在一起，哪怕她要因此远离自己的娘家与故土？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白滨英子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但前路所充满的艰辛与危险，这个日本女子应该想象得到。返回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确实总处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从南京到益阳，从益阳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从汉口再到重庆，这一路上的炮火纷飞就不去说了，最让他们夫妇悲痛的是，在长沙期间，因为出疹子被误诊，他们一周之内失去了两个女儿。

按照常理，池步洲密码破译人员的身份是不能泄露的，不知道白滨英子是不是清楚她丈夫的这一身份。在重庆的漫漫长夜，当池步洲不在家里，空中又响起日本战机空袭的声音时，白滨英子内心深处的撕扯是可以想见的。

四

1943年4月，池步洲破译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即将前往南洋前线视察的密电。山本五十六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他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首倡者和指挥者，被人称为“海军之花”，在日本军界享有压倒全海军的威望。4月18日，当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在1500米的高空接近目的地巴拉勒机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16架美国战机从更高处俯冲下来，在一番逃避、追逐之后，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在原始森林之中，这个

让许多人闻之色变的梟雄手握军刀，躺倒在他的座位之上。当山本五十六被击毙的消息传到重庆时，池步洲或许会想起那句“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的话，于嘴边浮起一抹隐隐的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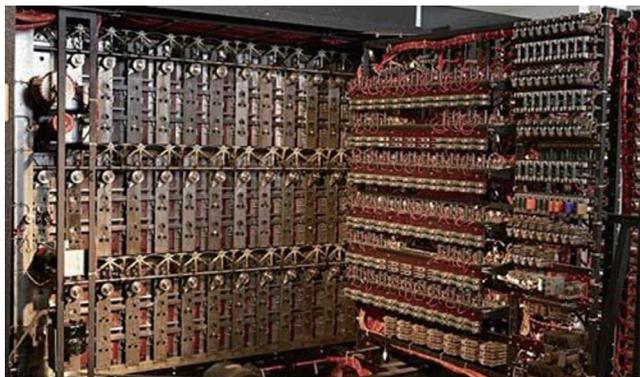
在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人们纷纷披挂上阵，但这种时候，恰恰也最能见出每一个人灵魂的本色。池步洲在回忆录里提到了军技室内国民党不同派系的争权夺利，出于敏感和天性，他避开了这一切。在刚进入密电码破译领域时，他被编入中统总务组机密二股。由于对国内情况不够了解，一开始，他还以为这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调查统计机构，幸亏中共卧底李直峰的关照，他才没有履行填写组织表、宣誓等等程序，得以免去终生受控于中统特务组织的命运。

抗日战争结束后，虽然已经获得少将军衔，但池步洲不愿意参加国共内战，一度带着妻儿返回闽清乡间居住。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也没有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池步洲以“留用人员”身份，在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工作。全国镇反运动中，因为曾有在中统机关从事密电研译的经历，池步洲被认定为中统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直到1963年5月才刑满释放。1983年4月，时隔30年后，池步洲获得平反，此时，他已经是一个耄耋老者。

池步洲的一生虽然跌宕传奇，其中也不乏命运的簸弄，但几个关键节点都由他自己做出抉择。他的思路清晰、果断，始终站在民族和人类的大义之上，而没有那些常见的鸡零狗碎。从这一点来看，池步洲的人生完全可以说是大道至简，他用这种可贵的密码编织了自己的人生。

在生命晚年，池步洲陪伴白滨英子回到日本，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十几年后，因为对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的眷恋，池步洲的儿子池哲雄又回到重庆居住。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改为白滨哲雄，如同他父母的人生，这个名字里交织着国家与民族、大义与亲情、爱与惆怅种种复杂的色彩。



复原的“二战”时期用于破译纳粹情报的密码机



英格玛密码机



克里亥密码机

她的名字与勇敢联在一起

——记抗日女杰舒诚

刘琳

—

1921年11月，舒诚生于福州蒙古营沙帽井一个满族正白旗家庭，其时家道已中落。好在给人当账房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工余卖字赚钱，供女儿读书。父亲十分疼爱颇有男儿气的舒诚，亲自教女儿写毛笔字，使得舒诚小小年纪便写得一手好字，方圆一片很有些名气。每年春节前舒诚通过写春联赚钱，不但使家里的年夜饭有鸡有鱼，有时还能为自己扯上一身新衣服。

舒诚不但字好，学业也十分优良，先后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小学（今实验小学）、省立第一中学（今福州一中）。因关心同学，热心组织学生活动，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号召力，这也为她后来快速成长为福州青年抗日领袖奠定了基础。

1937年9月，舒诚投身中共领导的福州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1月，由当时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助和林白胞妹林琼介绍入党。1938年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铁南来福州，出任

中共福州工委书记。李铁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对发动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极有经验。他到任之后，着手成立了中共福州市工委青年工作委员会，舒诚出任组织委员，参与领导福州青年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依照中共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舒诚着手筹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她的奔走努力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建总队正式成立。

在共同抗日的活动中，舒诚与福州“毛茶大王”欧阳家族的年轻一代成为极好的朋友。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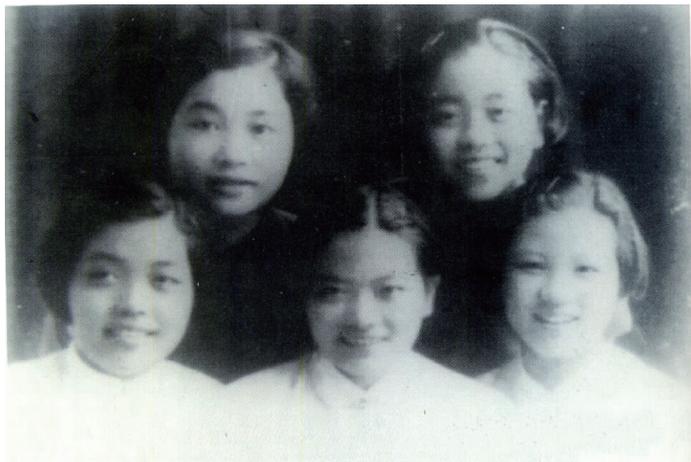


担任“民先”福州市队部党团书记的舒诚

阳家族为茶商世家，于福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设有多家茶行，在台江下杭有一家集收购毛茶、制作和批发花茶、茶农客栈于一体的生顺茶栈。舒诚发现此地人来人往，可以起很好的掩护作用，欧阳家族儿女欧阳天定、欧阳琼、欧阳秀等人又一心抗日，认为这里可以建成党的堡垒。1938年，中华民族先锋队福州市队在生顺茶栈成立，欧阳天定为队长，舒诚担任党团书记。

根据工作需要，舒诚奉命辍学专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从那时开始，舒诚日夜穿梭于各大中专院校、工厂、农村，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各级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和党支部、党小组。在她和战友们的努力下，福州学生界、企业界的抗日剧团、歌咏团、战友社、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

福州文山女中，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致力于培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姐、贵妇。舒诚频频入校发动，做学生思想工作，使学校里要



舒诚（前排左一）与文山女中党支部成员合影

求入党的学生越来越多，最终组建了中共文山女中支部。此外，学校相当部分学生都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队员。

在舒诚和中共文山女中支部领导下，这所教会学校成为福州抗日宣传重要基地。他们组成宣传队、救亡剧社，教大众唱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戏剧。文山女中还分别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队第14分队、第31分队以及各地战地文化专业演出队同台演出，在动员青年投军、捐款助战、献款购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秋天，舒诚带着文山女中宣传队在黄巷举行抗日募捐义演时，中共福州工委书记李铁，叫联络员庄草就近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取来相机拍摄，留下了当年福州这几位抗日女杰唯一一张合影照片，其中有些人后来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当时，舒诚还亲自带领抗日读书会的同志，在福州街头巷尾作抗日形势演讲，东街口、台江、烟台山，所有商业闹市区都留下舒诚登台动员大家起来抗敌的身影。她的演讲很有感染力，不少青年人因听了她的动员，径直到征兵报名处请缨出征。后来，她还组建了战地妇女宣传队，在福州和周边地区宣传演出。在她的领导下，福州市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抵制日货和募捐义款都取得了不俗成绩。

1939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舒诚和项新（项南）等到闽清开展民众抗日救亡

运动，参与创立了闽清县战时民众教育流动工作队，深入农村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不买日货，把县内店家的日货集中烧毁。

二

1939年2月初，舒诚来到位于安民巷的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汇报工作。当时，国民党发动新一波反共高潮，国共合作出现裂痕，李铁郑重告诉舒诚：“你的身份已暴露，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组织上决定送你去新四军军部学习。”

临别时，李铁交给舒诚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她：她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和福州市工委上报新四军军部的情报，都用密码写在这本书里，并发给她5块银圆做路费。

舒诚紧急部署工作。走前她再次来到生顺茶栈，欧阳琼与欧阳秀姐俩专门做了几个菜，为她送行。分手时，欧阳琼、欧阳秀都摘下了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递给舒诚，欧阳琼说：“此去一路艰险，你备着在路上用。如果用不上，到了皖南军部，就捐给新四军买枪弹。”

1939年4月2日，舒诚离开福州，前往新四军军部。在辗转去皖南的路上，路遇周恩来和曾三。同年底，她随陈毅到江苏开辟江南根据地，担任中共武进县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后升任武进县委书记，带领县武工队浴血奋战，屡斩日寇。之后，曾任中共京沪路北特委妇女部部长兼民运工作队队长、中共路南特委妇女部长。

三

为在南京组织百姓抗日锄奸、策反伪军和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中共苏皖边区党委派时任中共路南特委妇女部部长的舒诚，潜入敌伪心脏——南京，从事地下密战。

1941年7月，舒诚脱下军装穿上旗袍，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进入南京。她住进中共党员、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学生姜秀英家中，化名姜秀琳，对外称自己是姜秀英的胞姐，在外读书刚刚归来。舒诚在学校时业余曾学过日语，学得还十分不错。她通过姜秀英一个任伪保长的远房亲戚，成功搞到汪伪政府发的良民证，以当日语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舒诚进入南京后，争分夺秒开展工作，她迅速将中共苏皖边区在南京的党员聚合起来，组成中共南京特委，舒诚任书记。当时，组织上给她下达的第一项任务是：站稳脚跟，利用合法手段，团结群众，积蓄力量，长期斗争。工作重点组织青年学生、特别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开展抗日反伪斗争。舒诚根据党的指示和自己组织学生运动的经验，将党员分别派入各大中专院，建立组织，发动、组织学生进行抗日锄奸。

1941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工委，舒诚出任工委书记。她在店员、工人、学生、教师中发展党的组织，号召市民起来抗日；她还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在那里发展党员，并开办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夜校、刊物，组织了



晚年，舒诚（后排右二）与当年抗日战友合影

一系列抗日爱国群众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占领区大力推行“鸦片毒化运动”，以达到其“中国只要有40%的吸毒者，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罪恶目的。在南京，舒诚领导了大规模的“消毒运动”。

1943年冬天，舒诚巧妙地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部署反毒斗争。她指挥学生抗日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的社员厉恩虞、王嘉谟，由他俩带领200多名中央大学学生到夫子庙一带，砸烂日本人和汉奸控制的大烟馆。学生惨遭日军刀砍，但毫不畏惧。第二天，舒诚通过青年救国社动员了3000余人上街进行游行示威，不断有各方人士自发加入游行队伍。面对日本宪兵的刺刀，大家一路高喊禁毒口号，沿途不断捣毁烟馆，还将一路收缴来的烟土、烟具等当众集中烧毁。

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舒诚持续领导南京大中學生举行大规模的“清毒”大游行，冲击全市鸦片馆，焚烧了毒品及用具。

南京学生的禁毒斗争轰动全国，给了沦陷区

人民极大的鼓舞，公开的“消毒运动”和悄然展开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不断。

日伪得到密报，四处抓捕舒诚，并为此展开搜捕共产党人的全城大行动。有一天，搜捕队气势汹汹闯进蒋秀英家，机警的舒诚知道此时不能硬闯，她故意装成吓坏了，钻进被窝，将被子拉到齐眉处，扮成害怕到全身发抖的样子，说话也装成哆哆嗦嗦的、前言不搭后语。蒋家妈妈对搜捕队说这是她的女儿，从小胆小怕事，搜捕队怎么看也没法将“吓傻”的小姑娘与中共在南京的高官联系起来，转身走了。

在南京，舒诚一次次化险为夷，在刀尖锋刃中坚守密战直至1944年夏天。1945年，她随军北上山东；解放战争时期，随第四野战军进入武汉。后调往福建，曾任福建省计委秘书长，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省二轻局党组书记兼局长。1987年，她从省医药局局长、党组书记任上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舒诚的爱人林白一生也极富传奇色彩，是当年城工部副部长，并任闽清、古田、闽侯、罗源、连江五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五县游击队打游击。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5年2月6日，舒诚去世。医院告别大厅的正中，悬挂着一副蓝底白字的挽联，那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豆蔻即革命打江山峥嵘半世，耄耋志不移兴中华诚廉一生。

（本文图片由林榕提供）

一代风华

——何柏华小记

陈美者

闽地多风流人物。民国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剑胆琴心的高才。这样一个山水城市的人们，似乎总能将儒雅安逸与血性豪情平衡，静可温良恭俭让，动则振臂一呼如惊雷响彻云间。而何柏华，更是其中的惊艳人物，她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唯一福州女性，在永定山区领导武装斗争，后又担任台湾抗日义勇队中的辅导员……在战争时期，何柏华以柔弱之躯，爆发出了坚强的意志和

战斗的力量，为党为国而战；而在其后的宁静岁月中，她又将自己的光芒静静收起，一生传奇，欲说还休。

一、入编二十军

何柏华，1911年出生于福州城内西门一个中医家庭。在中药的香气中，她捧书苦读，后来考



中国第一张女兵合影（黄埔女生大队合影）

入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早在学校里，还留着齐刘海穿蓝色校服的何柏华，就参加了校内进步学生活动，这让中共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这个优秀的女子。15岁时，在同学的介绍下，何柏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建立。在东路军政治部、共产党员江董琴的推荐下，何柏华报考该校。这一批共录取了三十多名女生，她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注定要被历史记住，如游曦（广州起义烈士）、胡筠（彭德怀元帅的战友、烈士）、赵一曼（抗日英雄、烈士）、许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等。当时有一个女生大队，何柏华和她们被编入这个大队，成为同学，朝夕相处。这支赫赫有名的女生队，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二十军是中共地下组织掌握的部队，军长是贺龙。

二、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对中共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蒋介石左手举着鲜花，右手却亮出了屠刀。他日夜兼程，从安徽赶到上海，召集了秘密反共会议。4月开始，密集的枪声给上海的黑夜带来了浓浓的血腥味。青帮动手了！紧接着，军队也动手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宪兵，乘坐着汽车、摩托车，在街上大开杀戒。

面对背叛和屠杀，在这样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根据中

共中央的安排，二十军悄悄开进南昌，准备参加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南昌城还显得很平静。听不到马的嘶叫声，也听不到人声，河水还是和往常一样奔流着，连蛙鸣声似乎都比平常少了。清瘦的月亮，散发着微冷的光，映照着暗淡的河面。一切，似乎都在屏息等待着。

终于，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的宁静，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

无数的战士为国为党而战。其中就有一个特别的身影。何柏华敏捷迅速地移动着，她穿过枪弹雨林，传达指挥部的指令，然后，她掏出枪支，迅速加入了战斗。

战斗非常惨烈。起义军左突右攻，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未能接近敌人的防线。敌人的机关枪，持续地横扫猛射，火力很大。

“火力，掩护！”指挥官用嘶哑的声音大吼



南昌起义图

着。

一排手榴弹扔了过去，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趁着这个烟雾屏障，战士们迅速匍匐前进，或干脆抱枪翻滚，“冲啊！”在几簇爆炸的红光中，战士们勇敢地向敌人扑去。

破晓时分，升起的太阳将金色的光辉洒满山河、大地、田野，一切都露出了鲜亮的笑靥。枪声越来越少，号角却越来越嘹亮，南昌城笼罩在一片霞光中。史载，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胜利后，起义军撤离南昌，何柏华整编调入该军第三师教导团。在团参谋长周邦彩的带领下，何柏华和战士们一起突出重围，渡过韩江，向饶平前进。1927年10月底，何柏华在南昌起义军中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为南昌起义军中的唯一福州女性。

三、领导武装斗争

闽西的崇山峻岭中，树林青翠茂盛，小溪潺潺而流，然而，活动在密林中的战士们，却无暇欣赏这样的美景。此刻，他们的心里写满了为民族、为自由而战的豪情与斗志。

他们一共有两百多人，多半是农民组成的，

要对付的却是国民党全副武装的军队。战斗是很残酷的，随时都有可能要牺牲，但大家没有畏惧，充满了愈战愈勇的激情。领导这支武装队的，正是何柏华。

1927年10月，在永定，朱德接见了福建及闽西党组织负责人，并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了何柏华等人留在永定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6月，何柏华扩大农民武装，与其他地方的暴动队伍会合，打响了金丰暴动。国民党势力立即进行反扑。暴动不久，闽西军阀张贞派兵对永定暴动地区进行“清剿”。张贞一定是郁闷的，因为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何一个女子领导的农民武装军会如此难缠，他们躲在丛山密林中，不怕死，不怕苦，信念坚定，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着。



位于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的永定暴动遗址纪念碑

领导武装队，展示了何柏华的智勇双全。暴动后，她奉命回福州任市委常委。这样一来，福州各行各业的敌方势力，都要和张贞一样的头疼。何柏华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为我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到处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由她参与领导的斗争有：福州电报人的维权斗争、组织台江店工会反对老板裁减工资、福州鱼摊贩抗税的全行业罢市斗争、福州中学教员罢教要求增拨经费的请愿。同时，她还指导成立了福州工人代表会、福州互济总会。此外，她还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

出色的才能，坚定的意志，让何柏华成为我党队伍中的一名优秀战士。1930年2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柏华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何柏华任福建省委总行委执委。随后，她奉调上海，由中央妇委负责人邓颖超分配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直到1932年秋被捕。

四、加入抗日义勇队

1937年全面抗战后，在广东东莞、宝安地区，活跃着一位年轻福州女性的身影。她在教很多人唱抗日歌曲。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战士，正是何柏华。至今，仍有许多老人记得那些歌曲，记得那位充满豪情的女战士。她的革命热情，曾经感染过无数人。



1939年初，台湾抗日将领李友邦在大陆筹组台湾义勇队。这是义勇队成立初期在浙江金华拍摄的照片

翌年，受中共广东党组织指派，何柏华回福州联络地下党组织。但这是一次失望之行，彼时福州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何柏华见形势如此，只好离开福州辗转闽北，准备去江苏寻找新四军。

没等何柏华出发，组织再次向她发出了指派。当时，在闽浙两省，有一支队伍正在悄悄地集合。那就是李友邦将军在集结众多台湾乡亲，谋划在浙江金华成立抗日义勇队。中共地下党组织非常关心这样的正义行动，指派多名优秀同志加入，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就这样，何柏华成了台湾抗日义勇队的一员。这样的人才，似乎在任何时候都非常好用，乃女战士特有的“文武双全”：起义时拿得了枪参加得了战斗，斗争时能领导一方武装，这是“武”；在义勇队中她展示出“文”的一面，早年在暨南大学文史系读书毕业，还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加上出身中医家庭，

她先后担任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抗日义勇队卫生员等工作。她大方地微笑着，熟练地说着闽南语、客家话、粤语……何柏华给义勇队带来温暖的力量，队员们很喜欢和她一起执行任务，救护受伤将士、筹集药物军粮等。因为有何柏华的带领，任务总是完成得特别出色，常常会受到李友邦将军的勉励和表扬。

五、东渡台湾

1940年，台湾义勇队里洋溢着一片喜气。在李友邦将军的主持下，何柏华和队员赵天问喜结连理。婚宴上，何柏华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娇羞地微笑着。

没过几天，这对新人继续加入义勇队的工作。台湾抗日义勇队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他们开展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创办《台湾先锋》等刊物，还通过讲演会、纪念会，为抗日救国呐喊，激励台胞和全国军民的斗志；还开展医务工作，许多队员都是医生，他们在金华、兰溪和衢州设立医院，为军民服务，有的还奔赴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同时还在金华等地协助建立药品生产合作社，生产疟疾丸、胃散等战场急需药品，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终于，抗战胜利。在李友邦将军的率领下，何柏华、赵天问夫妇和大批义勇队队员一起，东渡回到台湾。

台北第一女子中学，迎来了这位特别的女教

师。此后数年，她都在这里任教。她喜欢微笑，温柔娴静，常人无法看出她经历过那么多场战争的洗礼，也曾冲锋陷阵，也曾振臂一呼，身上隐藏着巨大的战斗力，内心里写满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忠诚。

六、莫忘“春愁”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11月，何柏华、赵天问夫妇因“共党嫌疑”遭通缉，在冬日的一片阴霾中，他们夫妇带着儿女，千辛万苦逃离台湾，又一路辗转到了北京。

在邓颖超同志的关怀下，何柏华进入军政学校学习。1951年，何柏华被分配回闽。这位经历过数年战争的女战士，终于回到了福州。何柏华一定百感交集。闽地一别多年，然而青山绿水依旧，在坊巷的夕照中，她那些惊艳的战斗时光、波澜起伏的前半生，渐渐被隐去。此后，她任职于福州市文教部门，直至1974年逝世。据说，她温柔大方，不计得失，更从不提自己的过去。许多人只是暗自纳闷，为何她有着别样的叫人肃然起敬的气场？

而何柏华的内心，必然还留存着许多牵挂，没有人看见过她在明月下遥望海峡东岸，只是听说，新中国成立后何柏华不论身居何处，其客厅里总是悬挂着一幅她的先生赵天问手书的丘逢甲的七绝《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注西南岁月去

——远征军翻译官郑国贤的抗战记忆

林文政

夜深人静。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郑国贤恋恋不舍地将一张张黑白照片投入了炉火之中，火焰吞噬着尘封的往事和故人。同时焚毁的还有史迪威将军签名的通行证、工作证等与远征军有关的物品，只有一份《翻译官离职证明书》被偷偷保留了下来。郑国贤心想，如果全部付之一炬，还有什么能证明他的热血和青春呢？可是在那非常的岁月里，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那个曾令他引以为豪的身份，只能埋葬在记忆深处，选择沉默与遗忘了。他的泪光在火光中闪烁，国境以南的峥嵘岁月，犹如电影胶片般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几条国际交通线被相继切断。1938年8月，20万滇西各族百姓用血肉筑就的滇缅公路通车，成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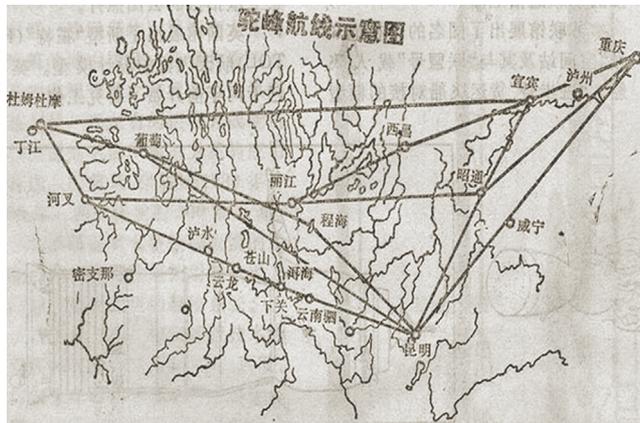
国抗战的输血管。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英属殖民地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为保卫这条抗日大动脉，抗击日本法西斯，国民政府与英国结成军事联盟，抽调了10万将士奔赴缅甸。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远征军先后两次出国作战，第一次以惨败告终，第二次则以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收场，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以巨大的牺牲为这个国家赋予了尊严。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卷入了“二战”的漩涡，大量美军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日，急需大量随军翻译。1943年，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征调大学生到部队当译员。那一年郑国贤21岁，在福建协和大学读大三。福州沦陷，国难当头，郑



郑国贤与夫人



驼峰航线示意图

国贤看到招考公告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抗日救亡，报效国家，于是主动报名应征。虽然郑国贤学的是园艺，但他还是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和良好的发挥，和林纪焘等两名外语系的同学一起，从3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1944年4月，郑国贤投笔从戎，踏上了抗日的征途。他首先在昆明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译员训练班，执教的是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有一天，郑国贤在郊外看见一个得了猩红热的士兵，因为缺乏药品无法治疗，又怕传染开来，还没断气就被两个士兵拉到山上掩埋了。他感到异常震惊，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闪过那个伤兵在黑暗中挣扎的惨状。训练班举办英语演讲比赛，郑国贤有感而发，发表了题为《不要忘记我们的伤兵》的演讲，他说士兵为了保家卫国，不惜流血牺牲，国家应该善待伤兵，给予他们人道的救治，死后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演讲充满了悲悯之心和人性关怀，深受好评，取得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

7月，为期3个月的培训结束，郑国贤被定为三级翻译官，派往印缅战区。由于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所有的对外陆路通道都被日军封锁，所以前往印缅战区必须通过“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由美国飞虎队紧急开辟的空中通道，要飞越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5500米的雪山，最高海拔达7000米以上，山峰起伏连绵，飞机只能在其间穿绕飞行，飞行路线宛如骆驼背上的驼峰，因而得名。

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世界屋脊，想起来就令人兴奋不已。郑国贤到了机场才发现，他们乘坐的是一架军用运输机，只能席地而坐。飞机刚起飞，就开始急速爬升。因为是超高空飞行，飞机在恶劣的气流影响下剧烈地颤动，一会儿突然升高，一会儿急剧下沉。郑国贤开始头晕、呕吐。正在这时，飞机又遭到了3架日本战机的跟踪，

要做好随时跳伞的准备，可郑国贤从未学过跳伞，只能现学现用。他开始祈祷上帝，这时窗外有一束蓝色的亮光射了进来，仿佛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他瞬间平静下来，拥有了跳伞的信心和勇气。过了一会儿，机组人员通知警报解除，郑国贤就像到鬼门关走了一回，机舱里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次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飞行注定将成为郑国贤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飞翔。后来他才知道并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像这样艰难而幸运地通过。

“驼峰航线”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一架飞机平均飞行不到3个月就会坠毁。在3年的时间里，一共有594架飞机失事或者失踪，有1500多名飞行人员长眠在了高山幽谷之中。“飞越喜马拉雅山，不灭日寇誓不还。”嘹亮的军歌在郑国贤耳边响起，他说不清那个如童话般的冰雪世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抵达印度后，郑国贤首先被派到兰姆伽训练基地做译员，不久又被调到前方指挥部。两三个月后，印缅战区来电，由于缅甸北部密支那、八莫一带战事激烈，伤员众多，前线医院急需英语翻译。郑国贤想起昆明郊外的见闻，希望能实实在在地为伤兵做点什么，主动要求前往。于是郑国贤被任命为小组长，带着五六名译员奔赴印缅战区第44野战医院。当时战斗刚刚结束，日军刚刚撤退，到处是断壁残垣，树干和墙壁上弹痕累累，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第44野战医院的人员和设备都来自美国，约

有20名医生。郑国贤主要负责在五官科、外科手术室和X光室做翻译工作。他首先要登记伤员的姓名和番号，确认他们的身份，然后告诉伤员要做什么手术，应该如何配合医生，同时也把伤员的想法转达给医生，是医生与伤员之间的沟通纽带。有时从前线送来的伤兵很多，郑国贤也帮忙给伤员包包石膏。虽然郑国贤没有在一线作战，但是他尽其所学，尽其所能，做好本职工作。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的夫人来医院慰问中国的伤兵，就是由郑国贤担任翻译。刚开始美军人员对中国人的态度有些傲慢，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郑国贤以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赢得了美军人员的赞赏，彼此之间相处得越来越融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有一天，郑国贤工作时，忽然听见有个伤兵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我要喝水！”而且用的是久违的福州话。他循声走去，只见那个伤兵躺在篷布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处于半昏迷的状态。郑国贤俯下身去看他的胸牌，差点惊叫起来：“王浴生！”郑国贤猛然想起1941年在协大医学院读预科时，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就叫王浴生，后来到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学医去了。这时王浴生也认出了郑国贤，流下了两行热泪。郑国贤赶紧叫来医生，先予救治。医生说，王浴生得的是严重的细菌性痢疾，严重脱水，幸亏发现得早，再晚两个小时就没救了。

经过精心的调养，王浴生的身体逐渐康复。他告诉郑国贤，1944年他也响应国家的号召，参

加了远征军，因为是医学院的学生，被抽调去学习军医急救，受训才一个多月，因不适应热带丛林的气候和环境，得了痢疾，被送到了这里。没想到分别数年，居然在前线重逢，学医的王浴生竟成了病号，郑国贤却成了救命恩人。在前线医院，没有比死亡更寻常的事了。王浴生能够死里逃生，重新走上了抗日前线，谁能说不是命运的安排呢？

巧合的是，郑国贤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和他一同考上译员的协大校友林纪焘也被派遣到了第44野战医院。郑国贤和林纪焘住在同一个帐篷里，有了同学做伴，在异国他乡的日子也就没有那么孤单了。林纪焘是林则徐的后人，聪明好学，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仍然坚持读书和锻炼。而郑国贤是学园艺的，对花花草草情有独钟。在密支那与八莫交界处的原始丛林中，生长着不少兰花，附着在古树上，嫩黄的花瓣掩映在草木之间，暗香浮动。郑国贤把兰花和一些热带野花移植到帐篷前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给单调的战地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

战争是无情的，它可以夺去无数年轻的生命，却无法阻止两颗年轻的心相互靠近，爱情的花朵在战火纷飞中暗自生长。手术室有个护士名叫拉宾璇，因为工作关系，与郑国贤经常接触。他们常常在一起聊聊各自的国家，谈谈人生和理想，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感情，郑国贤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拉宾璇哈哈大笑起来。拉宾璇被这个腼腆的中国小伙子深深吸引住了，她觉得郑

国贤举止文雅，为人正派，虽然是少校军衔，却不抽烟，不喝酒，不像美国大兵那么粗鲁，处处留情。拉宾璇总是有事没事去找郑国贤散步、谈心，帐篷下的鲜花便是最好的借口。她问郑国贤，你要把整个战场都种满鲜花吗？你说是这些花漂亮还是我漂亮呢？

少女情怀总是诗。拉宾璇把心事写在家书里，向远方的亲人倾诉，并请求家人邮寄些家乡的花籽来。郑国贤收到花籽时，又惊又喜，他们一起播下花籽，热带特别适合植物生长，很快就盛开成了一个花园。他们之间的称呼也不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刚开始郑国贤称呼拉宾璇为“拉宾璇中尉”，后来直呼其名“拉宾璇”，再后来变成了“拉宾”，而拉宾璇对郑国贤的称呼也由“郑国贤少校”“郑国贤”最后简化成了一个字“贤”。在新年到来时，郑国贤意外地收到了拉宾璇的家人寄来的贺卡，上面有她的父母、兄弟和姐姐的签名。他激动地把贺卡拿给林纪焘看，林纪焘开玩笑说，你一个人到缅甸来，准备几个人回去呢？

当感情不断升温即将抵达沸点的时候，面对拉宾璇的热情，郑国贤却退却了。他自然明白拉宾璇的心意，也知道自己是喜欢她的，但是这种喜欢就是爱吗，他足够爱她吗，可以为她赴汤蹈火，为她牺牲一切吗？不能，现在战争还未结束，国家和人民还在受难，他来到战场随时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怎么能沉迷于儿女私情呢？更何况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自己又是一个穷学

生，是注定没有结果的。郑国贤陷入了矛盾和痛苦，开始故意回避拉宾璇。

拉宾璇在手术室工作，下班后都要去洗澡。有一次拉宾璇进了洗澡间后，说毛巾忘带了，让郑国贤帮她拿一下。郑国贤轻轻地敲了下门，发现门没有反锁，里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空气中弥漫的水蒸气使他的意识有些恍惚，只听见拉宾璇说，快拿进来吧。郑国贤觉得自己狼狈极了，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向他袭来，要将他打败……理智终究还是战胜了情感，郑国贤稍稍地推开了一条缝隙，将毛巾塞了进去，然后逃似的离开了。他知道拉宾璇一定失望极了，但是爱情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责任，他别无选择。

远征军在取得密支那大捷后，扭转了盟军在亚洲战场的败局，开始由败退转为反攻，日军兵败如山倒。盟军打通了滇缅公路，并收复了滇西怒江西岸的全部失地。郑国贤也完成了使命，即将离开野战医院。他将盟军发的钢盔、铝制饭盒等物品收拾好，准备带回中国作为纪念，只有他和拉宾璇共同培植的那一片鲜花无法带走。要回国了，郑国贤的心中却有些失落。他鼓起勇气向拉宾璇告别，可是面对拉宾璇，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多保重，以后常联系。”拉宾璇低着头，撕着手里的花瓣，重复着那句话：“多保重，以后常联系。”然后默默地走了。郑国贤注意到，她的眼中闪烁着泪水，但她却强忍着



郑国贤（中）与林纪焘（左）、郑锡安（右）

不哭泣。

1945年7月，郑国贤回到昆明。8月的一个夜晚，他在影院里看电影，忽然电影戛然而止，幕布上跳出了两行大字：“盟军指挥部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电影院瞬间沸腾了，大家站起来大声欢呼，纷纷涌上街头，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随后，郑国贤到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领取了《翻译官离职证明书》，到重庆的复旦大学继续完成了学业。回到福州后，郑国贤相继在格致中学、福建师院和英华外语学院任教。他仍然保持着和盟军战友的通信，还将福建的茶叶寄给他们，战友也从美国给他寄来了巧克力和英文书籍，直到“文革”爆发才中断了联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远征军一度成为被遗忘的战场，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了郑国贤不能说的秘密。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远征军的历史终于得到了国家



四川建川博物馆广场上的抗战老兵手印

的肯定，中央军委向参加远征军的老兵颁发了纪念章。四川建川博物馆征集抗战老兵幸存者的手印，郑国贤的手印被收藏其中。因为郑国贤行动不便，在成都生活的王浴生特意将手印拍成照片寄给他。当郑国贤看到自己血红的手印和“国人到此，低头致敬”的石碑时，不禁老泪纵横。远征军的战士们还有多少健在人世呢？他们不怕死亡，只是害怕被遗忘。

现在，郑国贤已经95岁高龄了，携手老伴在养老院里安享晚年。工作人员发现，老人的血糖值波动很大，最高时达到18.3，最低时却只有3.9。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老人喜欢喝可乐，吃巧克力。老人不好意思地说，当年在战场上就喜欢这些东西。他想起了他的战友们，他们还好吗？在记忆里，他们依旧是年轻的模样。

“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大的小偷。”70年弹指一挥间，郑国贤依然时常想起印缅战场上的战争岁月，想起野战医院那一片盛开的花园。人老了，回忆似乎也成了一种病。他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回忆，想起活着的和死去的他们，有时他会突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连他们的样子也渐渐变得模糊。人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远征军，承认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一些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好在在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年代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每一天都是甜的。

闽中风雅赖扶持

——郁达夫在“抗日救亡”中

钟兆云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到福州游览，之后就任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

从日本回来后，预感中日将有一战的郁达夫，便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一心要把福建省政府公报室（曾改称编译室）工作搞好，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他在福州参加各种座谈会和演讲，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地为团结抗日而呼吁。这些，对福建文化界后来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舆论上起了“号吹在前”的作用。

一代文豪郭沫若当年因谴责蒋介石之独裁而受通缉、避难东京。郁达夫在1936年岁暮访日时，再三催促郭沫若及早回国，共同为抗战出力。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冒险回国。郁达夫

接到郭沫若电告后，7月中旬专门从福州赶到上海码头相迎。两位文坛巨匠为抗战事业而奔走，郭沫若暂留沪上，郁达夫又回到福建。归途中，恰逢“八一三”战事发生，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发动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更加激起了心头仇恨。

“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依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诗言志，郁达夫这些在福建写就的诗句，连同他填写的、镌刻在福州于山戚公祠畔石壁上的《满江红》，都让人感受到他那“永保金瓯无缺”的爱国热忱，并油然而生奋起荡除入侵之敌的浩然正气。

1937年10月17日，在中共福建地方党组织



文救会理事长郁达夫（中）与后援会同事在福州青年会门前合影



题刻在于山的郁达夫《满江红》词

的影响下，郁达夫领导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提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我们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农的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郁达夫慷慨激昂地演说，“福建地处海滨，就在国防第一线上，惟其如此，所以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比别省强，而世界的潮流侵染，所得的反响，也当然比别省来得更切实，更紧张。福州的文坛要振兴，很大的原因是把握政治动向，驱除惰性，勇猛前进！”

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郁达夫报告了开会的双重意义，声情并茂地呼吁：“我们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赍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战斗！”

会上，郁达夫当选为“文救会”理事长。进步作家董秋芳、左翼作家杨骚以及地下党员卢茅居、陈兴英等人均有担职。此时，共产党组织在福州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文救会”领导核心进步力量较强，地下党员可以通过统一战线来开展工作，发挥作用。

“文救会”成立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组织上，对会员进行登记，并举办“深入民间之干部训练班”；宣传上，开展系统讲演和通俗讲演，系统讲演每周一次，总题为“抗战的回顾与展望”。同时通过广播电台和编辑会刊小册子等进行宣传。

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全国瞩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郁达夫及其领导组织的福州文化界救

亡协会。郁达夫亲自发起了“十万封信慰劳抗敌将士运动”，并和董秋芳带头写稿、写信。

1937年11月15日，“文救会”创办《救亡文艺》，郁达夫和闽籍作家杨骚联袂担任主编。发刊词开宗明义：“目前的文艺，应该是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

得悉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刚从国民党浙江监狱释放出来，郁达夫不避嫌疑，坚决邀请他来榕共事，担任“文救会”编委和《救亡文艺》编辑。楼适夷由浙入闽，《救亡文艺》大大增强了战斗力量，以其坚定的立场、活泼的形式，富有战斗力的风格，成为抗战初期福建文艺报刊中最有影响的刊物。

楼适夷得知日军在金门沦陷区滥杀居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沦陷区人民身陷水深火热，抑不住满腔悲愤，作《金门》一诗，声讨侵略者的罪恶：

福建省脱去一扇金门，
在那里展开阵阵血腥。
你凭着遥遥的南方倾听：
那不是被蹂躏的妇女的惨号？
那不是万万千千婴儿的哭声？
我们的仇敌已灭绝了人性……

全面抗战打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而一些达官贵人和鲜廉寡耻之徒，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之际，却仍然迎春歌舞、问柳寻花，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楼适夷在福州就见到了此番情景，

怒不可遏的他挥笔写就《福州有福》一文：

金门是刚刚在这几天失陷，但福州市麇不惊，南大街熙熙攘攘拥挤着行人，三角皮带的军官，佩证章的公务人员，带着窈窕的摩登女子，在路边静步，散出一阵阵香水味……

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对这些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的极端蔑视和强烈谴责。

郁达夫和“文救会”战友们白天上班，晚上常开会到深夜。没有活动经费，就大家捐款。郁达夫还经常主持宣传演讲会，三次前往福州电台作播音演讲。其中一次，他用日语播出《告日本国民》，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

在“文救会”的积极鼓动宣传下，福州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国民党福建当局对此却极为恐慌，加强特务统治，压制抗敌力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保安处公开造谣攻击“文救会”负责人“口头救亡，心存阴谋”等等。对这些不实之词，郁达夫和战友们在《救亡文艺》上以显著位置发表《我们的态度》，予以回击。

福建“蓝衣社”（军统）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出马，到光禄坊11号郁达夫住处向他发出警告，说“文救会”有共党分子，郁先生是省府官员，还是辞去“文救会”的职务为好，以免被异党利用。郁达夫严词拒绝，并指斥他们在大敌当前仍不识大体。

张超悻悻而去，见文的不行，就动用武的。

一天，4名特务突然持枪闯到《救亡文艺》编辑部，没抓到楼适夷，就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协和大学进步女教授李冠芳。一些进步同学也突然失踪。楼适夷躲过一劫并安全撤离福州后，郁达夫旋于12月3日愤然登报公开辞去“文救会”理事长之职，以示抗议。接着，董秋芳、杨骚、许钦文等5位常务理事也相继登报辞职。

大有作为的《救亡文艺》连同“文救会”虽被国民党当局压制解散了，但郁达夫及其他主要成员，仍不改初衷，以个人身份，利用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20日，郁达夫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我已辞去理事，但救亡工作，仍在普遍地进行……日夜工作极忙。”

1938年2月下旬，日军战机连续数日轰炸福州王庄机场，弹片横飞，乡民死伤多人，哀声一片。郁达夫闻讯，亲往察看，并愤而作《敌机的来袭》一文以祭。文章写道：“……敌人的大队飞机果然就来了。先来三只，绕市数周，在城

东的机场，投了两三次弹。继复联合六只，复在机场，投下四十余弹。我方的损失……一共死了八九个人，伤了十一二”，“到了今朝，天气依旧是天青日白，云雾全无；而今天早晨，敌机又来袭了三次……”

不久，郁达夫获知一个不幸消息：1937年12月，他的故乡浙江富阳沦陷，七旬老母不愿做亡国奴，于逃难途中遇难。闻此噩耗，郁达夫悲痛万分，当日即在福州光禄坊11号寓所设灵，于母亲遗像旁，奋笔手书一副对子：“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旧雨新知前往吊唁与慰问，目睹此像此联，咸增同仇敌忾之心。

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抹去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1938年3月，他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建前往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担任设计委员。他对抗战十分积极，曾亲到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

郁达夫拿着“匕首投枪”，以必胜的信念参加到抗战御侮的行列里来，他向抗日同胞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他如是向国人呐喊：“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



位于于山的郁达夫史迹展馆

一个家族的1941

刘冬

1941年8月。浩渺的南太平洋，一艘从香港驶往新加坡的巨轮上，有位面容清癯、西装革履的青年倚栏远眺，心事重重。这个名唤刘含怀的青年还只有22岁。这一路并不容易，告别长汀的厦大同学，经永安、大田、永春，下泉州，出鼓浪屿，登轮驶抵香港，而后换乘前往新加坡的海轮。辛苦只是其一，抛下美丽温婉的热恋女友远涉重洋，实属无奈。五天六夜的行程，满怀不舍、忐忑与惆怅，当然也有些许对异国的期待与兴奋……

一切源于那场战争。

—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颠簸甚至改变着人的命运，即便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州。

徘徊在闽江边的松木商人刘杏村，眼瞅着散落在江水中的板材，满心凄凉。“从桥上跳下去的心都有”——许多年后回忆往事，他对长子刘含怀如是说。

闽地森林资源丰富，历史上一直是东南主要木材产地，这里的木材民国时期行销国内外，因此从事和依赖林业为生者甚众。又因为运输只能通过水路，一般在上游砍伐后编成木排，顺闽江直下福州。由此，福州成为木材的重要转运地，吸引了众多商家经营木业。

刘杏村携南洋集资闯入木业行当是在1933年。37岁的刘杏村留着两撇八字胡须，相貌堂堂，胆识过人。1903年年方7岁的他随母舅漂洋过海前往婆罗洲的诗巫，一直生活到18岁方回国读书。在他一路走来的经历中，先后当过教师、军需官，开办过银行……成熟年岁眼光亦已



刘杏村全家（上右为刘杏村，下左为刘含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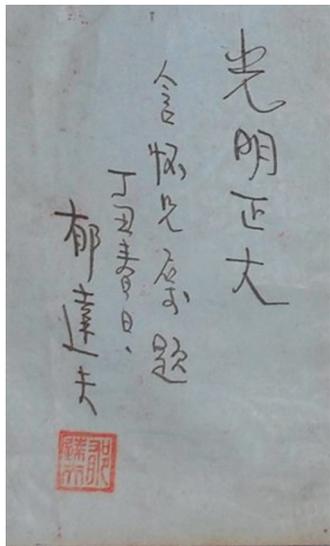
老道。其时福州木商分为杉木、板贩、出口、采运、松木五组，他选择的是松木组。与传统大宗的杉木相比，松木生意算是后生小众。福州原先松木商人并不多，晚清时由于茶叶出口贸易兴起，用松木板制造的茶箱需求量极大，一些外国人开始在福州设立锯木厂，此后外商与省内外木商相继开始进行松木半机械化加工。这种新兴的带有洋派作风的经营，于刘杏村最合适不过。作为总行经理的他经营有方，百行松木行一度十分

兴旺，在沙县、永安、明溪、清流等地都开设了松木厂。此外他还投资了收益颇丰的闽江轮船股份公司。

财富源源而来。仓山跑马场 11 号，一座小洋楼见证了家族的兴盛。红砖的三层小洋楼，既是公司办公场所又是家居所在，因爱妻名字中有一“德”字而称之为“德庄”。电灯电话洋包车，雕工精致的硬木家具一应西作，显示着主人的洋派。闽清老家的“杏园”也建了起来，风格亦属中西合璧。

好日子仅仅维持了几年。在这个家族中流传至今的家训之一“乐极生悲”，或许即诞生于斯。日寇侵华，全民抗战。对于濒临闽江下游入海口的福州，封锁闽江口是防止日本军舰长驱直入的有效办法。抛沉石块，填筑石档，有民众将家中地板条石甚至墓碑都贡献出来，更有大小几十艘船只装满沙石在主航道下沉。1938 年海口局部封锁，松木出口已感困难；1939 年全部封锁，此后松杉板材等完全禁止出口。福州木行均告失败，百行松木行亦未能幸免，开设于各地的分厂全部倒闭，已采伐加工的木材沿江弃置，腐烂盗失。刘杏村资遣工人后负债累累，百计无施。

财富与成功，一切戛然而止。钱财散尽，收纳了妻小们无数欢乐的德庄也无法保有。书籍报刊一部分烧毁了，还有一些送回闽清老家，连同那些精致的硬木家具。在忙碌而伤神的安顿期间，刘杏村给在永安协和大学读书的儿子刘含怀写去一封信。安排罢一切，这个破产的商人最后



郁达夫的手书题词

选择了重又出洋，去那个叫作婆罗洲的岛屿。他1941年3月动身，4月1日抵达南洋砂拉越的诗巫。

20天之后，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

二

1936年2月初，郁达夫来到福州。那是新中国成立前闽都文坛的黄金年代，名作家的来临使之光彩陡增。那一日，郁达夫下榻的南台仓霞洲基督教青年会，有位少年“粉丝”前来拜见，并获大作家手书题词“光明正大”。

此时16岁的福州三一中学（现福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刘含怀，眼前世界着实一派光明。父亲刘杏村虽为商人，却也是曾经就读南京东南大学高等师范的儒商，家中书籍报刊多多。废寝忘

食啃读中外名著的结果，就是令刘含怀小小年纪便坠入文学的情网，中学时代便开始了笔尖下的创作。郁达夫先生的激励，无疑使这位文学青年更加热情如火，他四面开弓，八方投稿，频频以柳林、柳寒晖、一流、白汀等笔名在报刊发表作品，俨然一个青年作家。

散文、诗歌、评论，文坛是他生命伸展的无垠疆土。不仅仅码文字，当时闽都文坛各种活动颇多，这个嘴下没毛的小子，游鱼般活跃其间。诸如参加“青年文艺社”，每周一次的文艺座谈会，还有那一次难忘的磨溪郊游，清幽山水中诗人的朗诵……

那个年代没有留给文人骚客们太多柔情蜜意的空间，被民族存亡激荡出的满腔热血，演绎出绚烂的悲怆与豪情之花。1937年7月28日，“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成立，后改名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郁达夫被推举为理事长。以笔当枪是作家们的神圣使命。文救会所办的《救亡文艺》，无疑是一方醒目而坚强的阵地。从保存下来的一封信编辑部来信中可以获悉，在《救亡文艺》不长的生存期中，中学生刘含怀至少发表过两篇文章：《战时文学是怎样的》和《抗战的文艺》。保留下来的还有“文抗会”的通函，邀请他于1937年7月28日前往吉庇巷参加谈话会，讨论当前的紧急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的当时，我们就感到全国局势非常严重，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那一日，正是“文抗会”的成立之日。

生活仍在行进，学总归还得上。1939年秋末，刘含怀考上战时内迁邵武的协和大学西洋文学哲学系。不久中文系主办题为《革除陋习议》的全校作文比赛，他一举夺得亚军。第二学期他因此顺利转读中文系，并被推举为全校性刊物《协大周刊》的编辑。洋洋得意之际，却收到父亲一封来信，密密麻麻两大页，总之意思是：我过去做生意有钱，你尽可以按你兴趣去做诗人文学家，将来没饭吃我可养你；而今我破产了，希望你改习一门经世济民之学，自谋生路。

经世济民的经济，偏偏他最不喜欢。但没有办法，父命难违的背后是生活的残酷，他唯有改变，转学到厦门大学经济系，实现从浪漫到现实的并不华丽的转身。尽管后来他一直觉得，愧对他鼓励提携的编辑前辈和朋友们。

厦大不在厦门，亦已内迁到闽西长汀。福州第一次沦陷的消息传来时，榕籍同学们纷纷涌到县电报局，希望尽快接到家人消息。父亲已去南洋，福州家中只剩母亲、生病的弟弟和6岁的小妹妹，焦急的他接连几封航信向父亲告急，并建议让他也前往新加坡挣钱接济家庭。父亲一向对他信任宽容，不久便寄来旅费，并帮他办了新加坡入境证。大二学生刘含怀于是申请休学一学期，踏上前往异国他乡的路途。

启程之前，他特意去了连城，与在亲戚家度假的女友告别。温婉秀丽的女友，是比他小一岁的高中女生吴莹玉。两人的父辈是好友，两年前她随父前来闽清拜访，在刘家祖屋居住了一段时

间，恰逢休学回家备考大学的刘含怀，两人竟一见钟情，此后经常接触谈玩，又建立通讯联系。连城之行，更是让默默滋长的情愫陡然升温。尽管内心浓浓的别离愁绪，懂事的女友依然安慰道：“反正只请半年的假，早去早归……”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整整6年。

三

1941年4月30日，刘杏村抵达南洋之后大约20天，时任中国驻山打根领事馆领事的卓还来，来到诗巫。全面抗战开始后，制空权掌握在日军手里，屡屡遭受的空袭令中方损失惨重；此行他的使命，便是向当地中国侨民介绍国内扩建空军的计划。

血浓于水的爱国爱乡之情，在抗日救国的热浪中展现。海外侨胞捐款捐物、购债、侨汇，还有众多回国抗日的热血青年，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成为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笔。所有这一切，被唤作“新福州”的诗巫全不曾落下。甚至有一种说法，那些离乡背井而来的农民们，原只打算“暂住”在此垦荒挣钱，早晚要回闽清，回古田，回中国的老家；如此，家乡遭难所带来的沉痛更激发出无比强烈的思恋之情，节省下每一分钱寄回国内支援抗战，从富商、职员到小贩。

领事卓还来离开诗巫次日，诗巫华侨筹赈会当即发起“献机运动”，自5月1日至10月23日

共汇出购机款 8 笔，约合国币 50 万元。在海外侨胞向祖国捐献的大量飞机中，也翱翔起了“诗巫号”。

诗巫华侨筹赈会，全名“诗巫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会长是新福州垦场的第二任港主、德高望重的老侨领刘家洙。刘杏村从福州重回诗巫，虽因债务困窘，更重要的也想寻找新机会，与刘家洙合作的海南垦殖计划或可再加推进。那桩大胆的海南开垦设想萌发于 1936 年，次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刘杏村与刘家洙等 6 人组织了南洋华侨琼崖富华垦殖公司，在海南购地 9 大片计 10 万余英亩，并种下树胶 200 多英亩，成为闽清海外华侨投资开发祖国的先声。可惜，是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所种无多即中止。

迟他数月抵达南洋的儿子刘含怀，先到诗

巫，与外祖母、父亲会面之后又前往新加坡，那里有更大的天地与机会。爱子心切的父亲写给朋友几封拜托关照的信函，其中一封收信人是原籍福州的李筱英，她曾在诗巫住过一段时间，算是“大福州”老乡。身为新加坡情报部华籍职员的小李小姐当时是郁达夫的女朋友，在那儿刘含怀又一次见到心目中的导师。其时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任副刊《晨星》的编辑，热血依然，是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

文学女神再一次向这个青年招了招手。《晨星》刊发了他的几篇作品，郁达夫并且应允介绍他去报社担任副刊助理编辑，那是 1941 年的 12 月初。仅仅过了几天，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报社缩版，不添新员，助理编辑职位就此泡汤。



诗巫侨界欢送刘家洙、刘杏村回国开发海南橡胶园



砂拉越各地华校的学生，在筹赈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卖花筹募援华义款。图为诗巫的学生卖花队在出发前合影



街头的小贩也参与义卖，筹措援华抗日基金

1941 的凶险仍在继续。12 月 25 日，圣诞节，3 小队共 9 架日军轰炸机将炸弹投掷在诗巫市区，几天后诗巫沦陷。一个多月之后，新加坡亦落入日寇之手。

仍然是仅仅只差几天，刘含怀便将登上返乡的客轮。

下南洋只是父子相商的决定，母亲并不愿意长子远离他乡，再三催促返家。福州已经光复，女友还在期盼，遵母命回国是上策，玩心未泯的他只想再流连几日，没料到战云移行的速度如此之快。

沦陷岁月的噩梦，开始频频沉浮于这对父子的命运之海。

在诗巫，日寇的肃清行动随即开始，按名单缉拿所谓的反日分子。包括刘家洙在内的诗巫华侨筹赈会 27 位领导人全遭逮捕。因与老侨领走得很近，刘杏村的处境岌岌可危。他买来一大堆

命理书籍，关在屋子里，数日不出门。待到推门而出，去须蓄发，模样改变，算起命来亦头头是道。这个算命先生被拘审 2 次，搜查寓所 4 次，考试命理 2 次，终于瞒过日寇，免遭毒手。

比起远在诗巫的父亲，青年刘含怀遭到的更是有生以来最大的磨难。亲历南京大屠杀式的新加坡大检证，险被抓去修筑“死亡铁路”，被当作抗日分子逮捕坐牢关押一年多，5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尽其所能，刻画下许多抵抗侵略者的行动履痕。1944 年，出狱后的他和表弟结伴逃离新加坡，来到北马吡叻州实兆远的甘文阁，那是抗日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他冒着风险帮助游击队购买粮食和药品，监视特务和可疑分子，协助居民抗日小组的组织活动等等。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他没有放下手中之笔，比如编写一些抗日宣传材料和文稿投寄到抗日军油印小报，其中一些素材被编成短剧、说唱，作为演出



两地情思：刘含怀从南洋寄回福州的照片与题词

宣传之用。

岁月艰难，生活依然多彩。在走家串户推销花布的机缘中，“爱大华”黄氏药房的黄太太，看中了这位文才极好来自家乡的大学生，聘请他当女儿的家庭教师，心底下想的是招他入赘。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动心。热带女郎特有的热情和娇憨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异国他乡的孤独也努力将他推往黄家温情的港湾。况且他不知道，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返回家乡，不知道家乡的姑娘是否还在痴情等待。

日本天皇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在8天之后才得知。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黄家远离人群的胶稻园。捉捕抗日分子风声紧，黄太太小心地将心目中的准女婿窝藏此间。直到那一日，黄家大儿子骑着自行车携喜讯飞驰而来。

中断已久的信息开始流通。日本投降后两个月，父母分别给他来信，方知弟弟已经病逝。母亲的第二封信由三叔代笔，云：吴家小姐，多年别离，仍属意吾儿，而不为左右爱慕者所动，吾儿若未婚，速去信联系，勿失佳人……

他该回家了，带着对黄家小姐的歉疚之意。1947年5月，整整6年之后，刘含怀回到福州。他继续在厦门大学攻读，领到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颁发的厦大毕业证书。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与痴情美丽的吴家小姐恩爱一

生，育有二女。老夫妻分别于1999年和2008年去世，相隔9年。他没有成为文学家或者编辑，一直在银行工作。但他始终珍藏着那些剪贴的作品，那些已经发黄的编辑信函，那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梦想和激情。

1948年4月，刘杏村以南洋华侨琼崖富华垦殖公司协理名义，偕经理刘家洙和技术人员返国直赴海南岛……叶落归根，他最终的归宿是闽清青山绿水间的祖坟。

四

1969年，在闽清祖屋的塔楼里，一个18岁的回乡女知青，在暗夜的惊恐中搜寻到一大堆书籍报刊，诸如文学名著、《良友》杂志、命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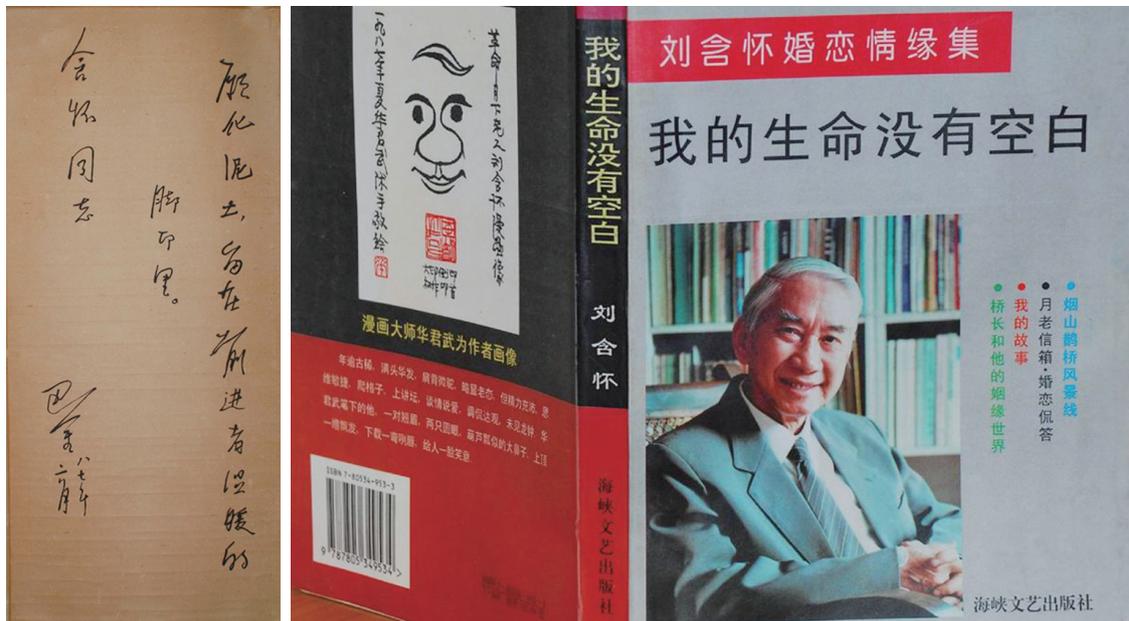
昏黄油灯下的阅读伴随她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启蒙、开掘着她的心灵。后来她成为福州城里的一名期刊编辑。工作之余，有时她会帮人算算命测测字，有模有样……

她正是刘含怀的二女儿。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在省里一家杂志社，和她成为同事。那个年代，刚刚从动乱中走出，多年全社会的禁欲环境，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大男大女”。作为一家青年刊物的编辑，女儿反倒成为父亲创作路上的助手，刘含怀成为我所在杂志社的金牌作者。从一篇《月老的报告》开始，退休老人刘含怀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姿态重新出发。青葱岁月的文学憧憬在新时代枯木逢春，开启了他生命的又一个新高度。他撰写了有关青年交友及恋爱婚姻家庭的几十万字文章，出了两

部集子。他与老友们一道，编撰了弥足珍贵的《1930-1949福州文坛回忆录》《1930-1949福州诗与散文选》。他主持的“烟山鹊桥”迎来过许多重要人物视察指导，包括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陈慕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几十年来我耳闻目睹，知晓甚多。当年的女知青如今也退休了，闲暇时她请我帮忙整理祖辈父辈留存下的文档资料。那些笔记、信函、作品剪贴、黑白照片，泛黄却依然清晰，印证着那些久远的传奇，缩影着众多的福州侨商家庭，使我那么真切地看到了他们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沉浮，触摸到他们的奋斗、欢乐与辛酸，和他们对故土无法割舍的眷恋。

还有他们曾经的1941，那一个家国破裂的年代……



巴金赠予刘含怀的题词

刘含怀晚年出版的文集

沦陷记忆：发生在塔亭医院的故事

潘 亮

（本文根据陈兆奋老人口述整理）

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原福建财会干部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兆奋老人，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亲眼目睹了沦陷期间的万般苦难，以及父辈们的抗争。这期间虽无炮火硝烟，却有着特殊场合下的生死博弈。

塔亭医院1866年由英国圣公会创办，是福州最早的一家外资医院。福州沦陷时，时任塔亭医院院长的是英国人黄约翰，他与塔亭医院的“陈医生”们成立了一支红十字会急救队，由他与华人总务医师陈为信负责。黄约翰回国后，陈颂磐

—

沦陷期间，日寇在福州狂轰滥炸，横行无忌，福州人纷纷“走反”，逃往闽北各处避难。留在福州的市民，与侵略者展开顽强的周旋与抗争。其中，塔亭医院（福州市第二医院前身）的陈为信（陈兆奋之父）和陈颂磐、陈宗磐兄弟，被统称为“陈医生”。他们利用国际红十字会的崇高威望与国际友人的支持，与日寇展开了特殊的抗争。



塔亭医院旧景

于1944年接任塔亭医院代院长，1947年被任命为院长。

抗战期间，医疗条件十分艰难。没有足够的金属器械，“陈医生”们就拿出家里晒衣服用的竹制夹子，消毒后用以代替；没有做手术用的缝合线，“陈医生”们就让孩子们到医院门口的老樟树上抓一种肥肥的绿虫子，挤压出虫的肠子，放在白醋中蒸煮，肠子就变得直而韧，用以代替急缺的羊肠线。沦陷期间，伤病人员很多，三个“陈医生”成了没有下班的医生，每天至少花16小时给病人看病。1941年4月18日，日军在福州仓山龙潭角一带狂轰滥炸，许多居民死伤。“陈医生”组曾连续36小时坚守在手术台边，吃饭由护士喂点馒头，小便也用铜盆接着。陈家的孩子陈天如曾亲眼看见陈宗磐为一位被日机炸断小腿的伤员锯除残腿，为一位被子弹打穿肚肠的义序乡

民作开腹修补肠道手术，还见到伤愈后的乡民及其家属跪在陈宗磐面前感谢救命之恩。

爱尔兰都柏林人恒·约翰（Bishop John Hind），1902年受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差遣到福州。在塔亭医院总务医生陈为信等人的建议下，恒·约翰于1938年在福州成立了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并担任会长之职。福州第一次沦陷，日军在城内大开杀戒，福建国际红十字会发出通知，各难民所紧急收容各地送来的难民，提供最基本的救助。救济物品一运到，须及时分发到每个难民手中。恒·约翰以福建国际红十字会会长名义，发给塔亭医院总务医生陈为信等人国际红十字臂章，指派他们组织人员运送粮食、器具、药品等物资，重点支援城内的协和医院和柴井医院，用于救治受伤同胞。执行这项危险使命时，由英国医生开车，陈为信押车，车顶上罩着白底



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旧址，仓山施埔



陈兆奋一家



陈为信医生（中）与护士们的合影

红十字旗帜，以防敌军误袭。冒着枪炮，他们在大街小巷上奔跑，把药品、食物等紧缺物资运往城内各处，包括台江、仓山的各医院、学校和难民所。

二

那段时间，福建省立第一医院迁往南平，协和、柴井被日军占领，“陈医生”们所在的塔亭医院，成了福州最后一块人道主义阵地。

在日军疯狂轰炸中，各国在福州的租界为了防止误炸，纷纷在自己的屋顶上升起国旗。为避免被误炸，塔亭医院屋顶也绘制了英国国旗。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日军第一次冲进医院那天，陈兆奋和陈天如，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趴在墙头上目睹了全过程。陈兆奋回忆说，当时，附近许多人没处躲避，就在医院里找个角落藏起来。眼见他们遇到危险，身为红十字会员的

院长陈颂磐和总务医师陈为信两人换上白大褂，戴上国际红十字会臂章，挺身而出。日军通过汉奸翻译说：“这所医院是英国敌产，我们要全盘接收。”陈颂磐通过翻译回答：“这是中国人的医院，我是院长，他是医生，没有外国人。”并指着红十字臂章说：“我们都是国际红十字会成员，执行红十字的宗旨。这里是红十字会辖下的医院，依照国际公约，你们不可以随意进入！”日本人刷地一声将刺刀架到医生们的脸颊前：“你屋顶刷的是英国国旗，还有什么话说？”陈为信马上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说：“屋顶上有英国国旗的这座楼，是英国人捐钱建的，我们这里还有德国人捐建的楼房，也有日本人出钱建的病房，这所医院是万国牌的。”日本宪兵收回了刺刀，陈为信接着提高嗓门说：“你们的日本领事前些天就在我们这里看病，我给他看的。”接着说出了日本领事的名字。日本宪兵领头的问道：“如果我们来看病，你给不给看？”陈为信答：“按照红十字会规定，当然是一视同仁。”

日本人悻悻离去。塔亭医院保住了，成为福州第二次沦陷期间中国人掌控的、唯一能正常运转的正规医院。

三

沦陷期间，塔亭医院成为许多抗日义士逃生救命的“地下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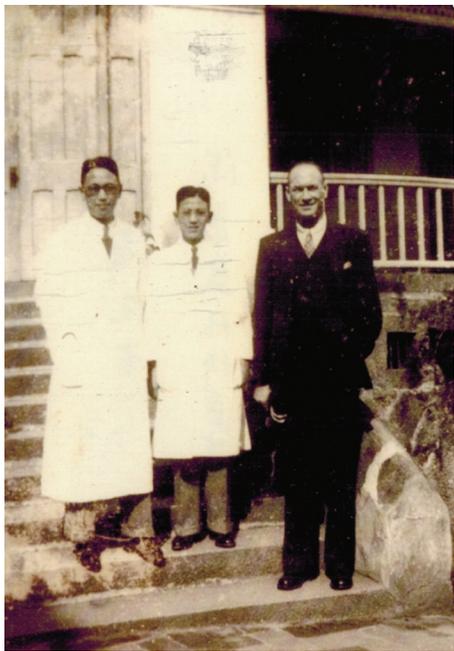
1944年10月4日，撤离福州的福州救火联

合会等团体约 300 余人，在闽侯南港整编成战地服务队，于 10 月 8 日凌晨打响了仓前山抗日反攻战。由于实力悬殊，战斗甚为惨烈，我方 29 名队员为国捐躯，23 人受伤，多为仓山本地人。遭到突然袭击的日军万分恼怒，立即搜捕我方战斗人员，并捣毁救火会。日军的暴行和搜捕激起了民愤，我方伤亡者被民众偷偷送进塔亭医院里。陈兆奋和陈天如当年亲眼看到血流如注的伤员从烟台山上抬下来，鱼贯而入被抬进医院，父辈们作为红十字会急救队，立即又开始了紧张的救治工作。

日军很快就抵达医院，要强行彻底搜索。此时医院内一些伤员的手术还在进行。情况危急。会讲日语的陈为信当即出面，故意带着日军绕了

个远道四处检查，用以争取时间。院长陈颂磐则快速组织伤员们化装，让他们混杂在普通病人中间：头上受伤的，就包个伙夫的头巾，拿个吹火筒，假装工友在厨房里埋头生火；截了腿的，就转移到内科一般病房，放进被窝里，伪装成严重的内科病患者；一些轻伤伤员，就穿上园丁的服装，在院子里修剪花枝，锄草施肥；伤情特别重的，就转到停尸房里……最后，日本人找遍了整个医院，就是找不到抗日伤员。

1945 年 5 月 18 日，日军彻底退出福州城。福州光复后，福建省府回迁福州，省府主席刘建绪上将亲自将一面“见义勇为”牌匾送给塔亭医院，以此感谢抗战期间该院与福建国际红十字会所做的贡献。



塔亭医院医生（自左至右）：陈颂磐、陈宗磐、黄约翰



塔亭医院英籍护士

蜚水英华

——抗战期间福州英华中学内迁纪实

施昌寿

1938年，日寇进犯闽海，厦门已于4月沦陷，福州岌岌可危，空袭不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各大中学纷纷内迁，百年老校英华中学亦迁到顺昌县洋口镇继续办学。洋口镇处于闽江上游富屯溪畔，此段古称蜚水。八年抗战胜利后，英华复迁回福州。

一、再见，仓前山

仓前山简称仓山，位于福州南台岛闽江南岸。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教堂、医院、学校和领事馆较为集中的地区。创办于1881年的鹤龄英华书院就坐落在仓山烟台山之西侧，有鹤龄楼、钟楼和石厝等建筑群。1928年，曾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的陈芝美，受聘就任英华第一位华人校长。这是一位爱国、爱校、爱学生的好校长。他在任的10年里，正逢国难，战事频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



陈芝美校长

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1933年，大刀队长城抗战。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

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中日淞沪大会战。12月，南京沦陷……

至1938年，国民政府先是迁都武汉，继而重庆。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正如钱钟书的《围城》所描写，许多学校都为避战乱而内迁到大后方。

当时，福建省政府也迁至永安，至今永安还有一条省府路。福州的院校也都向日军魔爪所不能及的闽西北山区迁移，包括沙县、邵武等地，与英华仅一巷之隔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则迁至南平。经派人勘址，英华中学决定迁往顺昌县的洋口镇继续办学。

内迁之前，召开了有学生家长参加的动员大会，陈芝美掷地有声地说：“敌人的炸弹关不了英华的校门！”并郑重地宣布：“我是校长，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安全，请同学们放心跟学校走，请家长们放心让学生走。”高年级的学生98%都在随校内迁的名单上签了名。在全体教职员民主表决会上，赞成内迁的竟是以49:1绝对数通过。

1938年6月6日，第一批先遣内迁的50名师生出发了。龙潭角码头上，家长们和街道上的孩子们都来送行，在鞭炮声中，汽船“呜”地一声徐徐离岸，仓前山向后移动，钟楼也渐渐远去。师生们在船舱里向亲人们招手，默念着：“再见，仓前山，我们还会回来的。”

二、抗战时期“小福州”

汽船溯闽江而上，只能驶到南平。建溪、沙溪、富屯溪在此汇入闽江。从南平到洋口只能换

乘小木船，这是一种两头尖，吃水浅，靠划桨和撑篙前进的小船，人称“麻雀船”，又叫“鼠仔船”。第一批师生分乘三艘小船在湍急的溪流中逆行而上。民谚有道是“一滩高一丈，邵武在天上”，“延平水与鼓山齐”，可见闽江上游地势之高。眼见船夫们拉纤吃力，个头大的同学们还跳下船去帮助拉纤。

经过三天两夜的昼行夜宿，才到达目的地洋口，它是与闽安、涵江、石码齐名的闽省四大重镇之一。

洋口当地原住民操建瓯方言，后来福州、闽清、古田等地的移民增多，福州话也渐渐地成为当地的第二方言。随之福州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也融入洋口，遂有“小福州”之称。据《顺昌县志》记载，1933年8月25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曾经“南渡富屯溪，进驻洋口镇”，并“围困顺昌县城达39天，保证在洋口的顺利筹款”。英华中学的一千多名师生来到洋口之后，这里的福州会馆就成了英华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会馆的戏台西侧楼厢也隔成许多小间作为教师宿舍。

抗战时期的洋口，交通闭塞，物质匮乏，生活异常艰苦。当时在英华执教的美籍教师唐·迈克(Donald Macinnis)回忆：“寄给我们的信件要由邮递员从南平花一天的时间徒步翻越大山（即‘三千八百坎’）送来”，“家里几乎没有工业品。水是用木桶挑进来的，生活垃圾也是用木桶挑出去倒在坑里，用于肥田”，“所有产自附近

山村的生活所需品——都是由瘦削而又皮肤黝黑的当地男人和女人用竹扁担一路颠簸挑进来的。”洋口贫穷人家的孩子都上不起学，小小年纪就要帮家里干活，冬天只穿一条单裤，打赤脚，怀抱着竹编火笼是他们取暖的唯一方式。

和闽北所有乡镇一样，洋口也是五天一次集市，称之为“赶圩”。每逢赶圩，镇上总是很热闹，英华的师生们在课余总会到圩市上逛一逛。但更多时候是校方组织学生们，利用圩天人多的



1943年英华学生在洋口“芝公亭”畔留影，此亭为纪念校长陈芝美而建

机会，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演出活报剧，唱抗日歌曲，如《放下你的鞭子》《义勇军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等。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当年也到过洋口，和英华的师生们一道开展过抗日宣传演出。

据一些英华校友回忆，他们不但白天上街头演出，还不时地在晚上演出闽剧《潞州城》《戚继光抗倭》等大型戏剧。有的同学还自编自演福州评话。抗战八年，福州方言就此在蜚水之滨普及开来，加之饮食文化也随之北移到洋口，如：鼎边糊、虾酥、蛎饼、芋粿、炸油糍、索面（线面）……

三、“番薯灶”不会倒

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就是最艰苦的阶段。办学经费来源枯竭，物质极度匮乏，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好在山区有的是荒地，学校就组织师生开荒种番薯、杂粮，食堂的蒸笼里顿顿都冒出番薯味。师生们都戏称之为“番薯灶”，久而久之“番薯灶”竟成了学校的别号。

英华原本是一所教会学校，在福州时读《圣经》是一门必修课。后来陈芝美校长虽然自己奉教，却主张信仰自由，内迁后将这门课改为选修，星期日做礼拜也听由学生自便，各种政治见解都可以在学校里并存，他说：“只要‘番薯灶’不被推倒，你们可以选择应走的道路。”

由于福州沦陷，许多学生失去了与家的联系，连伙食费都无着落，低年级的学生号哭不已。为安定人心，陈芝美在大会上宣布：“在这里，学校就是你们的家，从今天起，我既是你们的校长，又是你们的家长。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有书念，只要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他带头降薪，甚至在最困难的月份，还主动停薪。但对于多子女的或经济特困的教师，却给予补助和照顾。当年英华校友撰文回忆说：“陈校长夫人王世秀女士还与‘娘子军’（教师随迁家属）们一起为学生们洗涤衣服和定期缝补。”王世秀是清末福州状元王仁堪的孙女，其妹王世静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第三任校长，姊妹俩于1940年应宋美龄之邀到庐山参加了“抗战时期全国妇女领袖会议”，并与宋美龄在庐山拍了一张三人合影。

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英华师生仍然发愤读书救国。他们把戏台改成图书馆，晚自习时三五同学共用一盏煤油灯，煤油供应不上时，还点松明，做作业的纸写完了，反过来再用，铅笔也是削到最短时也舍不得扔掉，用竹管接起来继续再写。有一位兼管总务膳食的老师回忆：“有的班级连课桌椅都没有，老师站在戏台上讲，学生蹲在戏台下听。特别是伙食跟不上……就买既便宜又营养的豆腐，因此，当时学生就有一句口头语‘日日有’，意思是说天天吃豆腐（‘有’与‘腐’福州方言念音相接近）。”

仅靠节衣缩食省开支是不够的，学校又向洋口当地商界寻求资助。陈芝美自己出资以校长身

份宴请了洋口各界头面人物，除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警察局长、洋口镇长和海军陆战队驻洋口长官等政界人物外，主要都是商界的大老板，有的还兼帮派头子（当年洋口有福州帮、江西帮、汀州帮和浙江帮等），还有各行业公会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席间就成立英华洋口董事会一事达成了共识。时任商会会长的吴荣汉率先带头捐资大洋500元，众人亦随之慷慨解囊，有的还捐献木料、大米等。

为答谢洋口民众对英华之支持，学校优先让当地人的子弟入学，并破例招收女生，自此英华中学开始有了女生。据载，英华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生名丘以芬，她家在洋口开私人诊所。1959年丘以芬离榕赴香港学医，后又到琉球，最后在美国定居。

捐资助学来自校内外，来自社会各层面。有的教师放弃薪酬；有个贫困学生捐出了课余帮小孩子补习算术所得仅有的一角钱。还有一位西班牙牧师也捐出了从福州寄来的生活费。远在南平的火柴厂老板寄来的捐款不但偿付了向当地商店购物的货款，还买回了够吃三个星期的大米。就这样，英华的“番薯灶”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

四、美国教师的中国情结

英华在蜚水之滨，艰苦办学头尾八年，先后有4位美国人曾在此担任英语老师。

沈维德是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青年时期回美国求学，学成后又重返中国，到英华任教。她会一口流利的福州方言，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941年，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紧急通知在华美国人撤离回国，她却坚决不走，还献出回国旅费2.5万美元，以示与英华师生共渡难关之决心。她是随同英华师生内迁洋口，同命运，共患难，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唯一一位外籍教师。

据《英华在洋口》一书介绍：“沈维德是一位很受敬慕的美籍英语教师。她热爱中国、热爱英华、热爱学生。”“同情中国革命，支持进步学生活动。她曾把自己的住处作为进步学生订阅《新华日报》的投递地址和进步书籍的藏放处。”沈维德对中国学生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恨还从她的文章中流露出来，在她的回忆录《我们的“逃亡学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洋口40里外的南平来了个邮差，喊道：‘日本人占领了福州！’没人讲话，几分钟后一个学生站起来，流着眼泪说：‘我母亲才36岁，外表更年轻。’然后悄悄地走了。又过一分钟，另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有个16岁的姐姐。’然后流着泪离开了（教室）。我们知道，日本占领南京时的兽行。”

毕里夫妇同样是受英华学生尊敬的两位英语老师，他俩也在洋口和英华师生一道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罗宾，全家于1944年暑假才回美国。在洋口期间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可怕的鼠疫。毕里夫人在她的《洋口

回忆》文中写道：“学校哲明医院有个犹太医生叫维安纳，负责医疗保健。当时洋口疟疾很厉害，还曾有过一次鼠疫。维安纳为学生们打预防针，可我记得有个男孩因鼠疫死亡，致使学校暂时关闭。”她还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可怕的鼠疫降临洋口。教区主教萨根特因患鼠疫虽经医院多方医治，一周后就去世了。”

“人们谈鼠色变，天气炎热难当，但又希望炎热的太阳能杀死跳蚤，以避免鼠疫再流行下去。”

说起英华中学在洋口开办的哲明医院，不能不提一直担任学校董事的美国人范哲明（Paulp Wiant），他在福州协和建筑部期间曾负责设计过协和医院、协和大学文理学院（魁岐）等建筑。英华内迁后，他多次来到洋口，并资助几位贫穷学生完成学业，有的还培养到大学毕业。洋口哲明医院即以其名命名。现在的《福州城乡设计志》里记载了他的事迹。

穆藹仁即前面曾提到的唐·迈克，在英华任教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却给学生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40年5月，迈克放弃了美国加州大学的学业，告别了优越的家庭，带着父亲给的100美元支票，乘英国游轮到福建霞浦登岸，辗转到福州，乘船溯闽江而上，到南平换小船来到了“和原始村庄没有两样”的洋口。那时他才19岁，是最年轻的外籍教师。

迈克很快和中国学生打成一片，他不单上

英语课，还帮助学生用英文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教唱英语歌曲《老黑奴》等。

迈克在洋口经常看到日军标有红膏药旗的飞机掠过头顶向邵武、崇安飞去狂轰滥炸。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油然而生，他不愿留在后方教书，他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到前线去和中国军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1941年6月，穆蔼仁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英华，从上海回国，然后报名参加了陈纳德将军的美国援华航空飞虎队，重新来到中国，驾机抗日，与日机鏖战长空，直到抗战胜利。

2006年，《福建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穆蔼仁：一个美国飞虎队的中国情结》的特别报道，文中叙述“穆蔼仁回国后，一直从事中国研究与教学。他的著作也都和中国有关”。2004年，退休在家的穆蔼仁收到了武夷学院的邀请。8月，穆蔼仁飞抵武夷山。此时，他的一个儿子，即在福州出生的穆彼得，早已在中国工作了5年。两个孙女爱中、爱华还在央视《正大综艺》里担任了主持人。这都是后话了。

五、《惊涛》和读书会

英华中学内迁洋口初期，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短暂的“蜜月期”，原在福州就已参加了地下党的几位学生，到洋口后都以半公开身份展开活动。据《顺昌县志》载：“民国二十八年夏，从福州内迁到洋口的英华中学成立中共英华特别支部，属闽江工委领导。”有了党组织的领导，英

华进步学生的抗日革命活动更加有声有色开展起来，其影响力不止一个洋口镇，也扩延至顺昌、将乐、南平的峡阳一带。他们创办了英文墙报《惊涛》（TIDE）月刊，意谓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有如惊涛骇浪，革命的航船要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创刊号由中共党员陈世明和陈文湘主编，聘请穆蔼仁（Macinis）为英语顾问。一位校友回忆：“除了办英文墙报《TIDE》之外，还有‘小小读书会’（党的外围组织，会员中有地下党员也有普通学生）、‘惊涛剧社’（排演进步抗日话剧，也参加学校英文剧演出等）。”

读书会里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和《辩证唯物论》等进步书籍以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福州二度沦陷期间，为了帮助家庭困难的同学，读书会还派生出一个“小小互助会”，由党员同学带头捐钱，使经济困难的同学能完成学业。

英华教师队伍中，不乏思想进步者，其中有位陈衡庭老师，是教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他虽然不是党员，但可算得上是一位党外马列主义者。“国民党派人在临街的教室外边窃听陈老师讲课，他们曾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勒令校董会解聘陈老师”，但都被开明的陈芝美校长拒绝了。半个世纪以后，当年的英华学生纷纷著文怀念陈衡庭，称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高放）、“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名英雄”（黄毓泌）、“爱人以德导人以理益人以智”（陈云基）……

在英华特支的领导下，同学们曾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国民党反共宣传和强制军训的斗争。例如，在教官训话时故意提问：“上面不是天天讲‘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吗，为什么还要防止异党活动？”教官被诘涨红了脸，无言以对。有一次，为了拒绝军训剃光头，党小组还组织了同学们进行合法斗争。

曾任省文教办主任的王一平回忆，当年在洋口检查党的工作时，了解到英华中学“另有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英华中学校长陈芝美，还有一个外围老师沈师姑，他们都不是党员，但思想较进步，保护过我们的同

志”。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英华党组织转入地下。但仍有一些党员学生被捕，如“秘密读书会”的组织者马绍永、马绍铿等人于1942年暑假回福州时被捕，还留下了一箱进步书籍。

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英华中学分批迁回福州，10月，返榕工作结束，陈芝美最后一个离开洋口回到福州。当他登上阔别8年的龙潭角码头，欢迎他的是校军乐队的乐曲。

20世纪50年代初，英华中学建制合并为今天的师大附中，校舍留给了现在的福州高级中学。



私立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全体教职员摄影纪念，1948年12月8日

编者按：抗日战争时期，福州于1941年4月21日第一次沦陷，同年9月3日光复。

吴鼎芬先生在此期间写下的日记（1941.4-1941.9），真实地再现了日寇在福州城内的暴

行，以及沦陷期间民众的艰难生活，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因篇幅关系，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吴鼎芬先生于1956年去世。

陷城日记

吴鼎芬

4月

19日 凌晨4时，忽闻警报，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敌机群踵至，远处有轰炸声，下午传连江、长乐相继陷落。

20日 终日敌机来往不绝。龙潭角、仓前山各处被炸，死伤百余人。夜八九时忽闻解除警报，人心为之一松。

21日 凌晨1时即闻零落炮声，天将明时枪炮之声大作，至八九时枪声停止。究竟此等枪炮之声因何而起，言人人殊，莫衷真相。此时，寇机4架低飞掠屋顶而过。10时左右，南门兜广场发现敌兵。随后有敌兵约千人由井北一带陆续结队进城，驻扎省政府将军里各处。昔政府征集无数木柴砖石，并按户勒派民工在冲要十字路口构筑防御工事，信誓旦旦寸土必争，今竟奚如？

22日 上午到南街一带，见各商店紧闭，行人稀少，有寇兵在街上巡逻。

23日 友人慰民从安民巷后门来我家（我家住黄巷南华戏院隔二间），谓鼓楼前、东街口、军门前、南门兜均扎有十余寇兵，检查行人。

24日 终日在家，不知外边消息。举家粮食只能维持2天，日食两顿稀饭度饥。

25日 从花巷到孝义巷友人慰民家。听说早晨有百余兵自东门外入驻东岳庙。敌兵纪律废弛，争食街头小贩食物。

26日 家住北门外湖前乡的陈家媳妇来家挑粪，说三角井敌兵抢菜担，侮辱妇女。慰民也来了，说大桥头永安堂架机关枪设检查站，上杭街商会内有驻兵。敌兵责成商会按日供应粮食、猪、牛、稻草。位于南禅寺的开智学校内驻有马队。

27日 晨，时闻炮声，后知竹岐方面有战事。下午到井门外万安泉洗浴，汤客所谈皆恐怖愤惋之事。

28日 雇人到凤岗里查吾女五妹家中安否。知西乡一带尚平安。闻日寇宴请商会索费百万，商会许以50万，维持会增加一成，以为经费。买米2升，每升4元。

29日 到慰民处，闻福清、连江皆有战事，福清曾告一度克复，旋又沦陷。

30日 到南台访诸友。市面敌兵稍稀，三岔路口及重要之处皆有防御工事。运输车来往不绝，来者多子弹，去者多工兵、工人及工程器具，闻系赶修福马公路。三保一带街上卖杂粮，米亦少许，每升3元6角，薯米每升1元8角，其余绿豆、薏米、麦皮每斤亦1元余。

5月

1日 听张铨画师说，前东来阁老板（日本人）联合福州商人办米6000包已到马江。近日粮食极缺，人人皆成饿殍，若有此米，可稍稍救济也。

2日 由维持会发起向聚春园备办20桌宴席，每桌90元，福州稍有名望之人多受邀请，还有徒铺啜者，有欲染指委员者。在友人处见到邀请函，余幸无名，不在被邀之列。另闻敌兵陷城以来，城内外稍具规模之屋宇无不占住，除奸淫妇女掠夺现钞外，附近人家稍有精美之器具无不

搬取车载运至码头，装于船上回国也。此与明史所载之倭寇何殊？

3日 学校办事员饶某（家住钱塘巷）来家云：北门一带，几无一家不被敌寇骚扰，渠家中亦被搬去桌椅十余张。饶某去后，余往慰民处一谈，闻维持会、自治会各员纷往南台嘉宾菜馆，应敌之招也。

4日 又到慰民处，一商人在座，渠云：21日晨被敌寇捕为担夫，由连江海口直挑至井门外红墙，将近大北岭，大雾弥漫，遭遇我军，双方开战，我军退。战后，民众在地上拾得钞票一大包，似系我军仓皇遗失。又到某处，又遭遇我军，甫交锋，我军即如鸟兽散，敌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达榕垣。吁可叹也！

5日 下午出街，遇开智学校林教员，同到慰民处。据云：王世基亦在南台桥设立维持会；昨日林秀泉在维持会与林赤民冲突，交演武剧，甚为敌寇所笑。又云，现敌兵在城台者不及2000人，据其自言广州有战事，福州之兵撤赴广州；昨日某处发现我军，敌一度大起恐慌。

6日 大雷雨出街往慰民处。闻维持会取消，统归自治会。又据乡人云：各处山头均架大炮，本日起，调查户口。

7日 到衣锦坊陈友人处，谈及维持会情形，甚为可笑。有南台人在座云：桥南亦有维持会，会长蔡某办事手腕较好于城内维持会。

9日 大雨。往后街购米，人多拥挤，购不着，立大雨中，衣服尽湿。

10日 往慰民处，闻广州、安徽已被我军克复，福州洪山桥之上设置铁丝网。

11日 孙孝培往闽清，与同伴相失，中途折回。与慰民同到熟人处购碎米50斤。据云，碎米由台湾运来，原每包200斤仅五十余元，而转售吾闽增至88元。

13日 上午，雇人挑碎米50斤到凤岗里接济小女，见其采煮野菜食以代饭，心为怆然。下午返家，在渡船内见河面有浮尸数具，船上人云：每日不下数十具，船远避之，不辨其何尸也。又云马江碎米每市斤只售5角，福州所售9角1分，被维持会抽4角1分以为经费，太无心肝。夜间闻云：各机关已发饷，即此两三日内所抽之碎米捐也。

14日 下午出街，见贴有维持会通告，内言委员制改为会长制，以林赤民、李孟斌为正副会长，并委员等名单。有人要拉鄙人入伙，允为婉辞。下午往井楼门外洗浴，见田中、山上皆有防御工事，形势似颇紧张。本日上下午皆闻零落炮声。澡堂之客亦甚稀少。回家后又购碎米10斤。10余日以来，皆以盐汁下饭，本日买蔬菜5分，食之甚甘。

16日 晴，天气稍暖。炮声较昨日为密，微闻飞机之声。上午9时许，寇忽于水部五福巷口架设大炮，实弹以待，如大敌即刻到者，附近居民大起恐慌，家家闭户。未几又撤去。本日无碎米出卖。初始碎米专卖，拥挤不堪，购者几终日不能余一粒；后则分配各保以户口证为凭，计口

余米，人民稍便。据保长云：城台余米户口统计12万户，福州城市人口前经调查有三十余万，今之领证买米仅12万，其中尚有浮报，实不过10万零而已，二十余日之间人民逃去者三分之二。时逃亡之路密布荆棘：敌之检查，狠若虎狼；土匪猖獗，防不胜防。明乎是，但仍不避艰险，作出逃之举，其不愿为亡国奴之心诚可敬也。

17日 晴，天气尚冷，日间尚须穿棉。各方传来好语，谓我军胜利，有欣欣相告之意，但不知何日可慰云霓之望矣。有乡人被捕为挑夫者云：有一炮弹爆炸，寇兵死者总有一二百人，其死者当地即埋，伤者装上篷车，密盖篷布，不使人见之；近日城内看见此车甚多，由北而来，开出南门而去。挑夫又云：各人回时必须各带步枪3支，即死伤兵之枪也。由后坂至新店，有运输车在此以待，即投于车上。舍弟弼宸在警界为老资格，去年退老，有多人拉其入伪组织，渠力却之，贱售家具忍饥过日，亦甚可叹也！邮局送信已两日，吾家尚未得各处来信，颇盼望之。

18日 上午亦有炮声，下午沉寂。有人报告东门外离城二三十里有我军甚伙。修书寄闽清问孝培诸人已否到达。自寇军陷城以来，凡三岔路口及重要之处，必设岗兵，强驱店屋以为岗位，行人过者必使鞠躬行礼，否则罚跪。其最恨之处任意拉到一人，又再拉一人，使捆前拉者之面，如捆不力则鞭之；又或以小竹或中指弹人之鼻尖，使人酸痛难堪，此皆有意侮辱，不以人理相待也。可恨！可恨！

20日 微雨。下午出街，见运输车络绎不绝，入南门出北门，其中多辆载有武装寇兵。街上发现日妇甚多，烫发着和服。

21日 出街又见运输车载武装寇兵络绎不绝，自南而北，并有马队装载大炮、机关枪，亦向北而去。

22日 晴。上午出街，见各店户普遍挂旗，并搭彩楼，横书“欢迎大日本军”字样，闻有日兵两师团开到。所传皆是恶消息。

23日 出城到苍霞洲族人处，探询长乐失陷情形。至大桥见码头一带堆积货物颇多，大概系军用粮食。有人搭船至水口归来云：过竹岐时遇匪抢劫。闻孝培诸人过永泰时遇匪抢劫，不知损失如何，心甚不安。

24日 形势颇沉寂。有木商谈，渠经过白沙、甘蔗等处时，确见寇兵仍在甘蔗以下，亲见我军约有千人分乘小艇在甘蔗以上登陆，并有炸弹队约二三百人，闻之颇为喜。

25日 携米3斤往凤岗里。闻白马桥有寇兵把守，行人过者无论男女必搜其身，遇有钞票无不取去，稍与齟齬推而投诸桥下，每有溺死者。其狠甚矣。福州连日无碎米售卖，粮食甚感缺乏。

26日 雨。市面颇平静。诸友来谈者，多及维持会之丑态，并言：“福州人之不长进可慨也！”然余心有所疑：其为环境所迫的中下级之伪职员，或仅为图日2斤米、2元钞票；然稍有身份称醇谨者，何亦为之？

27日 往万安泉洗浴，经过井楼门兜，见有

寇兵搜检行人，余绕道而行。

28日 近此两日消息颇好转，闻前方战事，寇兵死伤总有五六百人。昨日中午寇忽于城台直街断绝交通，据云乃装运伤兵入城，不欲令人见也。宫巷刘某为伪组织之公安局督察长，昨夜被敌寇派员搜查，不知何故。据西门一带居人云：昨夜由西北运回子弹粮食入城者，终夜不绝。

29日 寇兵四出，闯入人家搬取家具，民皆悬心吊胆，不能得一日之安。昨日所记之刘某被寇兵捕去，拘于水部韩园之内。

30日 是为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但民众极为颓丧，对于节日毫无兴趣。余书一联贴于房门云：谁令午节不成节？预决中秋有好秋！友人见之云：寇兵中颇有知中国文字者，如来搜查必受麻烦。余曰：敌寇兵源枯竭，彼上不能至水口南平，下不能至兴化、泉州，近日兵车往返互调，虚张声势，其何能久？吾料其中秋以前必自溃也。

31日 南街店户亲见敌寇载伤兵入城颇多。闻维持会孙秀泉被捕。孙实为福州一无赖耳，其妹夫郭咏荣前长福州公安局时，孙借势包硝磺捐税发财；此番敌寇入城，首先欢迎，维持会皆其一手组织。何故被捕，不得而知。

6月

1日 购米30斤，雇人同往凤岗里。在渡船时，船上人谈述白马桥寇兵之暴横，附近人家无不遭其蹂躏，人人发指。回家后，知后门发生火

灾，与吾家仅一墙之隔，未被延及，亦云幸矣！

2日 往慰民处，渠云：隔壁陈淮远之宅被敌兵占住，其不敢与之为邻，决搬家。敌寇自陷城以来，于屋宇随意占住。街市之商店有勒令即刻搬离，改为娼馆、饮食店者，南街大略不下十余处。近日又有敌兵进至大湖之说，余心甚忧之。

3日 又闻西路敌兵已退尽，不知何往。临去之时，附近各乡被其屠杀数十人。安民巷饶某亦维持会人物也，又被敌寇搜查，不知何故。碎米已十余日无有矣，民众粮食甚感缺乏。

4日 寇兵确由大湖退下白沙，伤亡数百人。有寇之军官到慰民家，以笔代谈，无非厌战之语，谈毕撕破其纸，不留一字，曰：切不可告人，否则有身命之虞。慰民因搬家不及，被取去椅4张，桌1张，家具杂物十余件。近日街上戒严形势紧张，所谓自治会、维持会各委员之家宅，多被搜查，并有捕去监禁者，闻已残杀数十人矣。

5日 无甚可述。惟友人告我：阅及上海之报，国际消息甚好，心甚喜之。

6日 甚沉寂，无可记。下午得重庆儿子4月28日所寄之信（经40日始到），信中以隐语告我中央对于敌人之把握。

7日 下午，本保之保长来家云：奉维持会命令，召集各保公正人士讨论地方之事，邀余参加；余不欲履其地，辞之。作信复重庆。

8日 雨止。上午微闻炮声。市上持卖伪报日报云：欧洲战局急转直下，敌人国内亦开重要

会议。下午到保长处预缴面粉之款，每斤售价1.5元，每口限买3两5钱。

9日 街上之人见有战马数十匹，尽驮武装寇兵，由南门而入，出东西两门而去。下午，余在鼓东路见有坦克车12辆，向东转弯开往狮桥头、仙塔街而去。

10日 买到面粉1斤5两，即8日缴款预定之粉也，余又可充两日之食粮矣。

11日 天气稍暖，闻各处召开追悼会，敌兵之死亡不少可知矣。下午出街，遇住居西门外之友云：寇兵确退桐口，又在白沙之下矣。

12日 余过南门兜，见一六十余岁之老人仰缚在铁丝架之上。经查：被缚者薄有身家。因半夜寇兵叩门，不敢开，寇兵大怒破门而入，攫取财物，又将其牵出，自半夜缚起，灌以汽油，已有20小时矣。自陷城以来，寇兵之残暴罄竹难书：以搜查为名劫抢路上行人，身上有数元钞票无不取去；过岗兵必使行礼，稍不如意即掴其面；城台稍有规模之屋宇无不占住，稍为精致之家具无不搬取；一到乡间即杀猪宰鸡，视为常事，甚至牵去耕牛。余亲见其到商店买物，不论价格，随意与以少许之军用伪票，强取而去，商店视之若虎狼。

13日 慰民来云：近有好消息，我军确已进白沙以下。

15日 雨。下午到南台戚属家，闻：有谢姓者，新自延平归，行至白沙，经过敌人阵地，被其捕禁于太山庙之内，同时被禁者有四五十人，

食其残饭，且日仅两餐。每晨必有敌兵入庙驱作苦工。对年值壮丁者尤为注意，捕时验视头面手足，以认有无当兵表证。有一人被缚于木竿，平置地上，被用大刀自额以下至鼻以上削去一片，血流满地，口尚能言。四五十人众目共睹，惨不可言。过数日，我军迫近，敌乃放弃白沙而下遁，众人遂得归。

16日 上午，携米6斤，面粉3斤，往凤岗里接济吾女。下午回家，又向本保领购碎米，每口仅5两。

17日 晴。上午往苍霞洲族人处，其来往者多木商中人。据云：白马桥一带，所有木材均被敌寇封禁，由寇自估价值，先给3成，俟运到日本后给清云云。价既自估，而又只给3成，所云日后给清者，不知在于何日？直强抢而已！木商人中叫苦连天。又云：自榕城陷落以来，海关至今尚未开关。敌寇在大众旅馆（前法大旅社）内设机关，联合海盗抽捐，名曰助饷，所有出口应纳之关税，均归彼收入。纳税后给以凭证，一切货物均可装于帆船出口，否则海上必遭抢劫。上午8时起街上检查行人，每隔数百步必检查一次，民众相戒不出，几绝交通。南门兜有数十人被缚于电杆。下午起按户检查，穿房入室，倒篋倾箱，贵重之物无不被攫取。闻前方战事吃紧，我军已进至白沙以下。

18日 终日在家守候敌寇之来搜查。闻衣锦坊尾至文藻山一带，皆有寇兵包围，不许出入。又闻长乐北乡七星桥因寇兵来乡奸掳，起与抵

抗，寇兵回县起到大队，全乡被其屠毁。

19日 晨6时即有寇兵叩门而入，巡视一周而去，似为看水。8时又来8人，入室穿房翻腾箱篋，去后又来8人，比前两次骚扰为甚。吾家早有准备，细软之物或埋土中，或置地板之下，有银链一条漏于收藏，被其所见，将欲取去。银链所值无多，本可不与计较，但看其行为心甚愤怒，自其手中夺回。彼大咆哮，我亦怒色相向，以手势与语，谓此非危险物，尔不得取去。家人大惧，牵我离开，然银链已在我手矣。前房萧莱家中，被其取去远望镜一架，电筒一把，手提照相机一架及自来水笔、铅笔等物，至下午2时始去。巷口则终日把守，不许出入，全巷皆断绝粮食。后街安民巷口排设桌椅，凡有与之抵抗之人，即驱至彼处当街罚跪，甚有被缚于电杆者。余以银链与之抵抗，不被缚罚跪，亦云幸矣。

20日 各巷口封锁4日矣。余终日不出门。闻街中检查行人甚为严厉，虽妇女亦必摸索其裤下。观其行径，对于行人则故意凌辱，对于家宅则心存攫物，非检查危险与“反动”也。数日以来家人皆忍饥过日，每日只一餐，因不能出街买米也。下午闻本保有碎米发卖，因往安民巷购回数斤，明日又可度过一天也。

21日 下午始撤去守兵。余出至南街一行，因牙痛，到玄坛河沿赵汉夫牙医处拔牙，用款3元。

22日 街上可以通行。余至井门外洗浴，闻大炮之声10余响，未知战事如何。观察大众口

气，望我军如大旱之望云霓也！

7月

23日 往苍霞洲族人处，探听敌寇收买木材之事，云：此项木材被其搬去者甚多，但所云先交3成之款至今未见分文。在族人处午饭。回家后闻国际消息于我有利，心甚喜之！

24日 拟往洗浴，行至汤门路，忽有寇兵布哨，不许通过。下午南街各巷口亦分布岗兵，经过者皆被搜检。

25日 天气变冷，溪洪大至，幸未上田。连日无碎米发售，粮食甚感缺乏。

26日 携碎米7斤，并薯米、面粉往凤岗里接济吾女五妹。路上人人皆言：经过白马桥备受寇兵搜身之苦。闻又将检查船舶。

27日 早晨又往凤岗里带同吾女及铿孙诸孩子回家。到本保注射防疫针，因如不注射即不许购碎米。

28日 吾女带同诸孩子回乡。溪洪大退，早稻登场为期不远，不知收成之后，米价能否降落？连日前方战事毫无所闻，寇兵之在城台不过数百人，然在市中穿梭不绝，行路甚感不便，不知彼方军纪废弛任其自在游行耶？抑故意放任使之游行市中以恫吓吾民耶？苏德宣战而后彼方伪报多载柏林来电，不外宣传德国胜利而已，吾心不以为信。

29日 据西门街商店云：昨夜12时以后有整队之寇兵四五百人开出西北门，或者前方又有战事乎？

1日 天气忽变，台风大作，早稻正将登场，遭此大风，必多损失。终有大炮之声，零落不断。

2日 天晴风止。日间尚有炮声。下午购米9斤。

3日 闻水上检查甚严，渡船中旅客身上财物无不被搜；又闻白马桥寇兵搜攫过客身上之钞票。

4日 早晨有机枪之声甚近。开智学校看守人报告：校内荔枝尚未成熟，寇兵摘食净尽，附近果树无不被其糟蹋，此亦可见彼方之军纪也。

5日 慰民告我：长乐沙京一乡，被寇兵以大炮洗毁，焚烧屋宇，惨死多人。长乐为余桑梓之邦，民气强悍，起而抵抗敌仇者日有所闻；然民众无武器，锄耰棘矜何足以御大炮也？闻之惻然！连日闻欧战甚酣，并闻黑龙江、苏日海军已接触。自陷落以来，敌人封锁消息甚紧，国内外之情形皆不得知，所有消息得自传闻而已，近日常市上寇兵颇稀，据各方所传撤去者不少。中午有飞机一架，飞翔甚高。

6日 吾女五妹由我家回乡。因昨日又举行第二次防疫注射，吾女带其子女来家，本日又由我家回乡也。昨今两日皆闻机枪、大炮之声。

7日 闻大炮之声，查系南屿全乡被敌寇洗毁，数百人遭屠杀。

8日 闻长乐被敌洗毁者有五六乡。人民何

辜？遭此惨劫也！

9日 早晨往南台族人处，见中亭街各银行占住之寇兵撤去不少，而城内各处设岗驻扎之寇兵，前有10余人者，今亦仅数人。

10日 晨5时又往南台苍霞洲族人处，因昨夜回家闻除了南区各乡大被敌寇洗毁，极关心，故又往一查，据云：寇兵百余人开往江田做恶，长乐人民以各乡多被残杀，恨之刺骨，不约而同集合千余人，将寇兵包围，有自远乡赶至者，唯武器不足。寇兵用大炮、机关枪扫射，开路突围而去。我人民死伤不少，吾乡坦村亦死男女9人。

11日 终日在家，友人来谈云：余之姻亲林琪为公安局职员，撤退之时仓卒之极，遗其老母少妻在榕。最近其妻奉姑前往永安，经过寇兵阵地，不堪凌辱，投溪自尽；遗老姑在途，不知能否到达永安。余闻之惻然。

12日 市上寇兵又甚多，市人传言由汉口调来补充在闽之死伤。寇兵之在中国者只有此数，彼此互调虚张声势，其兵源之枯竭可知。

13日 终日皆闻炮声，查系寇兵又往南屿残杀。

14日 时事无所闻。天忽变冷，夜间需薄棉。

15日 早晨出街，见遍贴布告云：自20日遮断交通，南不能过场口，西不能过侯官市，如有不遵则用枪射击。人民大起恐慌，谓从此不能逃出陷落区之外矣。

16日 下午忽闻巨声两响，据查，系寇兵炸

毁南台中洲岛边之巨石，将于该处作码头也。

17日 民众见各路遮断之布告，云自20日起，于是纷纷赶于此日之前逃出陷落区；然一到侯官市，皆被阻而回。有人亲见洪山桥附近，扶老携幼，负被持包、坐泣路隅者不少，皆因侯官市不能通过也。

18日 所谓维持会、自治会者正在开会，忽有寇兵到场，立时捕去会员及高级局长、科长数十人，禁押于水部韩园，余闻之甚为诧异。

19日 早晨出街见寇兵张贴布告，大意谓前日按户搜查大收效果，此后如再有抵抗之可疑，定予再行搜检云云。此可见敌寇畏惧吾民之心。其实前日之屋内检查有抵抗证据被其搜出乎？不过细软物件攫取不少耳！所谓效果，即此而已。

20日 闻长乐各乡人民自组之游击队甚为活跃，寇兵皆蜷伏县城，不敢远出。

22日 连日雷雨，天气稍冷，早晚夹衣，夜间薄被，正在伏天竟有如此凉冷。

23日 近日米价稍跌，早稻每石售价百四五十元。

25日 前日被捕之伪组织各员陆续放回，尚有十余人未放。其放回者自言被捕之后，皆受虐刑拷打，几乎丧命，言下有甚为懊悔之意。唯放出之后依然登台再演傀儡丑剧。则吾不能为之解也。

26日 米价又跌，每石售百二三十元。

27日 市上传言寇兵被迫将溃退，余闻之甚喜。

28日 最近有所谓和平建国军者，即前所记海匪在南台法大旅社抽收出口船舶规例之辈，大见活跃；有敌寇溃退。由彼入驻城台之说。

29日 报载自9月1日起将青天白日国旗之上加添一层，内书“和平反共建国”6字，不知是否即所谓和平建国军也？

31日 各傀儡以敌寇好吃中国菜，每隔数日必请酒一次，多有花至五六百元者，闻皆系敌寇向之索食，不得不如此应酬也。

8月

1日 敌寇极好我国之古董，自到各处古董店搜索之后，即授意伪组织人员着其买送，无耻之极！

2日 闻城内云步山蔡姓全家被杀之事：蔡姓曾充海军军需官，去年新娶少妇，其家之前后左右皆系寇兵驻扎，骚扰不堪，以致与之齟齬，遂被杀害。

3日 闻伪商会主席吴焯官驱车至吉祥山，有数人手执手枪向之勒索3000元。吴应以途中焉有此巨款，俟回家后如数奉送，唯送至何处须告知地址。答曰：在西宴台专候。吴回家后赶报侦探，命车夫同往，果有数人在内，唯侦探无多，只获一人，交公安局拘禁。即刻有寇兵前来索去，则此数人为寇兵所使，不问可知。其攫取财物，无奇不有也。

4日 西门街一带住户云：昨日晚间寇兵自西

门开入者终夜不绝，约计总有二三千人之谱，似系由前方退回者。

5日 余在南街见有运输车数十辆，满载武装寇兵往南门而去。合两日形势观之，行将溃退之说，似为可信。

6日 有长乐乡人来家告我：长乐琅尾乡某家颇中资，其妻被寇兵侮辱自杀，某愤极出家财组织游击队。前数日有寇兵数十人乘小汽船3艘，经过其处。某邀数人挟手榴弹、机关枪伏橘林之中，突出击之，沉汽船两艘，其队长名中岛者当场毙命，寇兵死者十余人。余闻之，心为一快。

7日 余至南台海防前，亲见寇兵3人不与代价，强取洋瓷盆而去。

9日 往苍霞洲族人处，邀往“福聚楼”午饭。堂倌亲口告我：昨夜有寇军特务机关人员并台湾人数人在此宴会，请到妓女3人侑酒。敌寇一见妓女，丑态百出，酒过三爵竟然自脱其裤，欲实行其强暴猥亵。妓女尚知羞耻，涕泣挣脱。邻座食客皆纷纷散去，店中损失百余元云。岛夷之兽性原系如此。

10日 闻各处人家器具被寇搬取者更甚于前，即不甚精美之物，亦被取去。

11日 城内九彩园陈家又有全家4口被寇刺杀之事！乡里传言，敌寇强入其家，意欲强暴，其即与之抵抗；寇遂邀集多人于夜间逾墙而入，全家4口尽被杀害。

12日 有连江已为我军克复之说。

13日 有福清又被我军克复之说。

14日 自5月间敌寇运到百数十之娼妇来榕之后，遂于各处强占店屋民居，改为寇兵娱乐场所，城内外寇兵之妓馆、饮食店不下数十处，寇兵酗酒滋事，乡里之苦。

15日 余至南门兜见一老人死于街中，血流满地。系敌寇汽车所碾。

16日 市上敌兵稍稀，所闻寇将溃退之说，似为可信。

17日 开到空船数十艘，似为搬运货物出口之用。

18日 寇着各保勒配民伙齐集台江汛码头，搬运杉木及铜铁货物上船。

19日 据西门居民云：敌寇运输车载运货物，终夜不绝。

20日 市上敌寇之运输车载运物件甚为忙碌，闻前所运到之娼妇登船回去者亦不少。

21日 闻伪组织重要人员秘密潜逃，有携带家眷同走者。

23日 各处敌寇之岗兵已撤去数处，其未撤者仍拦街搜索行人。

24日 长乐乡人来家云：长乐河下及尾道码头舶有汽船，满载货物待发。闻敌寇头目曾告伪组织头头，谓他的队伍即将调赴马江，另有队伍前来接防。

25日 上午10时访任之（即吴适），据他所闻，连江至琯头一带公路，敌寇汽车行驶不绝，均载运货物至码头。观上两县情形，敌寇尽数溃

退，益为可信。

26日 伪组织人员本月下半月薪米均未发，伪长无法应付，多失踪。

28日 上午9时在安民巷见屏侯、幼波在路旁喁喁私语，极为张惶恐慌，我急低头穿过，不便与之招呼。（屏侯姓林，幼波姓陈，二人系舅甥关系，均参加伪组织。）

29日 东街口、南门兜敌寇之岗兵都撤去，驻扎北库寇兵亦于3天前开走。

30日 学校看门人来家云：马队业于昨晚开走，还留稻草数十担未搬去，校中亟应添人看管。我即与慰民洽商。又驻圣人殿寇兵亦已开去，两庑神主牌多散失。

31日 敌寇业已退尽，闻走时均在夜半。重要伪人员早已先期逃走，唯金振中、林忠、郑贞藩仍在街上遇见，颇逍遥自在。萧莱云：他们均搭线。是或然欤？

9月

1日 本日有穿救火会制服警丁，手提火龙，分数队，每队有十余人，巡逻城台，声言国军正在急进中，即将入城。

2日 上午南街一带贴有福州各界欢迎国军标语，下午警察纷纷进城，传谕各店铺悬挂国旗并备鞭炮，俟国军开来鸣放，表示欢迎。（余之日记至此为止）